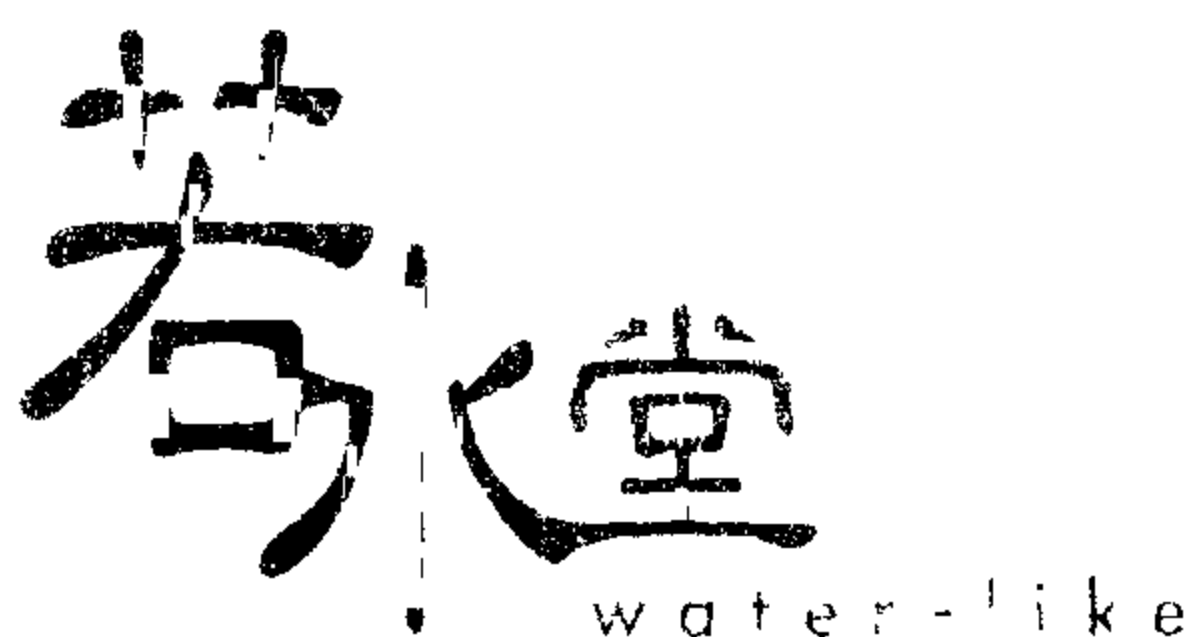


公投拚



台灣民主的歧路 廣場詩文錄

一九九二年 五月



www.waterlike.com.tw

www.若水堂

我們販賣知識

全台最大最專業大陸圖書專賣店

文學、藝術音樂、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社會科學
商業、醫學、理工、生活、影音產品..

自2003年1月成立至今，承蒙各界的支持，若水堂正以新型態的創新服務，席捲全台。快速的服務、合理的價格，是若水堂對於顧客的承諾。擁有全台最大的大陸圖書連鎖專賣店，讓每位來店的顧客都能滿載而歸。搭配專業教授群的選購書籍，完全滿足國內專業人士對於知識的探求。

東海店

台中縣龍井鄉台中港路7之60號2樓
TEL: (04) 26328880 FAX: (04) 26328872

高雄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3號2樓之2
TEL: (07) 7138838 FAX: (07) 7137118

成大店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291號2樓
TEL: (06) 2385008 FAX: (06) 2386808

中原店

中壢市大仁二街10號2樓
TEL: (03) 4563802 FAX: (03) 4563832

www.waterlike.com.tw

若水堂書店，歡迎您的蒞臨
或經由若水堂網路書店訂購

>> 台灣焦點

01 台灣民主的歧路

■王文光

《廣場詩文錄》

06 參加四月學運的心得

■汪震亞

10 我們為何支持學運？

文■一群婦女 / ■■李文吉

13 廣場詩三首

■張米

>> 大陸形勢

14 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

■戴建中

26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浪淘沙

>> 社會現場

27 示威者 (下)

——台中客運抗爭紀實

文■范軒昂 / ■■莊程洋

>> 六四回顧與評析

39 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一些思考 (上)

■習東

51 音樂有時未必不是無聲的

■周良沛

>> 歷史檔案

60 霜降 (七)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封面圖片：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民進黨經過這次空前的「被抗議」，有反省嗎？黨內各派系忙著佔據衙門分割地盤，麻木得很！
關立衡 / 攝影

歡迎捐款贊助

電話：19803670

帳戶：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零售	90元 / 本	
訂閱	台灣地區 (一般訂戶)	一年 1,000元
	(榮譽訂戶)	5,000元
	歐美地區	一年 50美元
	大陸、港、澳地區	一年 40美元
	亞洲地區	一年 45美元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宋文揚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ritra99@yahoo.com.tw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400號

台灣民主的歧路


■王文光

總統選舉的重大爭議，職司調查、審決的司法部門所表現的軟弱、被動，也看不出一點「獨立」、「公正」的職能，種種跡象都表明台灣的民主根基極其薄弱，確實存在培養法西斯政權的肥沃土壤。

西方形式民主的歷史局限

對台灣民粹橫行、民主倒退的現象，近來學術文化界頗多撻伐之聲。本來，資本主義的民主就缺乏讓人民能真正當家做主的實質內容。我們更要深究的是，何以台灣連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也難以維持而岌岌可危？

資本主義民主的理論與制度是因應十七世紀西方新興的資產階級在取得經濟主導地位後，不滿專制王權與封建貴族的特權，進而與之爭奪國家統治權而設計出來的。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提出了人民主權論，認為理性、自由、平等的個人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安全而訂立社會契約，同意授予政府統治權力，治理國家。因此，國家主權掌握在人民手裡，政府的責任是維護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官吏是人民的公僕，需對人民負責。由此而發展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定期選舉、政黨競爭等政治制度，並訂立法律保障人身、財產、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的基本人權與參政、選舉的公民權利，形成一整套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不過，在這套民主制度中，自由與平等之間卻存在著深刻的矛盾。早期自由



台灣十餘年來高喊「民主化」、「人民自決」，卻在此次總統大選丑劇中暴露出許多異化的病症。鐘俊陞 / 攝影

這次總統大選的總體形勢原本有利於泛藍取勝，陳水扁因為害怕輸不起而刻意挑動島內敵對情緒與玩弄愚民詐術，不但把民進黨的反動本質赤裸裸地暴白於天下，也十分徹底地顯示台灣歷時十多年的所謂民主化其實是虛有其表。陳水扁為保權位敢於鋌而走險不足為奇，但竟有半數的選民毫無分辨能力而墮入其彀中，使陳水扁得售其奸，這就證明台灣選民的平均水準離民主理論所設想的理性、明智的公民尚有遙遠的距離。台灣社會還有一大群易受政客煽惑、空有「主人」之名而「奴才」其實，既當不了家更做不了主的假公民。而面對

主義哲學與資本主義民主中所用的“人”或“公民”雖是普遍名詞，具體指涉的卻侷限於有一定財產額度的白人資產階級男性，勞工、婦女、少數民族全被排除在外，並未享有公民權。只是經過工人階級與婦女的長期鬥爭後，“人”與“公民”的概念才在法律上有了普遍的內涵。即使如此，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仍然只是徒具形式，在法律上賦予權利與實際上是否有能力享受、踐履權利並不是一回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部分的人民實際上並不具備條件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

自由與平等的矛盾

關鍵的要害在於資本主義民主代議制把民主與平等限制在政治的所謂“公”領域內，作為資本主義基礎的社會經濟領域則被非政治化了。資產階級所要求於國家政權者正是要國家機器保障經濟自由，促進利潤最大化，事實上也就是要排拒政治與社會的外力干預私有企業的經營管理，維護資產階級控制、榨取受僱勞動者的權力，鞏固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繼而主導國家政策的方向。因此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保留了社會階級的不平等與統治支配關係。受雇傭的勞動者不但在企業內無民主權力，為維持基本生存兢兢業業替資本家在公司、工廠賣命之餘，也缺乏足夠的物質與精神條件（金錢、知識、時間）去議政、參政，對於複雜的政治、經濟公共政策與國家、國際大事難有分析、理解的能力，於是只能成為政客煽惑、媒體操縱的對象，所謂民主的政治權利除了投票選舉統治者之外，並無實質意義。民主變成政客為民作主，人民選舉授權產生的統治者，由公僕「異化」為人民的主人，而人民則淪為受政客操縱、宰制的奴才。故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制下，政治成了職業政客與其周圍的利益集團的專業，人民投完票後，就變為無力置喙的“旁觀者”。十八世紀倡導人民主

權論的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諷刺說：「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盧梭著，何兆武譯 1997：125）而政府的權力也愈來愈脫離民意的監督，成了不透明的“神秘統治權”，義大利的著名政治學家鮑比奧（Norberto Bobbio）就指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趨勢「不是朝向公民最大限度地控制權力的方向發展，反而向掌權者最大限度地控制人民主體發展。」（Bobbio 1987：97）這就是提出「菁英競爭統治論」的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為何主張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人民真正在統治，而是政客與技術官僚在統治的結構性原因（參見本刊上期李華德文）。

沒有平等，自由便不復存在

在資本主義下既沒有社會經濟的平等，政治的民主也就徒具形式，無法落實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主權，從而自由也難以確保，此所以盧梭要說：「如果我們探討，應該成為一切立法體系最終目的的全體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麼，我們便會發現它可以歸結為兩大主要的目標：即自由與平等。自由，是因為一切個人的依附都要削弱國家共同體中同樣大的一部份力量；平等，是因為沒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盧梭著，何兆武譯 1997：69）美國多元民主論的代表人物達爾（Robert Dahl）也指出：「工業資本主義自動產生財富、收入、地位與權力的巨大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又是某種自由的結果——即無限制的積累經濟資源與把經濟活動組合進層層管制的企業裡的自由。……在經濟自由導致資源分配從而直接也間接地導致權力分配的極大的不平等時，我們必須力求降低經濟自由對民主與政治平等的惡劣影響。」（Dahl 1985：50-51）達爾還指出經濟企業的私有與控制成了政治不平等的來

源：「首先，企業的私有與控造成公民之間在財富、收入、地位、技能、資訊、對資訊與宣傳的控制、接近政治領袖的機會與一般可預期的生活機會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不僅成人如此，連胎兒、嬰兒與小孩都不能避免。加上適當的限制條件後，這些差異會進而使具有同樣政治權利的公民之間在參與管理國事的能力與機會上產生重大的不平等。」(Dahl 1985: 60) 因而達爾認為公司資本主義「在社會與經濟資源上產生的不平等之巨大，已足嚴重破壞政治平等乃至於民主過程。」(同前: 60) 不僅達爾有這樣的看法，鼓吹公平、正義力圖把古典自由主義與平等聯繫起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爾斯也贊同黑格爾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坦承在極度的社會、經濟不平等下，資本主義民主所保障的自由，不過是「純粹形式的自由」(Rawls 1996: lviii)。正因為資本主義民主徒具形式，中下階級的人民無力主導政治，多半對政治抱著消極冷漠的態度，任由少數統治菁英壟斷政權，主宰國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投票率也因而普遍低落，國會、總統的大選每見未逾半數的情況。

產生台灣政治病態的癥結

台灣的政治經濟體系屬資本主義模式，不但同樣具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性缺陷，而且是用壓縮歷史時間的方式快速由威權體制轉型為美國式的民主，並不具備西方積澱數百年逐漸演進而來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與政治文化，絕大多數人民對民主的瞭解極其淺薄，公民政治素養尚低，大體上仍以為只要投票選民代、地方首長、總統就是民主，自己就真的成了「頭家」，當了主人，更遑論對台灣內外的政治、經濟與兩岸關係等重大問題做深入、準確的判斷了。台灣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比較不同的是選民投票率較高，這主要是因為民主化未久，大多數人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認知不深，

尤其受朝野政治勢力統獨爭議的影響被強力動員參與投票，而表現出政治的狂熱。

這次總統大選暴露出的民主病態，非突發而至，其實是長期來台灣分離勢力利用民主作為建國的手段所必然造成的惡果。台灣民主發展的不幸就是，先有「二二八」事件激出台獨運動，而蔣介石又壓制了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與台灣士紳結合組成的中國民主黨，遂使台灣的反對運動徹底台灣化，予分離勢力將民主化與台獨合流的良機。台獨運動刻意利用「二二八」的悲情，將「二二八」的成因曲解為省籍矛盾，誇大「二二八」的悲劇，毫無根據地把「二二八」渲染成傷亡慘重的大屠殺(史明離譜到編造死傷十餘萬人的謊言)，虛構台灣歷史神話，煽動所謂「台灣人意識」，製造中國人與台灣人的對立情緒。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反對運動正是以福佬沙文主義為核心，再披上民主的外衣，以誑騙一些天真的知識份子與不知民主為何物的蚩蚩之氓發展起來的。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為了鞏固權位，也不惜利用省籍矛盾鬥倒大陸籍權貴更強化了非理性的民粹濁流。西方在歷經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等重大運動的洗禮，理性、寬容、多元的價值觀已成深厚傳統，也透過法律、規章、制度形成一套資本主義的民主規範，菁英與政黨競爭統治大體上是按照形式公平的規則有序地進行，但台灣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由於台灣分離勢力企圖效西方建立民族國家的故智，藉著製造台灣國族意識脫離中國，遂使台灣的國族認同產生分裂，更使台灣的民主化遭逢重大的干擾，連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也難以維持穩定。

族裔衝突可促成威權統治

一般研究資本主義民主理論的學者大多從自由主義哲學出發，強調自由、理性的先驗個體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卻忽略了西方民主是在

文化同質性很高的民族國家內發展起來的。德國著名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認為，世界劃分為具有共同的道德、文化觀的主權國家，民主的平等權利只能及於同一民族國家內的公民，所謂全世界的成人在任何國家都應具有平等的公民權的人類平等觀，並不符合世界的現實。民主意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同一，因而民主只能在同一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內才能實行。因此他根據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說：「每一個實際的民主政體都建立在這個原則上，即不僅要以平等對待平等的人，同時對不具平等資格的人也不可以平等待之。因此，民主首先要求同質性，其次在必要時則要消滅異質性。」他還舉各國都有國籍法限制外國人在本國的權利，以及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並不給殖民地人民同等待遇為例來說明（Schmitt 1986：9-11）。施米特的觀念得到不少實證研究的證實。在一個族裔衝突嚴重、國家認同分歧的國家，民主確實難以落實。以研究族裔衝突聞名的何洛維茲（Donald L. Horowitz）就指出：「民主涉及接納與排斥、接近權力的機會、因被接納而獲得的好處與隨著被排斥而遭受的懲罰。」，「族群衝突使得民主化的發軔與民主的實踐困難重重，這點雖已廣為人知，但這些困難的性質，特別是族裔衝突根植於當地結構之深，並非純靠表現善意即可輕易解決，這點卻少有人闡述。族裔問題在民主化的門檻前設置障礙，在跨過民主化的門檻後也仍是塊絆腳石。族裔衝突以直接或間接的多種方式可有助於造成威權統治，而且至少有同樣多種的方式，民主會有利於形成排斥少數族裔的多數統治，或者排斥多數的少數統治。」（Horowitz 1994：37）

我們以施米特與何洛維茲的觀點對照台灣當前的統獨爭議與朝野對抗便可見其癥結。台灣分離勢力多年來一直力圖建構一個與中國、中國人對立的台灣國族認同，其手法是曲解台

灣歷史、虛構台灣人四百年歷史的神話，透過選舉與政治集會訴諸台籍人士的直覺情感，大肆混淆「台灣」與「台灣國」、「台灣人」與「台灣國人」的概念區別，利用台籍人士對台灣的鄉土情感轉化為政治性的台灣國族認同，並以「本土化」之名將「中華民國」混同於「台灣國」，力圖祛除台灣居民原有的中國認同，而為了便於贏得選舉掌握政治權力，每至選舉必以煽動省籍情結，強化省籍矛盾與國族認同分歧為主要手段，把不支持台灣建國者打為「不愛台灣」、「出賣台灣」的非我族類，於是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日益嚴重，對立之勢日益惡化。由於台灣分離勢力深恐中國大陸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持續加深，將不利於分離建國，於是訂出2008年制憲建國的時間表，視這次總統大選為攸關台獨成敗的關鍵之戰，卻因選情不利，終於圖窮匕見，卸下戴了多年的民主假面具，演出一幕幕明目張膽地反民主醜劇。

民主與法西斯的分岔口

林茲（Juan J. Linz）與史德本（Alfred Stepan）在討論民主鞏固的文章中，對政治認同問題提出看法說：「因為政治認同不是永久固定不變的，民主政體領導者的品質就特別重要。政治領導人可以培養多重與互補的政治認同，也可以造成政治認同的兩極分化與衝突。」（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2001：107）衡諸李登輝在大選中曾揚言此役目標在「徹底消滅外來政權的殘餘勢力」，選後則聲稱要再努力加強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使贊成分離的台灣居民上升到75%，而陳水扁則汲汲於竊登總統大位，大舉封官授爵，處心積慮要在年底的立委選舉爭取席次過半，台灣政治認同的兩極分化與泛綠陣營法西斯化的橫流恐怕還難以轉向消歇，台灣正走在民主與法西斯的分岔口，有識者當早為之計。◎

參考書目

01. Bobbio, N. (1987)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02. Dahl, R. (1985)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03. ———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04. ———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05.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06. ———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07. Horowitz D.L. (1994)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35-55.
08. Linz, J. J. and Alfred Stepan (2001)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93-112.
09. Rawls, J. (1996)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0. Stepan, A. (1998) "Modern Multinational Democracies : Transcending a Gellnerian Oxymoron."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19-237.
11. Schmitt, C. (1985)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2. 盧梭著 (1997) 《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選我五張同情票！」 / (明報)記者 現場採訪報導 /

林女士 (來自高雄，48歲，家庭主婦)：

子彈會轉彎，哪有這種騙子，騙了我們5票，還我5票！我和阿扁拼了。真的太可惡了，他欺騙我們，他中槍後，我很同情，我和我家人講，你們如果投連宋，馬上給我出去，結果他們全部聽我的，投給阿扁。太可恨了，你都不曉得，我心甘情願投你，無所謂，可是我受騙了，你要怎麼還我，我成了我家裡的罪人，我爸爸罵我，我媽媽罵我，兒子罵我，女兒也罵我。我要求重新投票，還我5票。

扁有作弊前科 / (明報)記者 現場採訪報導 /

陳先生 (來自屏東，60歲，漁民)：

坐了6個小時車來，很累，但是值得，因為台灣民主要滅亡了，我們要站出來，再辛苦也要出來，要求緊急驗票。台灣的子彈會轉彎，你們香港相信嗎？真相不白啊，陳水扁當年在台南選舉的時候也有作弊的嫌疑，是有前科的。屏東也不全部都是民進黨，他如果做得好，不管是什麼黨我們都會接受，我無黨無派，但是他一句政績都講不出來，就說如果沒有投給民進黨的就是中共的同路人，這是撕裂族群。

廣場 詩文 錄

為抗議總統大選不公而長期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婦女以詩文投寄本刊，表白他們參與的心跡，這些材料堪為這場民主運動可貴的歷史材料。【編者】



靜坐女學生。關立衡 / 攝影

參加四月學運的心得

汪震亞

我雖沒有投票權，卻一樣關心政治

成熟的民主形式，應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否則就是民粹，四月學運就是一群對現狀不滿的大學生，以理性而非暴力的手段，改造這個社會，力量很小，精神卻很偉大，自從開始絕食當天，我十分受到感動，想立刻加入靜坐學生行列，當然我也可以選擇家裡，研讀一些就讀大學之前的書籍，多背幾個英文單字，關掉電視，假裝什麼也沒發生，但我認為，自己的未來要靠自己掌握，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一切，都要我們這一代承擔未來的後果，身為高中生，無法行使投票權，意見往往不被當作民意看待，如果選擇保持沈默，只能讓別人決定自己的未來。因此我要藉此向社會表示：我雖沒有投票權，卻一樣關心政治，不默默地承擔一切，我要盡一己之力，為這個社會以及我的人生，爭取美好的未來。

各位大學生為了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將個人利益拋諸腦後，不顧可能影響學業的情況下，絕食絕水，尚不能打動掌握權力的人，此時陳先生和某附中學長無動於絕食學生命在旦夕，一再拖延，不肯正面回應五大訴求，企圖舉辦全國學生會議，稀釋靜坐學生的意見，並贏得博納雅言的美名，卻連自己請來的學生，也以敷衍的態度應付，實問虛答，也難怪社會評價不高，幸好靜坐學生沒有參加，否則又要受政客愚弄，我當下做了一個決定：如果沒有升學的壓力，我一定要前去中正紀念堂參加靜坐，以表達對他們的支持，以及對於掌權者的傲慢態度的不滿。

四月十五日放榜，我考上台灣大學，就前往中正紀念堂。根據這幾天媒體的報導，靜坐學生已不再絕食，一切生活需求都有義工代勞，舉凡清潔場地、維持秩序這些本因由學生親自來做的事，也統統推給義工，不必親自動手，學生只要像溫室的花朵一般坐在帳棚內，聊天消磨時間，言論完全受到幹部把持，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萬一被認為意見不同，甚至會被打出場外。乍聽之下，到中正紀念堂靜坐似乎是毫無意義的活動，但是這段敘述和我之前所聽到的說法不同，因此我對這段敘述頗懷疑，所以並沒有改變我親自參與的念頭。

歡迎泛綠學生參加靜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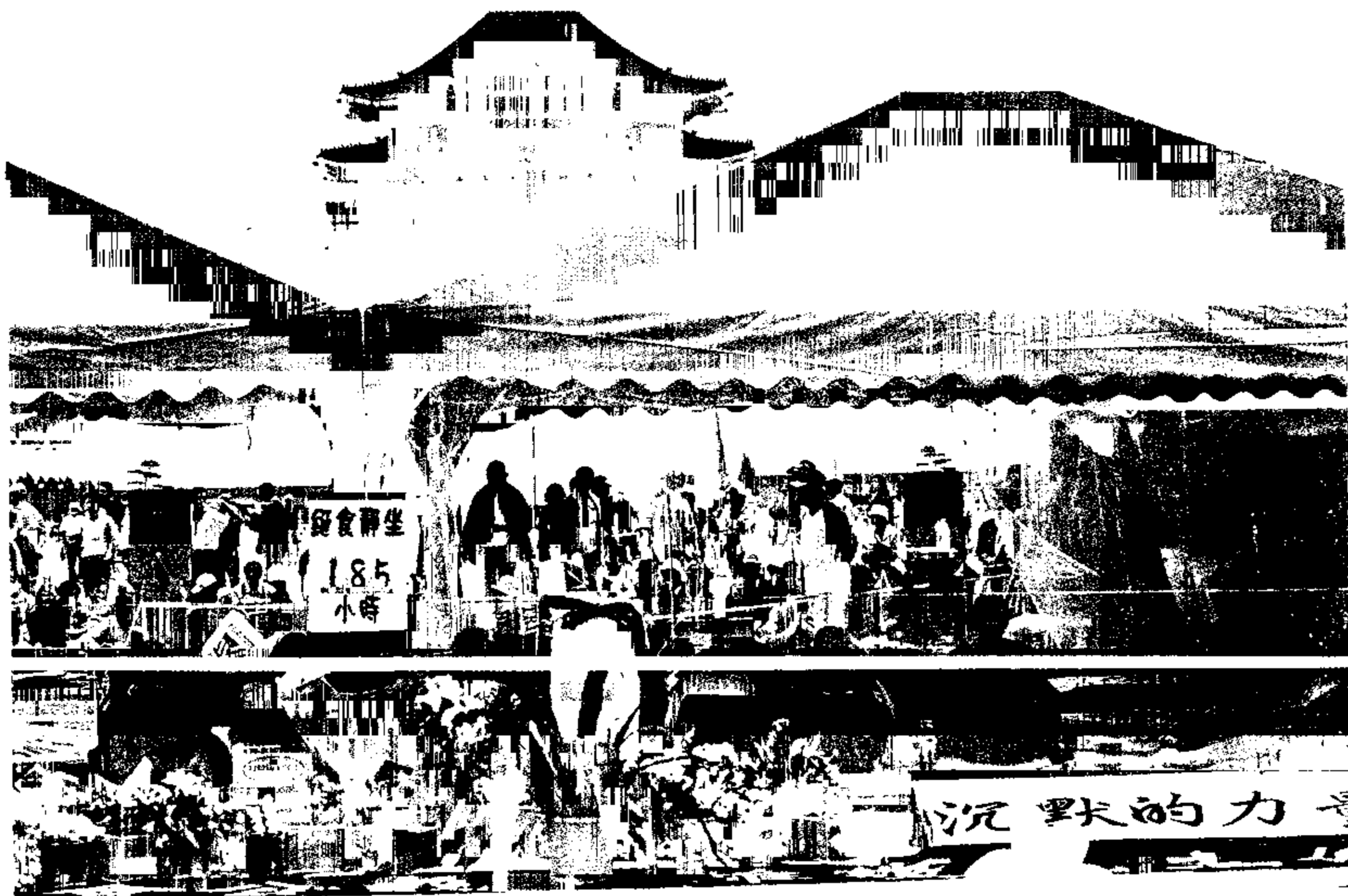
乍到中正紀念堂，我仍然受媒體影響，擔心被誤解為綠色學生，說話異常小心，甚至幾乎不太與別人接觸，只有大學生們不厭其煩地為我解說四月學運的訴求，我才漸漸融入其中。其實現場也不乏支持民進黨的學生，也有民進黨的選民，絕不是像媒體說得那樣，不容許立場不同的人進入，我們一直強調，歡迎泛綠學生參加靜坐，也歡迎泛綠

選民晚上來中正紀念堂逛逛，畢竟這不是政黨造勢活動。當晚，我正想去廁所，才知道在這裡，晚上不能單獨去廁所，因為曾經有學生「夜路遇襲」，必須由義工陪同，但是在媒體上，卻從未發現相關報導，這件事令我感到相當震撼，台灣十多年來的民主，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以平息政治衝突為主要訴求之一的活動，卻受到不同意見的人如此對待，真是一大諷刺。

這幾天晚上，除了靜坐學生和邀請的教授上台演說之外，還公開徵求民眾的發言，和媒體上所描述的「一言堂式的個人崇拜」完全不同，事實上，學生內部的決議，都是經過在場所有學生的討論，每個學生有同等的發言權，只要有意見都可以提出來，不論先來後到，有無參加絕食，都沒有差別，幹部也沒有明顯高於其他人的地位，只是工作量比其他人大，沒有如外界所說的事務獨裁權。有時候我還會懷疑，一個長期抗爭的團體，怎麼這麼多天來，都沒有發展出完整的領導組織，其實在四月十二日發現陳先生連自己請來的學生都已敷衍的態度應付，不願正面回應他們的訴求，感到對政客的失望之前，他們從來沒有打算長期抗爭，因此直到十五日，整個組織架構都還在摸索當中顯得亂無章法（當然這也是廣受各大媒體嘲笑之處），過了幾天才慢慢成形，因為這次學運純粹由學生領導，沒有幕後黑手操控，缺乏技術指導，才會如此。

四月學運相較野百合更是處處唯艱

四月學運之所以延續到今，除了依靠各位大學生們不顧自身利益，為公理、正義、民主、和諧奮鬥外，還要靠許多對現狀不滿的民眾熱心地為我們提供物資，或是擔任義工維持現場秩序，但是外界誤以為我們是泛藍政客利用的棋子，這些民眾的幫助也「理



靠著各方愛心支援，學生靜坐持續展現力量。
關立衡／攝影

所當然」是泛藍陣營所提供，但如果親身參與，就可以知道，其實四月學運的處境比十四年前野百合艱難得多，野百合整個活動所需的物資，許多都是由民主進步黨提供，這些學運前輩們無需為後勤問題費心，但是十四年後的今天，由於這個社會已經習慣於「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思考模式，以我們「可能與某些政黨勾結」為由，拒絕接受我們的訴求，為破除謠言，證實我們的確代表社會上的中道力量，我們不得不婉拒政黨的奧援，一切物資都由社會人士贊助，我們從未受任何一個特定政黨利用。

經過這四天的參與使我發現媒體所報導的內容和實際情形真的有非常大的差別，學生們不僅必須操心後勤問題，還得小心不能和特定陣營太過密切，相對於從前野百合可以向民進黨請求物資支援，這次學運的確有很多困難，尤其還必須隨時注意自己的行為，因為記者通常只記錄他們想報導的，會根據他們肉眼所能看到的一切，加上自己豐富的想像力，撰寫新聞稿，難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點我們可以諒解，我們只能盡

量避免瓜田李下的行為。

許多人質疑我們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才舉辦這場學運，可能是「不想見到民進黨總統連任」，在時機上十分敏感，令人懷疑，其實這個時間點抓得很好，因為政客為了選舉進行操弄，使得台灣社會嚴重撕裂，而執政黨不但不能扮演調和的工作，反而從執政之初，直到現在，只著眼於政黨選舉利益，忽視中華民國永續發展，針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有中道的力量，促使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反省自己的言行，倘若我們在三月二十日之前舉辦，可能有意圖為特定候選人造勢之嫌；如果等五月二十日之後才來做，又可能牽涉立委大選，所以才在四月開始，以便表明我們與選舉無關，只是普通的由民間自發之學生運動。

四月學運的訴求

四月學運訴求非常簡單，不外乎是追求真相、族群融合、社會安定，但外界常認為這些訴求和泛藍陣營「不謀而合」（可能和泛藍最近要求立即司法驗票、獨立檢察官偵槍擊案有關），不斷為我們扣帽子，說我們是「泛藍政

客的打手」，我覺得這種推論有些偏頗，首先我們尋求真相，只是為了還藍一個公道，還綠一個清白，贏的人贏得心安，輸的人輸得心服，藉以緩和這個社會上的不安與衝突，如果陳先生是以光明正大的手段取得勝利，查明真相正好可以為他鞏固政權，何樂而不為呢？我們相信這個政權的正當性，希望陳先生能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槍擊案，並以公正的方式證明自己是合法的總統當選人，以平息社會的紛擾。詎料這麼一個對陳先生有利的訴求，卻未能獲得正面回應，只是一再迴避，甚至企圖把這個學運抹藍，認為調查真相是在幫助泛藍陣營，把這次學運污名化為政治鬥爭的一環；許多媒體也認為我們這項訴求「明顯偏向泛藍」，可能受泛藍操作，模糊四月學運的真正本質，這些媒體與政客的作為令我十分不解：為何大家都一口咬定「真相」一定對泛藍有利呢？其實泛綠陣營不必一聽「真相」就全身神經緊繃，「要真相」是為了平息爭論，不是為了翻盤。

此外，許多人誤以為這次學運只是因為支持的候選人沒有當選，才臨時舉辦，如果有親自參與，而非只是聽媒體的二手傳播的人，就會知道在四月學運的五大訴求中，並沒有提到「翻盤」、「下台」等攻擊性字眼，也沒有特別偏愛特定政黨，只要認同真相，以及追求和諧的人，不論其成分藍綠，我們都非常歡迎，我們的宗旨不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是為了文化目的。台灣社會之所以會因為選舉而撕裂，就是因為台灣空有民主制度，卻缺乏民主文化，歐美國家即使出現雙方候選人勢均力敵的情況，也很少發生民眾因為支持對象不同而產生衝突，但是在台灣，說話必須異常小心，以免被「另一邊人」看出破綻而暴力相向，鑑於這種社會型態，我們希望使大家瞭解民主的真諦，不論支持一號還是二號，對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感情都是一樣的，不必為了一時的選舉，

使台灣經驗成為民主鬧劇。因此，我們既沒有企圖使總統大選結果翻盤，也不打算影響立委選戰。

歡迎加入，我們共同為民主發聲

如果現在看到這篇文章的人，想為安定社會盡一己之力，歡迎你為我們捐獻物資，但我們拒收現金，需要的物資寫在靜坐區前的白板上，或是下班後來參加我們安排的晚會，聽一聽我們的主張，回去後把它告訴所有你認識的人；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卻礙於居家離台北太遠，或忙於學業及工作，無法親自前來中正紀念堂，也歡迎你們多利用網際網路或BBS發表支持我們的言論，或是向各大報讀者投書欄投稿，聲援四月學運；如果你是泛綠支持者，也不必排斥，四月學運不是政黨造勢晚會，也不是為了推翻政府而舉行，而是為了使政治人物能對這幾年來的所作所為反省，並修正自己的言行，不再為了私利離間民眾，共同維護這個社會的安寧與和諧，不再為了選舉相互仇視。只要每個希望安定社會的人，不分藍綠、省籍、南北、宗教、階級都能出一份力，我相信「孤挺花」學生運動的訴求，將來一定能廣受民眾的認同，各位的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後盾。

最後，我要勉勵各位大學生，我們的訴求，是多數國民共同的心願，雖然這一陣子飽受執政黨的忽視、媒體的誤導，使民眾對我們的訴求產生錯誤認知，但是往聖有言：「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只要是正當的事情，不管別人怎麼打壓，都要鼓起勇氣堅持下去，這才是真勇敢。目前我們的聲音或許很小，無法吸引當政者以及媒體的注意，但我相信總有一天，這次的學運會廣受主流民意所接受，並且在中華民國的民主發展史上記下光輝的一頁。◎



我們之所以集合在這裡靜坐，是因為我們對於政治的各種亂象十分憂心。台灣的民主已經走了十幾年，族群的矛盾、政黨的惡鬥，對我們所居住的土地所造成的傷害，實在不容忽視，我們不能再做沉默的一群。身為社會上的一分子，從小生於斯，長於斯，台灣這塊土地對我們的恩情，促使我們勇敢地站出來，不畏懼外界的打壓，為台灣社會的安定和中華民國的未來盡一份心力，所以我們決定加入靜坐抗爭的行列，不僅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文■一群婦女 / 圖■李文吉

我們為何支持學運？

我們不再選擇「被動」，尤其現在！

當學生從容站上政治舞台時，權力卻如狼一般「虎視眈眈」！

四月二號，一群大學生為了希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能正視他們的訴求，追查真相、族群和諧、社會安定，決定絕食絕水。我們擔心他們的身體可能撐不下去，不約而同來到中正紀念堂照顧他們。我們之中，有些是靜坐學生的母親，其餘大部分本來和這些年輕人並不認識，只是因為認同他們的主張，才參與了這次學生運動。我們雖然沒有和他們一起絕食絕水，但眼看著他們一個一個倒下，我們內心的痛苦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我們能做的，只

有期盼在總統府裡錦衣玉食的陳先生，可以發揮一點惻隱之心，親自來靜坐區慰問孩子們，正面回應五大訴求，結束他們的痛苦。

經過漫長的等待，民進黨不但不安排陳先生到中正紀念堂傾聽他們的聲音，反而急著追查參與絕食學生的身分，利用他們的背景來模糊他們的訴求。有個孩子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拿出黨證撕毀，一時情緒激動昏了過去。民進黨依然不予理會，繼續抹黑他們，這件事令我們十分感慨，在這個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社會，這場學運勢必走得比過去來得艱難。

請學生再絕食三天，因為總統很忙！

四月八號，我們希望陳先生能立刻來這裡和學生對話，針對他們的訴求做出正面回應。因為他們絕食絕水已經到了第五天，身體很可能無法負荷，也有很多人送醫急救。可是替他傳話的羅委員竟然要他們等到十二號，再開全國學生會議，因為「總統很忙」。至此，我們對當權者已經完全失去期待，經過了四年的執政，民進黨腐化的速度令人惋惜。當初充滿理想的民主鬥士們在獲得權力之後，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民眾之所以把票投給民進黨，是希望他們比之前的國民黨更好，不是提供他們腐化的藉口。現在看來，他們眼中只剩下選舉，早已經失去了人性，於是我們不再對這些政客有所期待，我們決定背棄政客，面向群眾，以人民自發的力量，使政治人物對他們這幾年的不當操作，好好反省。

對於他們提出的全國學生會議，我們勸孩子們

不要上那些政客的當。看看政客們這幾天的表現，就足夠證明他們缺少誠意；再說參加那種會議的學生，本來就是民進黨親自挑選的，能不能代表全國學生的意見還很難說，他們是為了藉著這個會議把絕食學生打成少數，稀釋他們的訴求，參加了絕不會有好下場，所以才沒有參加。後來事實也證明，不參加的決定是對的，因為他們就連對自己請來的學生都以敷衍的態度對待，除了中華電信ADSL降價的部分還算有事先準備之外，其他問題都是實問虛答，草率應付了事，最後這總統的期中考也只得到20.5分的成績，還給他兩週補考的機會，現在兩週的期限到了，他有什麼長進嗎？

當權者畏懼人民的聲音？

我們說要追求真相，並不代表我們不相信這個政權的合法性，而是因為三月十九號的槍擊案真相未明，我們要比照陳文成命案、林義雄血案模式，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出真正的兇手和動機，以安定社會上不安的氣氛。並藉著司法驗票，證實陳先生確實受到過半選民的支持，很多人說陳先生這次之所以險勝，是



只要「真相」告訴我們選舉結果不變，那麼，「阿扁，我們支持你！」
(阿扁，你還在怕什麼？)

台灣主體意識昂揚的結果，既然如此，泛綠的政治人物理當對結果很有信心，應該不會反對驗票訴求才對。但他們卻一口咬定我們這項訴求是在幫助泛藍，令我們十分困惑，如果泛綠贏得心安，就應該更加支持我們的這項訴求，證實這個政權受過半民意支持；如果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也可以諒解他們為什麼一直杯葛立即司法驗票，又反對成立專案調查委員會。但希望不是這樣，因為那將使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蒙羞。我們認為只有查明真相，才能抬頭挺胸地說：「我們的領導人是以光明正大的手段贏得政權。」

本省人？外省人？中國人？台灣人？ 這是全民福祉的關鍵嗎？

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來，全體人民不分彼此，共同為了自己的家園奮鬥。可是這十幾年來，很多「本省人」、「外省人」、「中國人」等名詞充斥在媒體上，剛開始，這只是選舉期間才會出現的一種騙選票的噱頭，選完之後，社會上還是一片和諧，曾幾何時，在政客和媒體的「潛移默化」之下，省籍觀念漸漸深入人心，嚴重撕裂人與人的關係，成為一個隨時會爆發的潛在危機，就像是「自行發揮」。

到了這次總統大選，為了贏得勝利，部分政客不顧中華民國的長治久安，只著眼於權力的獲得，利用省籍、地域、階級、黨派加以分化選民，執政黨不但不善盡自己調和內部矛盾的職責，反而為了選舉利益，以激烈的言詞污辱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加深雙方的隔閡。選舉前，他們包圍中台禪寺，只因為支持的候選人不同，請大家想一想，挺扁的長老會是「愛台灣」，挺連的惟覺法師是「妖言惑眾」，為什麼信耶穌的就可以享有表態的自由，信佛的就一定要保持中立呢？這樣不懂得尊重不同意見的人，算是有民主精神的人嗎？我們要以人民的力量，表示對這些「假借民主之名，行民粹之實」的政客的不滿。

四月學運一開始，我們只是為了關心這些大學生才來中正紀念堂，同時也表示我們認同這次學運的訴求，後來眼見政客的冷漠、媒體的忽略、社會的誤解，我們決定加入靜坐的行列，盡我們最大的力量，喚醒民眾對社會的期許。我們的訴求是台灣人民共同的心願，希望不分藍綠，都能認同我們，現在我們的聲音或許很小，但我們的訴求是台灣人民共同的心願，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獲得主流民意的認同。◎

「要槍擊真相」

《明報》記者 現場採訪報導

余先生（來自新竹市，商人）：

我覺得如果社會動亂就沒有生意好做。誰當總統我們不介意，我們要的是（槍擊）真相，用沒有倫理道德的手段來奪得總統位置，我們要發出聲音，出完了我們就回去，回歸生活。有人要台灣獨立，有人要回歸大中國，這是很矛盾的，政黨政治在民主國家是很正常的，我們也很同情獨立的人，也知道統一是一件很龐大的工程，讓600萬人和600萬人互相對抗，這需要很大的智慧才能解決。我相信（集會）過一過就好了，不擔心暴亂。

2004.03.28 香港《明報》A4版

本刊第四期曾轉載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實扼要分析當前大陸工人階級狀況的報告，本期我們收到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戴建中先生的未刊稿，這篇出色的論文結合理論分析與實際的調查材料，深刻論述了二十多年來大陸

社會轉型中的 中國工人階級

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在客觀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與主觀的階級意識上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值得細讀。【編者】

■戴建中（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中國社會經濟轉型20餘年來，工人階級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包括：內部結構的變化、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變化以及自身階級意識的變化。

我在本文中將引用近幾年來我所參與過的訪談調查資料（註一）來加以論述。

一、今天誰是工人

1. 知識份子是不是工人？

1978年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為知識份子「脫帽加冕」，摘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歸入「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註二），當時對於從五十年代起一直承受思想改造、反右運動等無休止的政治衝擊，直至在文革中倍受迫害的知識份子來說，無疑是又一次政治解放。時至今日，「工人階級已經成為一個包括產業工人、其他工人、知識份子、管理幹部在內的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註三）這是制定政策的依據和輿論宣傳的基調，知識份子已被公認為「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註四），知識份子的社會、經濟地位已經大大提高。但是，這些是否就能夠證明工人階級「結構不斷

優化，整體素質不斷提高，先進性不斷增強」，「是我們國家當之無愧的領導階級」（註五）呢？

一個根本性問題是：知識份子是不是工人？如果從社會學社會分層研究角度來看，至

註一：這些調查包括1999—2000年對北京下崗工人的訪談；2002—2003年對以下企業的調查：

R廠：北京一家生產印刷機的國營企業；

J廠：北京一家中外合資汽車製造廠；

H廠：浙江一家著名私營化工廠；

S廠：福建一家台資制鞋廠；

Z廠：河南一家國營企業，幾年前被私營企業兼併，後又事實上推翻兼併，並在工會領導下維持至今；

C廠：遼寧一家大型國營造船廠。

註二：《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頁。

註三：王兆國《在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3年9月22日。

註四：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2年10月12日。

註五：段若鵬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階層結構變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頁。

少有兩個主要概念仍然是模糊的，即：什麼是知識份子？什麼是工人？這兩個概念在那些方面可以重疊，那些方面不可以，概念中的本質性主幹可不可以重疊？

在中國劃分階級往往要服從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是要使每個中國人都「對號入座」的，因此必須強調「可操作性」，例如把知識份子就定義為「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註六）。但是社會學的分層研究是基於不同的社會學理論來對社會成員進行分劃的，並不是簡單化的直接給人「貼標籤」，這就如同社會科學研究並不同於社會政策制定一樣。

如果從以韋伯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學分層理論出發，普遍採用以職業為基本劃分依據的分層方法，知識份子「白領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主要從事科技研究、教育、文化創作、經濟社會管理與諮詢等職業，以腦力勞動為主要工作方式。而工人從事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商業、服務業中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職業。一些知識份子在研究中講到：現代社會中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區別已經越來越小，知識經濟的降臨已經消滅了純粹的體力勞動。可惜，在今天的中國，大量存在的體力勞動是這樣明顯、這樣沉重，不是用理想化的未來描述就能掩蓋的了的，對於此類輕浮的論調，我只能借用一句工人的話來回答：「看人幹活不腰疼！」

如果從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出發，知識份子和工人都不佔有生產資料，都以工資為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但是他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工人從事直接的物質產品的生產、運輸和銷售，但在這整個運動過程中，處於被支配、被管理的地位。而知識份子則複雜得多，那些與生產直接相關聯的工程技術人員，雖與工人有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但仍然可以列入馬克思所分析的「總體勞動」（註七）之中；而從事文化、藝術、教

育、醫療、科研的知識份子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于工人，與物質生產沒有直接關係，工作內容屬於「上層建築」，把他們歸入工人相當勉強，他們內心也已經很少會把自己視為「工人」，今天的工人也絕不會再像文革時那樣稱大學教授為「師傅」了。

「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強調了是否佔有「組織資本」、「文化資本」等對於階級劃分的重要影響，從這個視角出發，知識份子與工人的差別就太明顯了。在經濟領域中，知識份子的作用越來越舉足輕重，他們不斷鼓吹和實施新「知識經濟」，負責高技術經濟的運行。資本不能不讓他們分享權力和利潤。各國知識精英正步入全球經濟的中心舞臺，迅速成為世界新貴的一部分。

至於管理人員是不是屬於工人階級，也是一個需要正視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在原來計畫體制下，管理階層通過國家政權實施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工人階級主人翁」的領導權實際上是掌握在這個階層手裡，這個階層也以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自居，當然自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是一個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如果這批工人階級「公僕」在得不到工人階級有效監督的情況下，一部分人蛻變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新階級」時，他們到底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還是對立物？90年代末前蘇聯、東歐的劇變不能不使人對此進行嚴肅的思考。

「其實現在大多數工人，包括社會上的很多人，就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不是像原來那樣說咱們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工人階級處於領導地位。這是過去的說法。但真正來說，不可

註六：閻志民《中國新階段階級階層研究》，2002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72頁。

註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6頁。

能。所謂領導你領導誰去？你怎麼體現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哪個是你們家的？廠裡的這麼多東西哪個是你的？沒有。哪個說國有資產是你的？不可能。沒有。哪項工作你能做出決定，說這個企業的工作怎麼辦，不可能。為什麼？你的經濟地位和你的政治地位決定了，你不可能。」（R廠，W，分廠工會主席）

在中國發生市場經濟轉型後，新的私有制生產關係已經形成，原來的公有制經濟也發生了許多本質的變化。高級經理人員，在生產體系中仍然處於領導、支配地位，但是現在這種支配權力是資本所授予，運作目標是實現資本的收益，他們的高薪之中也分享了資本的利潤，他們是「總體資本」的組成部分。所以在歐美和日本，高級管理人員都是不能成為工會會員的。生產率提高的收益和不斷增長的利潤源源不斷地流入資本所有者和高層管理者的錢包。他們和廣大工人之間不斷擴大的工資福利差距正在形成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一個少數富裕的精英制的主流社會和一個越來越多貧困者、失業者組成的被排斥的邊緣社會。

其實在企業的現實場景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差別早就是涇渭分明的了。

R廠因積極改變分配辦法引進了工資談判制度而在當地非常出名，但工資談判並不是集體談判，而是廠方與受雇者之間進行個人談判：

「現在技術員的工資是一對一的談判。掃大街的不談判，就這麼高，市場價。一般工人也不談判。你不幹，我找別的人幹，有的是人想幹。

當時我們搞分房，正好是最後一次分房，那次分房是所有的骨幹都分到房了，班組長以上差不多都分到房子了。原來我們制定了把有限的住房分給最困難的職工，後來我給它改成把有限的住房分配給貢獻最大的人。就這一個詞，分成專項打成分，其中職務高的人比低的那就是貢獻大；他當班長你沒當，他就比你

大；他有職稱你沒職稱，他就比你大；學歷，他大學畢業你初中畢業，大學就比你高。」（W）

「工人幹的活又苦又累，我現在穿的這身工作服算是乾淨的，要是下班時你再看，後背就濕透了。夏天在船裡焊接，又悶又熱，冬天船板冰涼，就先看這工作環境就比管理人員艱苦多了。但我穿著這身工作服，廠部大樓就進不去，只能跟接待室談。」（C廠，X，女工）

H廠是著名的私營企業，老闆已進入高層政壇，這個廠的工會負責人告訴我們：

「我們發現這個企業裡面，中層一級幹部，他辦事情只對老闆負責，對職工可以說是不負責的。為什麼？他認為我這個幹部是老闆任命的，只要老闆相信我就好了。有些職工同中層幹部鬧矛盾，實際上這個事情是中層幹部不合理、不公平，但是到了上面，老闆還是會聽這個幹部的，不會為了你這個職工同這個中層幹部唱對臺戲，不會為了你把這個幹部免掉，再把這個幹部怎麼樣，不可能產生這個情況的。那麼職工想，我在這個企業裡面，不能對這個幹部提意見，要提意見，就要做好辭職的打算。你要打擊報復的啊，那我只有走了啊。職工在企業裡面，任何人同企業兩者之間，職工是弱勢群體，沒有辦法跟這個企業較量啊。」

C廠是國營大廠，T是工人，男，51歲：「現在提升很難，工人永遠是工人，就像印度電影《流浪者》裡說的：法官永遠是法官，流浪人永遠是流浪人。」

從80年代初起把知識份子列入工人階級之內，泛化工人階級含義，在當時對於批判文革、解放思想曾經有過積極的政治意義；到今天只有意識形態上的作用了，對於分析中國社會結構造成了許多混亂。

2. 產業工人隊伍並未縮小

對上面分析的反對意見是：「如果還是把工人階級的定義局限在體力勞動工人，理論未

免過於陳舊，伴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體力勞動的成分將快速下降，豈不是工人階級很快就要消失了？」一些學者以西方國家為例，認為以知識份子、管理人員為主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工人階級已經萎縮，社會結構已經從金字塔型轉向紡錘型。前幾年，「中產階級」論也很在中國熱了一陣。不錯，任何階級都有自己產生、發展、衰亡的過程，對於工人階級也並不例外。但是，工人階級在中國的衰亡，仍是下一個歷史階段的事情。發達國家工人階級人數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以電腦廣泛應用為標誌的生產工具改良，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二是在經濟全球化中，隨著資本的轉移，傳統工業已經從世界體系的

「中心」地帶遷移到「邊緣」地帶。但也正是這兩條理由，使中國的傳統產業工人大軍還將長期維持下去。中國正努力在世界經濟「分工」中充當製造業的「世界工廠」，吸引外資的「優勢」正是勞動力的廉價，這就決定了正源源而來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的重點不會是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企業，因此奢談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消失，不免過於性急。

試以製造業、建築業、運輸倉儲業的從業人數為例列表說明（註八）。

註八：表1、2、3、4資料引自《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第130、414、146頁。

【表1】製造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3947	2449	1346		916	4863
1985	4620	2975	1608		2741	7361
1990	5304	3395	1773	469	3229	9002
1995	5439	3326	1417	1254	3970	10663
2000	3240	1415	519	1933	4109	9282
2002	2907	979	346	2135	4506	9548

* 職工「指在國有、城鎮集體、聯營、股份制、外商和港澳臺投資、其他單位及其附屬機構工作，不包括：（1）鄉鎮企業就業人員；（2）私營企業就業人員；（3）城鄉個體勞動者；……（7）在城鎮單位工作的外方港澳臺人員；……」

* 鄉村從業人員「按從事的主行業劃分，如以農業為主，兼營商業的，仍作為農林牧漁從業人員」。

九十年代以來，鄉村企業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是鄉村集體經濟為主，以後相當大量的賣給了私人，但地處農村，仍被歸入鄉村企業；沿海地區許多「三來一補」外資企業，因為建立在農村集體的的土地上，也稱為鄉村企業。

【表2】建築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710	475	235			710
1985	900	545	354		1152	2052
1990	896	538	357	23	1523	2442
1995	1053	605	427	70	2204	3327
2000	744	372	261	145	2692	3581
2002	756	302	218	213	2959	3928

【表3】交通運輸倉儲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714	498	216			714
1985	823	585	237		434	1257
1990	895	660	232	182	635	1702
1995	824	677	138	419	983	2226
2000	659	549	56	446	1171	2276
2002	613	498	39	402	1259	2274

【表4】製造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業從業人數（萬人）

年份	職工（其中：國有企業 城鎮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鄉村從業人員	合計
1980	5371	3422	1797		916	6287
1985	6343	4105	2199		4327	10670
1990	7095	4593	2362	674	5387	13146
1995	7316	4608	1982	1743	7137	16216
2000	4543	2336	836	2524	7972	15139
2002	4276	1779	603	2750	8724	15750

上面4個表的問題是無法把「從業人員」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去除，但他們畢竟所占比例不大，仍可看出產業工人人數並沒有大量減少，如果考慮到商業、服務業中體力勞動者的增加，整個體力勞動工人人數事實上還在上升。

那麼怎麼解釋「下崗」呢？「下崗」的理由之一不正是「產業結構性調整」嗎？事實是傳統產業並未萎縮，但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發生了勞動力的重新分配，勞動力從工資、福利較好的公有制企業流向較差的私有企業，其結果是進一步減輕了資本的勞動成本而從總體上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當初「下崗」的理由之二是「減員增效」，這也不是事實。減員後企業真能增效？國有企業「三年扭虧增贏」並未總體見效就說明虧損另有原因。工人離廠「下崗」倒是為出賣國有企業掃清了障礙。從整個中國來說，既沒有出現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戰爭，又沒有大

規模移民的機會，是不可能「減員」的，企業「減員」，就必然是社會負擔「增員」，而社會負擔歸根結底還是企業納稅和繳納保險金而來，人總是要吃飯的，只是原來從企業拿的工資多一些，現在從社會領取保險和救濟更少一些、更尷尬、更不穩定一些而已。

3. 外出「農民工」正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80年代起，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打工，他們逐步溶入工人階級隊伍之中。目前農村戶口的勞動力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城市裡的農民工已有9820萬人，已占到第二產業從業人數的57.6%，占加工製造業從業人數的68.2%，占建築業從業人數的79.8%占批發零售業從業人數的52.6%（註九）。

註九：《工人日報》2004年2月27日、3月5日。

許多打工仔、打工妹已進城多年，最長的已有十多年二十年，已成為「打工叔」、「打工嬸」，甚至下一代也快成新的打工仔了，時間已經磨去他們身上原來小生產者的散漫性，鑄造出大工業生產所必需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工作方式、思想觀念方面逐步與城市工人階級殊途同歸。他們基本已經不回農村務農，工資已是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他們把土地只當作失業後的最後「保險」。他們中許多人逐步具備了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徵。現在他們與城市工人最大的差別是沒有城市戶口，在城市中仍然遭受文化排斥，從事的往往是最艱苦、報酬最低、最不穩定的工作。這也影響著進城務工者的階級認同感。

C廠小W，23歲，自小從未幹過農活，初中畢業以後一直務工，從農村來到大城市也有5年了，當談到認為自己是工人還是農民時，他說：「我是打工的，正式工是正式工，我們是臨時工。我也希望工會能管我們，但不可能，因為我們戶口不在這裡。對於將來也想不了那麼多，趁年輕多幹點，實在不行回去做個小買賣。」

原本在有城市戶口和沒有城市戶口的工人之間確實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門檻不一樣高、同工不同酬等問題，但資本的趨利性並不認識戶口，資本要衝破這些約束，要在這兩種工資水準中就低不就高，要用工資更低的「農民工」替代原來的城市工人，要用更加沒有組織的「新工人」替代對單位組織比較留戀的「老工人」，使得城市居民的優越性逐漸消失，進城務工者和城市居民在就業、生活方面逐漸同質化，這其實就是「下崗運動」的實質。今天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也可以進一步滿足資本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要求，對於勞動者來說，可以增加在這個老闆和那個老闆之間的選擇性，但不會改變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根本位置。

二、工人階級在不同層次上的變化

1. 勞動權力的弱化

(1) 失業的威脅

保證有勞動的機會和有相對穩定的工作，是中國工人階級一百多年長期鬥爭的目標之一，但這一曾經實現的鬥爭成果隨著近十幾年破除「鐵飯碗」而被砸掉了。到底累計有多少「下崗」、失業工人，從未見到確切的數字，但從前面表1、2、3中的國有、城鎮集體企業職工人數銳減，可以知道其嚴重性。

失業有多種形式。一是「下崗」，2003年10月29日新華社發佈消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今天宣佈：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7個省市已沒有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已全部關閉。」這也就是說，今後工人將不再有「下崗」這種緩衝形式，而要直接進入失業了。原來「下崗」中「內退」（先在企業內部退休，拿退休金或生活費，直到達到退休年齡轉到社會上去領退休金）和「提前退休」的算「終得正果」，雖然被剝奪了最後幾年工作的權力，但終其一生，總算生活可以有保障了，今後就不會有這種「幸運兒」了。二是廠內「待崗」、「息崗」等眾多名堂，這些人只能拿比社會救濟線還要低的生活費甚至連這都沒有，而且還享受不到對失業工人的一些優惠政策，處境往往比「下崗」、失業更慘。三是解除合同直接回家。四是新增勞動力「畢業即失業」，有報導說2003年大學畢業生到當年8月底還有一半人不能落實工作單位，曾經是「天之驕子」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

失業的陰影還深刻地影響著在業工人，使他們在勞資雙方的博弈中大大喪失討價還價的能力，更加難以保持勞動者的尊嚴。

「工人現在什麼意見也不發表，怕下崗，不敢去爭。現在就是一句話，你想不想幹？不幹下崗！一句話你就老實了，有理回家講吧！現在就這厲害，老毛（編按：指毛澤東）那時

【表5】製造業、建築業職工平均年收入與全體城鎮就業者平均年收入的比較

年份	全體城鎮就業者(元)	製造業職工(元)與全體比較(%)	建築業職工(元)與全體比較(%)		
1985	1356	1112	82.0	1362	100.4
1990	2695	2073	76.9	2384	88.5
1995	7418	5169	69.7	5785	78.0
2000	11749	8750	74.5	8735	74.3
2001	12983	9774	75.3	9484	73.0

根據《200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表5-22、表10-4計算。

有這話嗎？」(Z廠，T)

(2) 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和絕對減少

社會經濟轉型的合法性在於，經濟發展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財富與收入增加、生活水準提高。但在現實中，工人階級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的部分變小了。表5僅以比較有代表性的製造業、建築業從業人員收入為例，與全體城鎮就業者收入相比，就可以看出「蛋糕」變小的比例。

「那個北京市公佈的數字，2001年我有。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是18092，企業的平均工資是17060，越來越少，然後國企是13521，而中央在京單位工資22850。」(R廠，W，原分廠廠長，現集團人力資源部部長)

「社會平均工資全市是1200元，都讓總工程師、足球運動員給平均上去了，老山戰爭死一個當兵的，才補給3000元，奧運會得了金牌1萬塊，三條生命不值一塊金牌。一個足球運動員，工資就是上百萬、幾百萬，得多少個工人去背那個平均數，這社會現在很複雜。」(C廠，T，工人)

分得「蛋糕」的絕對量有沒有下降呢？這主要表現在進城「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以及通過城市工人「下崗」逐步用進城「農民工」來替代城市工人，即便對於「農民工」個人來說可能收入比在農村有所增加，但對於整個工人階級而言，總體收入絕對減少了。

「我們和正式工混崗幹活，活是一樣的，正式工工資比我們高。」(C廠，小W，農民工)

「為何用農民工？就是為了省錢。如做衣服，有我們在，做一件兩塊，不能不一樣。沒我們了（指「下崗」了），他們對農民工可壓到每件一塊半。人家拼命幹，能掙六百多。」(下崗訪談對象29，女，47歲，下崗)

「廠裡曾經加班連著幹48小時，而且不給加班費。工人向廠長反映國家有規定工人加班每天最多不能超過三小時，可廠長說國家的規定下面有特殊情況也可以連續加班。現在工人下崗，廠裡又雇了100多農民工，都在生產線上。農民工每天可幹12小時沒休息，掙一千多。像我們這種廠一般只有7-9月比較忙，其他時間農民工也不走，但工資較低，就每月給三百塊。正式工除工資外廠裡要交各種保險，而農民工除了給工資外，其他一概不管。廠長說用一個正式工至少可以用2-3個農民工。另外他們願意用農民工也是因為農民工都在廠裡住，讓他們加班誰也不敢說甚麼，他們認為農民工比正式工好管理、簡單。」(下崗訪談對象52，女，46歲，下崗)

此外拖欠工資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重大問題，這一現象的本質是工人收入的絕對減少。

2002年9月3日《工人日報》：「2000年全國共拖欠工資366.9億元，2001年的情況更

為嚴重。」

「蛋糕」做大以後，工人們的所得不一定也會變大。資本所有者認為生產率的提高是引進新技術的後果，高層經理認為是「加強管理」顯現出來的成績，這些收益只應該以增加資本紅利及高管人員薪水、福利來分配。工人們如果想增加工資或減少勞動強度總是被視為是「懶惰」的表現。工人對生產流程和公司收益的貢獻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工人爭取從生產率提高中增加利益似乎是不正當的權力，只能是資本與管理者給予「恩賜」，而這種「恩賜」往往是在工人流露出不滿後，作為一種不情願的「影響公司發展潛力」的讓步來給予的。

(3) 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增加，勞動安全保護減弱，勞動保障缺失

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已經很多，我僅舉兩個近期報導的例子：

2003年9月25日《工人日報》：「在浙江樂清市，一些私企老闆大量使用無安全保護裝置的劣質衝床，僅去年（2002年）一年就將5000多名打工者的手指軋斷，當地醫院每天要做10餘例接指手術。然而這些受傷的進城務工人員大多數被老闆草草打發了事，根本沒有得到法律規定的足額賠償。」

2003年9月19日《工人日報》：「湖南省統計局近日對全省51個縣市區的2000名失業人員生存狀況進行了專題調查。……調查顯示，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時間總體偏長，其再就業收入僅達到最低收入水準。從再就業人員在調查登記的前一個月的收入來看，平均為478元……。失業人員在社會保障體系中處於弱勢地位，無論是失業保險，還是醫療、養老保險，失業人員的參保率普遍較低……。」

(4) 法律的失衡

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對於保護勞動者利益是相當有用的。但就是這樣一部「良法」，一些條例也能讓資本「用足」而反過來

損傷工人的利益。《勞動法》第20條規定「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以上，……如果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對於勞動者來說，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更穩定一些，即便雇主要解雇也還要依法給予補償，而有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到期解雇就沒有任何補償。但是，這一條有一個前提，需要「當事人雙方同意續延勞動合同」，而現在老闆為了靈活用工、壓低工資，大多只定一年、甚至半年合同，有的根本不簽勞動合同，因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對於工人只是「水中月、鏡中花」。常聽法學家呼籲建立一個「法律至上的法制社會」，我以為未免天真，法律只是反映現實社會中各階級力量的對比，也是基於這種對比制定出來的，一個弱勢群體不會因為有了某一部法律就改變弱勢的地位。

工人階級在這一層次上的變化還是最表面化的。

2. 組織權力的弱化和缺失

(1) 在企業層面上工會和職代會普遍失去參與決策的權力

我先引用同一個工廠行政領導、工會幹部、工人對工會的評價：

C廠，一個國營大廠，解放前就有共產黨領導的工會，解放後一直是全國工會工作的一個先進單位，直到今天工會組織健全並開展工會工作。

(Z，車間主任)「工會還必須存在，只要共產黨執政，工會就要加強。關心群眾是工會應該做的，文體活動是增強凝聚力，但一個中心點是經濟效益。我是生產領導核心，黨和工會是輔助，工人生活區、車間衛生、環境，行政指派工會主席去管。」

(X，車間工會主席)「從理論上講，工會要維護職工權益，事實上，工會工作圍繞生產轉。廠領導對我們說：別光種別人的田，忘了

自己的地。現在說什麼都是虛的，抓效益才是實的。」

(T, 車間工人)「這裡黨、政、工，有事找行政老大。對於管理，工會介入不了，工會是擺設。和外國不一樣，我敢罷工啊？」

其他調查中還聽到：

「職工在企業當中的作用，跟過去比，應該說是小了。就是說在人們印象當中，好像發揮主人翁作用不突出了。工人階級是主力軍，但是現在不是了。為什麼呢？隨著企業的發展，你職工要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但對一些重大決策的情況，你肯定不清楚。你的局限性就是你的位置決定了的，說你就是一工人，你要瞭解廠的大事，你沒有資訊來源，你不可能知道。即使你有異議，你也肯定說不出不同意的理由。包括現在說什麼股份制的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其實他的崗位是一工人，他的作用，也只能聽，他不可能發揮什麼作用。」(R廠，W, 分廠工會主席)

「工人作主人，你生產去，你能生產多少台，你說的出來嗎？你說不出來。一個工人成天在蹶著屁股幹活，他能看你企業什麼，你還老叫著把他當主人，……主人？主人都下崗去了。」(R廠，Z, 原總廠人力資源部部長)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靜教授對職代會基本功能的看法是：「整合職工對政體的支持，將不同的社會需求納入體制的掌握之中。」「它的基本目標在於，避免大規模衝突的醞釀和滋擾」，把基層充斥的大量衝突「局限在單位內」，因此職代會「不是社會階級利益的聚合組織」(註十)。

(2) 在國家層面執政黨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變化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政治利益是階級利益的集中表現，工人階級的政治利益由自己的政黨來代表，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現在與時俱進的創新理

論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包括吸收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入黨。什麼是優秀分子？如果接受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那麼是否放棄對剩餘價值的佔有？如果放棄，那就不是私營企業主了，如果不放棄，那麼是否要對一部分人修改黨的綱領？在實踐中，如果資本家可以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那麼能不能加入工會這個「工人階級群眾性組織」呢？如果能夠，那在全世界各國的工會中倒確實是開風氣之先了。在政策制定中，如果不能夠總是調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執政黨也會遇到一些難題，怎樣使「彼」滿意，又使「此」也滿意呢？

「誰都希望自己的單位好，希望自己的國家好。社會主義的宗旨就應該解放全人類，不能只為某些人謀幸福，要為廣大勞動人民謀幸福。這麼多忠實於共產黨，跟黨走的國企職工都下崗了，拿著這點最低生活費找不到出路，還能叫為人民謀幸福嗎。解放前，窮人為甚麼奮不顧身的跟著毛主席幹革命，還不就是因為沒飯吃。解放了，革命勝利了，好不容易捧上鐵飯碗現在又非要把他的飯碗搶走，他能不急嗎。地痞流氓富了，貪汙腐敗者發了，現在他們成了南霸天、北霸天，他們又在不斷的製造吳瓊花，吳瓊花要是太多了，以後的事我就知道了。（「南霸天」是文革時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的反面人物，「吳瓊花」是貧苦農民，後來成為紅色娘子軍的戰士。）我們這一代人，對黨有深厚的感情。我們聽黨的話，讓上山下鄉就上山下鄉，好不容易回北京了又趕上下崗。像我們這樣，聽黨話跟黨走，工作兢兢業業老老實實跟黨走的都成了下崗的窮光蛋，這就是政策不好，不為老百姓著想。現在

註十：張靜：「城市社會的利益組織化——職代會案例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四期。

是一把手說了算，這就是權力，下崗根本不通過職代會，根本沒有民主。企業虧損了，工人下崗了，連簽了無固定期限合同都不管用，合同應該是受法律保護的，怎麼下崗就沒人管了呢？領導為甚麼不下崗呢？企業倒閉了，他們換個地方照樣當官，照樣撈，為甚麼他們只有權力沒有責任呢？」（下崗訪談對象57，女，47歲，下崗）

「在整個社會、國家發展中，或者說咱們進行有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必然就有一部分人在改革當中，出現一些困難。這是正常的，特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咱們當時強調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強調富了，沒強調不富的問題。實際咱們在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就是弱勢群體的增長。」（R廠，W）

在這一層次上的變化更為本質。

3. 話語權的失落

根據我在調查中的資訊，我感覺國營企業工人個人素質還是很好的。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對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失落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例如對於「下崗」，他們可以深刻、準確地講出許多原因。問題是面對困境，他們基本上是採用個體化的解決方式，靠自己想辦法、找關係、再學習、起來抗爭……。其實就是在「下崗」問題上，也有許多政策規定了職代會的權力和作用，但是很少有人想用一下這些權力或從這些組織中取得幫助。一個原因是對這些組織深感失望。

「我找過工會，所以給我補助，就給過一次，沒有實際效果。沒有幫我找工作，就是要我轉變觀念，要有新思路，就是做思想工作。我說要是我坐在這我也會說，咱倆換換，你頭一個下，我第二個準下，他們和領導是一個模子。」（下崗訪談對象48，女，40歲，下崗）

「工會幹部一樣的撈。工會在毛主席的時代就起作用。現在它也替工人找工作，也不是完全不管，就看機會，順便時才管。」（下崗

訪談對象5，男，48歲，內退）。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階級在主流的話語霸權面前，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這些主流話語主要有：「必不可免論」、「個人能力論」等，對於相當一部分工人是有影響的。

「對下崗，肯定有部份人當犧牲品，我們就是。現在是過渡階段。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國家絕對上不去。改制就是要補上這課，不補上資本主義這課，國家沒法發展。」（下崗訪談對象40，男，39歲，下崗）

「職工下崗不公平，單位不給你雙向選擇的機會，憑關係上崗，我永遠不服氣，我覺得我幹活比上崗的還強。不公平沒轍，國企改革就是分流，社會就是這樣，家家企業都這樣，這是大趨勢，你覺得不公平也沒辦法。」（下崗訪談對象50，女，39歲，下崗）

「我覺得社會對下崗工人有歧視。但我沒能耐，就得給人打工去。有能耐，我還去當老闆呢。」（下崗訪談對象24，男，40歲，下崗）

「我雖然很害怕下崗，但仔細想想倒是也能理解。社會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現在很多高科技的東西都應用到生產第一線，很多崗位都從手工操作發展到機械化又發展到自動化，勢必要減少人員。像我這麼大年紀就是被社會所淘汰，不下崗或轉崗在辦公室呆著幹嘛呀。從社會發展的眼光看下崗，確實沒有甚麼不對。」（下崗訪談對象56，女，47歲，下崗）

這裡深深地充斥著無助與無奈！

失語其實就是沒有工人階級自己的意識形態，沒有對自己處境宏觀的科學解釋，因此也認識不到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力量和必要性。工人階級的根本出路仍是組織和集體行動。工人階級不是大工業的天然產物，而是工人在參加了集體行動之後的伴生物。……階級覺悟產生於社會行動，也在社會行動中發生變化。

因此我認為意識形態層次上的變化是最深刻的變化。

我仍用工人的語言來對工人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變化做出結論：

「我總感覺工人的政治地位低了。我入廠的時候是79年，那個時候的青年人大部分都想進工廠，現在他寧願進服務行業站櫃臺去，他都不想進工廠當工人，為什麼呢？我瞭解下面的情況，這一線的小夥子比較多，搞物件，一句工人就不好辦，人家有的說：這小夥子長的也不錯，各方面條件都挺好，他要不是一工人就行，但他要是工人就不行了。」(R廠，X，分廠工會委員、職代會代表，班長)

「改革開放後，工人地位是到底了。以前工人是主人，現在則沒說話權利了。」(下崗訪談對象5，男，48歲，內退)

「對未來，就只有指望孩子了，在自己身上是沒有未來的了。我希望孩子有出息，以後孩子要邊工作邊上大專，我一定供養他。其他也沒甚麼奢望。」(下崗訪談對象1，女，42歲，內退)

「孩子就得讓他上大學，要有文化，家裡經濟情況不能影響孩子，一定要上大專。絕不能讓孩子當工人，要吃虧的。」(下崗訪談對象28，女，44歲，內退)

「孩子小學六年級，我要求他必須學習好。『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下崗訪談對象40，男，39歲，下崗)

我曾想用「中國工人階級的邊緣化」作為這篇論文的題目，但我斟酌再三。什麼是「邊緣化」？它指的是「非主流化」。今日中國的「主流化」是以工業化和全球化為特徵的，「非主流化」主要是兩種情況，一是被甩在主流社會變化過程之外，二是在前面兩種特徵性變化中喪失發生影響的能力。但一般講到邊緣化時，總是指一部分個人、一部分群體，即便是講階級，也是講階級中的一部分，如「邊緣勞工」等等，可是我不認為現在被排斥的是一些個人，某些人因性別、

年齡、文化等被主流社會排斥僅僅是表像。我所要強調的是一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失落。因此「邊緣化」這個概念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概括範式。同時「邊緣化」總給人一個印象，社會結構的分化，只是在同心圓式的共同體中分成了核心和周邊，但目前中國社會出現的變化模型，更為形象和準確的說法是「斷裂」，北京大學孫立平教授已有一系列闡述，已經把這個問題講得相當深刻了(註十一)。

三、出路何在？

講到出路，確實還是不能不講「姓資姓社」的，比如講國營企業虧損，就有兩條出路：一是一賣了之，工人「下崗」甩掉包袱，資本可以越過原始積累階段，從此「輕裝」前進；另一條路，是在企業中建立資本和勞動的權力平衡，依靠工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三個積極性，真正尋找社會主義市場機制下公有制主體經濟的運行規律。這是不是21世紀的「烏托邦」？我想還是讓調查資料來啟發我們的思考。

「從這個R廠近一、二十年來看，最好的時期，大概是1988年前後那一段時間，那幾年就是廠長負責制嘛，從84年改的，一直到90年左右。當時就叫黨、政、工三架馬車。當時有這麼三個條例，一個廠長負責制，一個職工代表大會，還有一個黨委。從84年開始經濟體制改革了，開始放權，這時候放的權是給廠長的。但是咱們又沒有擺脫過去傳統的經濟模式，那廠長拿了這個權以後，用的不恰當，用兩個制度來管他，一個是黨委管，另一個是職工代表大會來管。咱們非常

註十一：孫立平著《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直率的說，那是職代會、工會發揮的最好的時候，真是為職工說話，辦事兒。當時還建立在價值取向上，認為我們沒有太大的差距，仍然是我們毛主席那時候提的適當拉開差距，所以如果你超出了這個範圍，大傢伙就可以對你提意見，罷免過中層幹部。我覺得那個時候，從上到下有這麼一種氛圍，從市總工會到機械局工會，以至於整個工會作用發揮的比較大。當然，我要客觀的說，我覺得和當時的環境有關係。現在為什麼不提了，現在社會上鼓勵這種差距，對不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人家就應該富，你還去指責人家，幹嗎哪？所以這種監督力量就下來了。現在這價值觀不一樣了，你既然規定了廠長可以年薪幾十萬嘛，規定了領導幹部可以去住幾套房子，那人家出人頭地了，你幹嘛還要去指責人家呢？」（R廠，S，分廠黨委書記）

在社會現實中，我們還調查了河南Z廠，它曾被私營企業兼併，因為私企沒有兌現兼併條件，這個廠的職工又要求退出兼併並佔領了工廠，旋即遭到強力機關鎮壓，但最終被允許自己選出工會委員會。三年來，職工就在工會領導下慘澹經營，養活了一部分工人，保全了機器設備。目前這個廠生產並沒有走上正軌，未來變數很多，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個試驗。現在不是提倡「多樣化」嗎？既然農村改革可以留下像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這樣的「異類」，那麼城市改革就不可以也多留下幾種備擇方案嗎？

現在不是我們「讓思想衝破牢籠」，開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時候了嗎？

2003.11. 初稿

2004.03. 修改◎

稿約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 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二· 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三· 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 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 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六· 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民工，一個時代 最沉痛的名詞

民工，一個時代最沉痛的名詞

在哪一夜間

魔幻般地變成了

共和國巨大的祭壇

絞肉機在方園九州的工地上絞絆

絞絆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混凝土

肉漿砌起與資本主義接軌的

立交橋

橋面上，讓全世界的老闆們

人欲瘋流

西方說，中國一夜間崛起了

但我知道那張國民經濟的底單：

成千上萬中國民工

正長眠在摩天大樓的基礎下

正如憲法上最公正的開頭：

「這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

社會主義國家……」

大陸文藝理論學者祝東力先生最近為本刊寄來數十首在廣東惠州惠東島做工的打工妹寫的詩歌創作，這些詩歌正如祝先生函中所言：「真正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反映的全是打工階級的最真實的思想感情。讀慣了知識階級的作品，再讀這種從生活底層提取出來的文字，感到很有沖擊力。……」從這些詩歌中，我們聽到了大陸底層人民激越而又沈痛的控訴，聞之不能不令人震顫動容，本刊將逐期連載這些筆鋒飽蘸血淚、真情畢露的工人階級之歌。【編者】

給一位死去的無名礦工

在夜的最深處

你，從鐮刀斧頭的星光中

跌入別人罪惡的淵夢

一個曾經站著的階級

重新淪為一場征服戰的奴隸

財富的皮靴踩出一條界線

上面是礦主們和他的狗

以金礦和貪婪為姓氏

下麵是煤黑子，

血手和骨鑽挖出的墓穴

它通向地獄

這裡，魔鬼不是兇手

你不是人子

所有的血失去了母親

無論活著或死去

貧弱即孤魂

喊不出冤的孤魂

即銀行中不斷疊高的金幣

「萬噸死亡率還不值一瓶洋灑」

赤裸裸的夜筵

獸類的教堂裡這樣狂歡

那是比18世紀開普頓的鑽礦

還叮叮噹噹的血腥四濺

但，黑暗本身卻是葬禮

不為死亡，甚至不為正義

只為一個人，或一個民族

遭遇瓦斯時的悲哀

發不出聲的窒息的悲哀



中客員工與各聲援團體共一千多人參與10/25的遊行。蔡明德 / 攝影

我們都很清楚，今天在這裡的這一群人，已經用他們的力量，創造著屬於他們自己，和我們社會全體共同的歷史。（10/25苦勞網）

2003/10/25 抗爭第十一天

【保障市民安全，捍衛勞工尊嚴大遊行】

今天一大早咱們就要來遊行。學生們一早就來幫忙剪紙、貼海報，工人們分別各自聊天，或是站在公佈欄前伸著頭張顧已經貼出來的新聞資料。一名工人正在念小學的女兒笑著叫著，好奇地看這一群大學生在剪著什麼。她的父親問她：「妳以後要不要跟他們一樣？」小女孩迅速地搖搖頭，好像下了一個什麼樣的重大決定。有工人在海報牆後睡著了，述說著沉穩的呼吸。

戰鼓車出現了，加上聲援團體與個人，一共有一千多人，浩浩蕩蕩地從臺中市總工會出發。

「工人鬥陣，車拼相挺！」，開始持續地響

起戰鬥的號角。

經過仁和路、臺中路、綠川西街、臺中客運車站，在熱鬧擁擠的台中市，這一隊伍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景觀。紅燈都意識偽裝成綠燈，來來往往的車輛都停了下來，行人偶而對口號的聲響，好奇地望了一望。

假日市議會沒有人辦公，於是值日官接受訴求。市政府與總公司都沒有人出面，工人們水瓶不斷地從手中飛出，高高地、弧狀的旋轉於空中，便撞破總公司的玻璃。一個、兩個、三個……滿天齊飛，以既有的方式與心情飛行。

回到總工會，夜幕低垂，台中客運工人和聲援團體道謝。

「加油！加油！」所有的人握緊拳頭，高聲喊著。

這兩天工會幹部決定要檢舉所有客運業長期為壓低成本，以低底薪、高獎金的方式，鼓勵員工超時勞動，以降低人事成本。

將這篇作品獻給全台灣
所有的勞動者，以及依舊在沈睡的學子們。

台中客運抗爭紀實

示威者 (下)

文 ■ 范軒昂
圖 ■ 莊程洋

再次協商

2003/10/28 抗爭第十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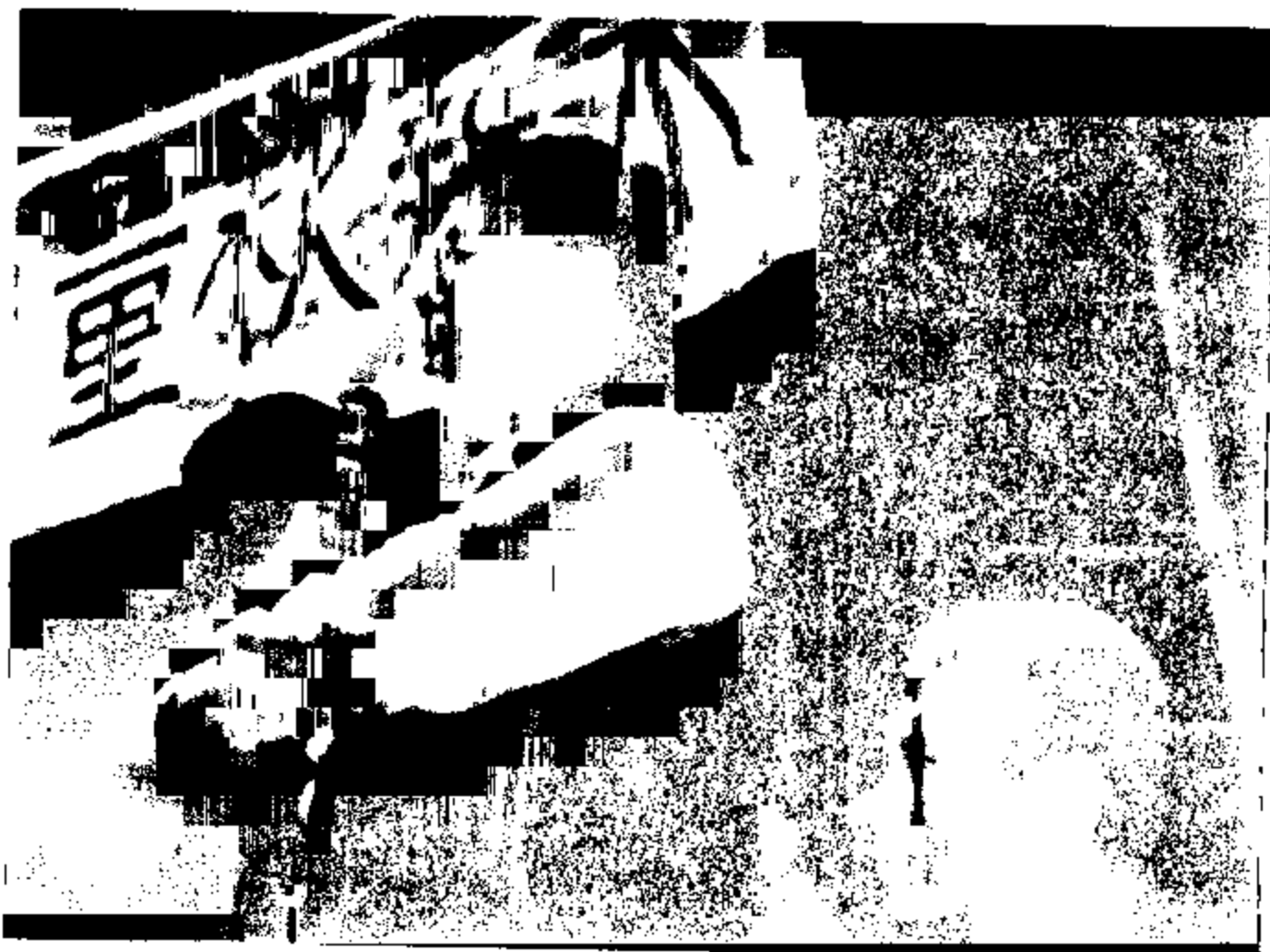
· 監理所、勞委會、總經理等代表都出席了。會議代表們輪流說話，工人們張著眼睛、豎著耳朵，會場瀰漫著一股戒備森嚴的氣氛，面對泥潭裡最堅實的妒忌，在驚恐之中，就能把人埋葬。

資方董事會內部溝通不良，副董事長王惠風說，外傳公司被掏空是誤會。

勞委會勞資關係處的副處長王征陵激動地解釋，今天下來絕對不是怕我們明天去台北抗爭。而是相關單位在行政權該做的一定會做，星期五一定會開會討論有關資方解雇是否合法的問題。

工人們感到相當懷疑，因為欺騙與不實總是踏上最終的軌跡。而我們依然飢餓與貧窮。

到底要不要於勞委會所召開的會議會前上台北施壓？要如何讓欠別人錢的張啟仲出來協商，便成為目前所關心的的課題。



曾茂興說：「只要政府敢不出面給我們解決，我們大家走著瞧！地球上還沒有我曾茂興不敢做的事情。」

曾茂興表達他的看法，他覺得再忍耐三天。「奈何橋一定要過，只是現在稍微走慢一點，看看情勢再走。」

「各位，我絕對不會像台鐵的，到時候屁股一拍走人。」他竭力地高喊：「要死我也要死在臺中。大家走著瞧！」全體轟然鼓掌。「假如這個事情解決不了，我們使臺中遍地烽火，我曾茂興說得出、絕對做得到，只要政府敢不出面給我們解決，我們大家走著瞧！地球上還沒有我曾茂興不敢做的事情！」他給了很多保證與承諾。

「表決啦！」有人高喊。

表決結果：過半數贊成，再忍耐三天，看看勞委會、監理所的表現再上台北。

有人氣極了。

下午五時，臺中客運資方九月份薪資以減薪百分之25發給，這是在市政府限期給付最後期限前資方的回應，也是資方迄今唯一一項對於勞工訴求所作出的回應。

現在，這群人重新發現自己。（法國1968）

2003/10/29 抗爭第十五天

新的戰鬥產生。工人們今天打算解雇臺中客運資方。

【解雇令】

受文者：張本融君（現任台中客運公司總經理）

速別：最速件

密等：普通

發文日期：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發文字號：中客工會怨字第0001號函

附件：

主旨：台端造成本會兩百多個家庭嚴重生計問題，及社會大眾之重大損失，顯不適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即日生效。請於文到十分鐘之內，跑步前來本會辦理停職手續。

說明：

- 一、台端於擔任本公司總經理一職任內，虧損適適，造成本公司與台中市民集體損失。
- 二、台端在未與員工協商之無預警狀況下，逕行減薪，惡行重大，嚴重違反勞基法第22條。
- 三、台端擔任台中客運總經理，理應儘速回應全體員工的訴求，然自92年十月十五日起即避不見面，以行蹤不明為由迴避與工會協商，造成社會付出龐大成本。
- 四、台端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止，已適續曠職達十四日，顯不適任。
- 五、為維護社會正義、捍衛市民行的權益、以及全體勞工尊嚴，台端應儘速交出經營權，以正社會視聽。

台灣勞動人民監察院
行政執行官：蔣珍德

正本：張本融君（台中運公司總經理）、台中客運公司全體股東、台中市全體市民。

副本：台灣島內各大媒體

兩百多名司機站在台中客運公司的大門口呼喊，「張本融下來！」、「王惠風下來！」公司的大門深鎖著，鐵捲門都還未拉起來。

警察又拿著盾牌出現了。

「我們在這邊等你，等到你出來為止！」

「請總經理跟我們解釋，是用哪一條法令將我們全部解雇的。」

工人們群起要討一個公道。

「麥叫啦！顧人怨喔！抗爭沒有辦法解決事情啦！」住在附近的居民氣憤地從樓上往下臭罵。

林鴻星拿起大聲公：「真的很抱歉，我們非常的無奈，非常的無奈。因為我們遭到無理的解雇，有兩百多個人，也不知是用哪一條法令將我們解雇？」

「幹！到前面去啦！」民眾繼續罵。

有人出面了，一名身著長條紋的花色襯衫的中年男子。

記者向前詢問：「請問你是勞方還是資方？」

「我勞資都有啦！」

旁邊的人補充說，他是副理啦！

「請問今天三位主管有來嗎？司機說要給他們解聘。」

「沒啦！沒啦！我都聯絡不到。」他拿起手機撥打。「我等下拿鑰匙把樓頂打開給他們看，三位都沒有在這啦！他們，唉！如果主管在這裡時候，就出來給他們解釋，現在都沒有主管。」

「現在公司是已經倒了喔？為什麼沒有人？」記者問。

「公司沒倒也都差不多啦！因為都沒有收入嘛！他們已經亂十五天啦！公司都虧了幾千萬。之前就跟工會說，大家出來走走（註九），感覺不滿意要罷駛，大家再出來講就好了。公司也能營收，百姓也能生活。」

「之前薪水已經有給他們啦！現在都沒有營運，沒有營運就沒有營收，這營收都是我管理的。」他放下電話，頓了頓，弩起嘴，一臉苦笑，看著眾多記者繼續說道：「就是沒有錢進來。」

副理出來要把門打開，警察拍拍他的肩膀耳語一會，然後說，你就讓他們在底下拍拍就

註九：指司機應該出來工作。



好了。副理說：「不行咧！他們就不要，他們就講要到樓頂。」

「我是負責管理營收啦！他們要到樓頂貼解雇令。」副理焦急地向警察解釋。

鐵捲門打開了。

幹部們走進空無一人的公司，於媒體與警察陪同與看守下，在二樓辦公室前解雇了台中客運業務課長李易霖，在三樓解雇了業務經理蔡登芳，在四樓解雇了總經理張本融。

一樓的工人們歡聲雷動。彼此的心，緊緊地靠在一起。

下午四點半回到總工會開會。疲倦，時間在消磨每一個人的體力，禁錮著僅存的思緒與言語。工人們恨不得朝著自己的腦門狠捶一通，到底該怎麼辦？是不是就等著坐以待斃，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沈重的鼓聲，壓低了厚重的眼皮。

大會宣布：星期五要上台北，每人繳交五百元，多退少補。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2003/10/31 抗爭第十七天

天還是黑的。司機們搬運物資，吆喝著上遊覽車，只是今天不是操著方向盤的運將。角色與身分將賦予著另一個意義，示威者，北上，施壓。司機們紛紛竊竊私語，要「他們」表態。

小男孩拉著父親的衣袖，像是在懇求什麼。

展現力量，絕不退讓，國策顧問，無血無淚，如此薪水怎樣生活。數大斗黑的字緊貼著白布條，以為在唱歌仔戲，哭調，誰飾演苦旦，在哪家廟口隆重上演。真實的人生便展開序幕。

記者向前詢問：「請問你是勞方？還是資方？」「我勞資都有啦！」副理回答。

國民黨中央黨部

團結、團結都是為了勞工。歌聲嘹亮、聲響碰遍整個台北市天空。人還未到聲音就先到了。數十名警察早已部署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手拿著警棍，神情嚴肅地盯著前方，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前，司機不得其門而入，怒目而視。兩方險而對峙起來，成排的鐵門霎然甩開，底部的鐵環相互撞擊地鏗鏘發響。

這回正恰好遇上國民黨盛大舉行的蔣公誕辰、追思蔣夫人週，兩張雍容華貴的遺照，彷彿在笑。

經協調之後，司機勉強可以踏入鐵門，文宣清楚地寫著：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應予以保障。

工人們前進，警察仍舊堅守著華麗的大門。推擠、怒吼、掙扎，有人大聲喊道：「勞資爭議，警察中立！」兩百多名司機跟著喊，如雷聲、如鑼聲，驟然壓著看門的狗無言以對。

代表出來接見了，雙手不斷地來回的搓揉，邀請十名代表入內接受陳情。

記者們追著林鴻星：你拿著陳情書，唉對對對，慢點，叫他們喊幾聲口號。

進入國民黨黨部裡頭的工人們說：「老闆張啟仲已經積欠我們好幾個月的薪水，又減四到六成的薪水。23號又發文給我們兩百多名員工，說要解僱我們。胡志強，胡市長是我們台中客運的當然董事，也擁有台中客運十分之一的股份，可是當台中客運發生事情的時候，他不但不聞不問，還立刻辭去董事。他說他不想背這個黑鍋。」

代表拿起筆來狀似認真地記了一記，便站起來說：「你們的心情我能夠瞭解，像張啟仲這部分我們可能幫不上忙，不過你們所提出的約束黨員的部分，我一定會向胡市長提出，儘



10/31國民黨中央黨部，司機們不得其門而入，怒目而視。

警方再次吹哨，第二次舉牌。

為了明天的勝利，誓死戰鬥到底……殺！殺！

警察開始往前一步又一步的逼近，豎直警棍與盾牌，沉澱澱地吞食、打擊人民的希望。「後退，後退。」黑亮的皮鞋與柏油路來回摩擦。滿臉不知由何來的仇恨，使他們變成了真正的奴隸。

「衝啊！」工人們使著將近瘖啞的喉嚨，什麼理性與冷靜，那些數十筆土地與房子的達官貴人，在那龐大的日式建築裡享用著歐式午餐。

靠借貸度日的工人，連生活中的麵包都有問題。每個人的內心都在淌血。

「造反啦！」經過的路人瞪著大眼睛說道。

一名工人握緊著旗子，帶著眾人進行衝撞。

聲援的學生與警察起了衝突。學生說：

「國家暴力！警察打人！」一名警察惡狠狠地說：「你說什麼？」

「國家暴力啦！」

「為什麼林義雄上次為反核請命的時候，不但沒攔，還請他進總統府坐。」

「別亂推人啦！」現場開始混亂了起來。工人、學生身體都是熱的。

「說什麼害怕一國兩制，台灣就是一國兩制，窮人和有錢人。你說，為什麼啊？說啊！」

「因為你不是林義雄！」分局長一時激動地說了出來。

「民進黨有沒有用？」沒有用！胡志強是什麼黨？「國民黨！」工人與學生們歡欣鼓舞地喊了起來，因為竟然發現自己可以不用再害怕警察。

我們要去勞委會囉！司機彼此向對方打氣。因為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說，沒有上級單位的解釋，無法對資方進行什麼樣的動作。勞委會先前來台中時說明，會在今天開會，並且作

快地看怎麼樣解決這樣的事情。因為畢竟他代表國民黨在台中執政，也就是關於國民黨的形象，就這一方面，是可以的。」

一名工人說：「我不吐不快啦！這些事情發生這麼多天了。這是影響兩百多個人的生計。你知道胡自強前陣子可以去看一棵老榕樹啦！都沒有來看我們哪！你說，這樣叫做市長啦！你說，這樣我們對他怎麼會有信心？」

「馬力強，我看，叫馬力輸還差不多咧！」

鴨霸頭家，欠錢還錢。場外不停傳出工人們的口號。**團結！尊嚴！**

台中客運在台中市高達四到五成的高載客量。胡志強想盡辦法向其他客運調車，國光、豐原等客運開始大搖大擺地出現在台中客運原先既有的路線上。於是更多的司機因此超時勞動。他對著媒體喊話，要保障市民的權利。

仗還沒有打完，下一站是總統府博愛特區。

那個叫做阿扁的仁兄，聽說最近到紐約領了個人權獎。可是眾多人民連基本的勞動人權都沒有，這倒要清楚的提醒他。

反財團治國，爭權利與平等。工人們喊口號、唱戰歌。

全國的勞動者啊，勇敢地站出來，為了我們的勝利，不怕任何犧牲……

嗶——長聲的警哨響起，刺耳地穿透每一個所能聽覺的界線。「請趕快離開，你們沒有申請遊行。」警察舉起牌子。

反剝削、爭平等，我的同志們。

一些解釋與回覆。工人們來到台北，要親耳聽到勞委會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並聽到一些回應，這是一絲希望。工人們不吝惜表達期待的感覺，一路上不停地歌唱、談論彼此的判斷與思想。兩百多個家庭的眼睛，都在閃閃發亮。

在勞委會前頭等了一個多小時，勞資關係處副處長吳征陵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彷彿有什麼好消息要帶給大家。他透過大聲公，一字一句不急不緩地說道：各位勞工朋友們大家辛苦了。嗯，聽說你們五點從臺中出來是吧？我在這裡願意跟大家報告一下，剛才所有的專家學者一致通過，他刻意地提高嗓門「雇主於工資給付期限而未給付，呈遲延狀態，勞工如行使抗辯權，拒絕勞務之提供，自非無正當理由之曠職。」

在場的人無不鼓掌叫好。

「我想這絕對是各位所滿意的答案。我想不管是我們勞委會、交通部，我們一定履行我們的信用，也開始推動了。」他開心地投以微笑回應。

「如果滿意的話，大家鼓鼓掌，就可以回台中了。」

「那資方是不是非法解雇？」忽然一個聲音冒出來。

「那被扣薪水呢？」又一個聲音響起。

「資方是不是違法？」聲音群起彼落的釋放開來，不安的氣氛，點燃了眉頭。

「各位，我們今天不是什麼問題都拿來討論，而是拿最重要的部分來討論。」

「那兩名被解雇的工會幹部，資方有沒有違法。」

「解雇的部分沒有討論，這一部份不是勞委會今天所討論的內容。我不能代表勞委會對這作認定，我說合法、違法都不算數。」

「你們開會開爽的喔！今天夜宿勞委會啦！」一名工人喊道。氣氛顯得緊張起來。

副處長轉身想走了。

林鴻興透過大聲公。「副處長，你慢點。我們有一個問題，如果資方認為我們28號以前的薪水已經給你了，你們如果再三天不來上班，再解雇一次，你認為是勞方錯呢？還是資方錯？」

「這不是今天討論的範圍。」他頓了頓。「你這問題，台中市勞工局沒有來問。」

「處長下來！」工人們大聲喝道。

處長黃秋桂下來了。林惠官（註十）現身了。

處長重複著副處長的話。並希望工人們派十個代表上樓，她可以仔細地說明。

「妳講這麼多法律的東西，大家聽不懂啦！各位作工的，懂那麼多勞工法令，繳稅給這個政府是幹什麼的。」林惠官猛批。

「到底資方有沒有這個權解雇，有沒有這個權，妳說清楚。我剛才也有參加那個會議，說得不是很清楚。」

「委員，我知道你很關心這個案子，唉，你剛才會議不在場啦！我還是建議派十名代表上樓去談。」黃秋桂說。

「各位，今天我們非常遺憾的，勞委會掌握國家的機器和資源，雇主有沒有違法，勞工有沒有違法，妳兩句話清楚就好，而不是講那一大堆。」

林惠官繼續說。「勞委會也不能把這件事推作個案，推給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如果今天台中市勞工局他可以處理的話，各位幹嘛千里迢迢跑到台北市勞工局，你們說是不是啊？大家吃飽沒事幹啊。」林惠官的表演博得滿堂彩。

「大家記住這一點，如果臺中客運給各位解雇就是違法。」這是林惠官的結論。

「沒有按照期限來給付工資，在這種情況之下，勞工能援引民法的規定，以類似行使抗命權的方式，主張不提供勞務，在討論上來

註十：親民黨立委／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講，認為說是有這樣的空間的。雇主以12條第六款，不正當理由曠職來解雇各位，他的作為在法律上是存在問題的。我們會要求台中市政府對今天的結果做出最好的處理。」這是處長黃秋桂的說法。

處長走了。工人們派十名代表上樓談這些是怎麼一回事。

警察在笑。

天已經黑了。兩百多名司機在勞委會門口坐地等待。罷工第十七天。空氣不知往何處散去，竟是稀薄的令人窒息。有許多的聲援團體前來加油打氣。憂傷、沉悶、哀怨，每一個人心裡不知該有著什麼樣的想像。

工人們想到，說要拼到底的曾茂興一整天都沒有出現。

出乎意料的，開始有人自願站起來說話。

「老實跟你講，一個男人以前領四五萬的家庭就很美滿啦！你回到家，搞到要死、用到要死，軟腳啦！現在回到家老婆不理你喔！還要睡客廳，睡到硬梆梆！（註十一）」

以前，我們找工作就好找，現在出去找工作被封殺。吃頭路，吃到這樣。你們警察大人嘛會挫。一萬八娶得到老婆我隨便你啦！一萬八而已耶！我房貸兩萬多，還到還要兩千，要向誰借。」他回頭對後面的鎮暴警察說。「將心比心，我不是在開玩笑哪！一個男人在臺中客運二、三十年，哪有年歲越大，賺越少，無影。我們不是不要衝啦！我們知道要衝啦！你們遞補仔（註十二）的，我們攏驚！」

「我們也遞補仔。」有工人開玩笑的回應。

「我們戴這頂帽子有效嗎？」

「我們這頂沒效，沒效啦！」開始不約而同有人紛紛喊起。

「我們頭頂這一萬八哪！」

工人們都呵呵地笑了出來。

「你們都領六、七萬。」他對著警察說。

「明明都是人，怎麼差這麼多！（註十三）」

好啦！麥攏說啦！攏要流目屎！」全體熱烈的鼓掌。

這時施純仲（註十四）拿起大聲公向在場的每一個人說：「來！剛才講歸講，現在用我們的愛心，我們來掌聲給後面的警察大人來感謝他們的辛苦！好嗎？」

「好！」掌聲四起。

這時，有人開始唱道：「團結啊！團結啊！力量大！團結啊！團結啊！鬥陣行！」

用咱們的雙手去爭權力！團結啊！團結啊！鬥陣行！

聲音漸漸越來越大聲。

只要咱團結嘛！鬥陣拼！

資本家看到嘛會驚！

團結啊！團結啊！力量大！

團結啊！團結啊！鬥陣行！

兩百多人的合音，衝破最深沈的黎明。

處長與代表們下來了。勞委會將立刻要求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調節處理。

媒體記者追著黃秋桂問，她繞了很多，說了很多，重複轉著先前相同的說法與結論打轉。記者們急了，說，處長您的意思是指解雇無效，也就是說司機們明天還是可以去上班是這樣嗎？處長點點頭。記者揚起頭笑著說：你可不可以對著鏡頭再說一次，他們明天還是可以正常上班，他們還是臺中客運的員工。我們要聽的就是這個。

黃秋桂說：臺中客運這次解雇勞工，我們

註十一：指的是地板。

註十二：遞補仔（帶帽子）指的是警察。

註十三：當時台中客運工會在抗爭期間每人頭上都帶頂工會所發製的帽子，這裡是工人表達不滿為什麼我們司機和警察一樣帶帽子，也都是薪水卻差這麼多。

註十四：台中客運工會幹部。

講，認為說是有這樣的空間的。雇主以12條第六款，不正當理由曠職來解雇各位，他的作為在法律上是存在問題的。我們會要求台中市政府對今天的結果做出最好的處理。」這是處長黃秋桂的說法。

處長走了。工人們派十名代表上樓談這些是怎麼一回事。

警察在笑。

天已經黑了。兩百多名司機在勞委會門口坐地等待。罷工第十七天。空氣不知往何處散去，竟是稀薄的令人窒息。有許多的聲援團體前來加油打氣。憂傷、沉悶、哀怨，每一個人心裡不知該有著什麼樣的想像。

工人們想到，說要拼到底的曾茂興一整天都沒有出現。

出乎意料的，開始有人自願站起來說話。

「老實跟你講，一個男人以前領四五萬的家庭就很美滿啦！你回到家，搞到要死、用到要死，軟腳啦！現在回到家老婆不理你喔！還要睡客廳，睡到硬梆梆！（註十一）

以前，我們找工作就好找，現在出去找工作被封殺。吃頭路，吃到這樣。你們警察大人嘛會挫。一萬八娶得到老婆我隨便你啦！一萬八而已耶！我房貸兩萬多，還到還要兩千，要向誰借。」他回頭對後面的鎮暴警察說。「將心比心，我不是在開玩笑哪！一個男人在臺中客運二、三十年，哪有年歲越大，賺越少，無影。我們不是不要衝啦！我們知道要衝啦！你們遞補仔（註十二）的，我們攏驚！」

「我們也遞補仔。」有工人開玩笑的回應。

「我們戴這頂帽子有效嗎？」

「我們這頂沒效，沒效啦！」開始不約而同有人紛紛喊起。

「我們頭頂這一萬八哪！」

工人們都呵呵地笑了出來。

「你們都領六、七萬。」他對著警察說。

「明明都是人，怎麼差這麼多！（註十三）

好啦！麥攏說啦！攏要流目屎！」全體熱烈的鼓掌。

這時施純仲（註十四）拿起大聲公向在場的每一個人說：「來！剛才講歸講，現在用我們的愛心，我們來掌聲給後面的警察大人來感謝他們的辛苦！好嗎？」

「好！」掌聲四起。

這時，有人開始唱道：「團結啊！團結啊！力量大！團結啊！團結啊！鬥陣行！」

用咱們的雙手去爭權力！團結啊！團結啊！鬥陣行！

聲音漸漸越來越大聲。

只要咱團結嘛！鬥陣拼！

資本家看到嘛會驚！

團結啊！團結啊！力量大！

團結啊！團結啊！鬥陣行！

兩百多人的合音，衝破最深沈的黎明。

處長與代表們下來了。勞委會將立刻要求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調節處理。

媒體記者追著黃秋桂問，她繞了很多，說了很多，重複轉著先前相同的說法與結論打轉。記者們急了，說，處長您的意思是指解雇無效，也就是說司機們明天還是可以去上班是這樣嗎？處長點點頭。記者揚起頭笑著說：你可不可以對著鏡頭再說一次，他們明天還是可以正常上班，他們還是臺中客運的員工。我們要聽的就是這個。

黃秋桂說：臺中客運這次解雇勞工，我們

註十一：指的是地板。

註十二：遞補仔（帶帽子）指的是警察。

註十三：當時台中客運工會在抗爭期間每人頭上都帶著一頂工會所發製的帽子，這裡是工人表達不滿說：為什麼我們司機和警察一樣帶帽子，也都是人，可是薪水卻差這麼多。

註十四：台中客運工會幹部。

一些解釋與回覆。工人們來到台北，要親耳聽到勞委會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並聽到一些回應，這是一絲希望。工人們不吝惜表達期待的感覺，一路上不停地歌唱、談論彼此的判斷與思想。兩百多個家庭的眼睛，都在閃閃發亮。

在勞委會前頭等了一個多小時，勞資關係處副處長吳征陵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彷彿有什麼好消息要帶給大家。他透過大聲公，一字一句不急不緩地說道：各位勞工朋友們大家辛苦了。嗯，聽說你們五點從臺中出來是吧？我在這裡願意跟大家報告一下，剛才所有的專家學者一致通過，他刻意地提高嗓門「雇主於工資給付期限而未給付，呈遲延狀態，勞工如行使抗辯權，拒絕勞務之提供，自非無正當理由之曠職。」

在場的人無不鼓掌叫好。

「我想這絕對是各位所滿意的答案。我想不管是我們勞委會、交通部，我們一定履行我們的信用，也開始推動了。」他開心地投以微笑回應。

「如果滿意的話，大家鼓鼓掌，就可以回台中了。」

「那資方是不是非法解雇？」忽然一個聲音冒出來。

「那被扣薪水呢？」又一個聲音響起。

「資方是不是違法？」聲音群起彼落的釋放開來，不安的氣氛，點燃了眉頭。

「各位，我們今天不是什麼問題都拿來討論，而是拿最重要的部分來討論。」

「那兩名被解雇的工會幹部，資方有沒有違法。」

「解雇的部分沒有討論，這一部份不是勞委會今天所討論的內容。我不能代表勞委會對這作認定，我說合法、違法都不算數。」

「你們開會開爽的喔！今天夜宿勞委會啦！」一名工人喊道。氣氛顯得緊張起來。

副處長轉身想走了。

林鴻興透過大聲公。「副處長，你慢點。我們有一個問題，如果資方認為我們28號以前的薪水已經給你了，你們如果再三天不來上班，再解雇一次，你認為是勞方錯呢？還是資方錯？」

「這不是今天討論的範圍。」他頓了頓。「你這問題，台中市勞工局沒有來問。」

「處長下來！」工人們大聲喝道。

處長黃秋桂下來了。林惠官（註十）現身了。

處長重複著副處長的話。並希望工人們派十個代表上樓，她可以仔細地說明。

「妳講這麼多法律的東西，大家聽不懂啦！各位作工的，懂那麼多勞工法令，繳稅給這個政府是幹什麼的。」林惠官猛批。

「到底資方有沒有這個權解雇，有沒有這個權，妳說清楚。我剛才也有參加那個會議，說得不是很清楚。」

「委員，我知道你很關心這個案子，唉，你剛才會議不在場啦！我還是建議派十名代表上樓去談。」黃秋桂說。

「各位，今天我們非常遺憾的，勞委會掌握國家的機器和資源，雇主有沒有違法，勞工有沒有違法，妳兩句話清楚就好，而不是講那一大堆。」

林惠官繼續說。「勞委會也不能把這件事推作個案，推給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如果今天台中市勞工局他可以處理的話，各位幹嘛千里迢迢跑到台北市勞工局，你們說是不是啊？大家吃飽沒事幹啊。」林惠官的表演博得滿堂彩。

「大家記住這一點，如果臺中客運給各位解雇就是違法。」這是林惠官的結論。

「沒有按照期限來給付工資，在這種情況之下，勞工能援引民法的規定，以類似行使抗命權的方式，主張不提供勞務，在討論上來

註十：親民黨立委／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中客司機與東海學生於台中市議會前各自喊著訴求與口號，頓時紛鬧不已。

激動地喊著口號：「保障台中市民，捍衛勞工尊嚴。」長期低薪超時的工作，老舊的公車，他們已經開得很累。

學生們站在議會的右邊，激動地喊著口號：「反圖利財團，拒絕消滅東海。」學生們發現，大學的機能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城市更美好的人文、教育環境，不應該輕易地被經濟犧牲。

大夥兒各自喊著訴求與口號，頓時市議會前紛鬧不已。路旁的行人驚奇地回過頭來。

「東海加油！」一名宏亮的聲音從工人群中傳出。其他的人也跟著喊起來。

「工會加油！」學生們歡欣鼓舞地喊道。

「司機伯伯加油！」

「同學們加油！」

工人和學生們的視線交融在一起，中客事件和開路相連起來似乎讓所有人真正都了解到自己為何反抗。

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孤獨地看著市議會前團結的人們。

議會

2003/11/5 抗爭第二十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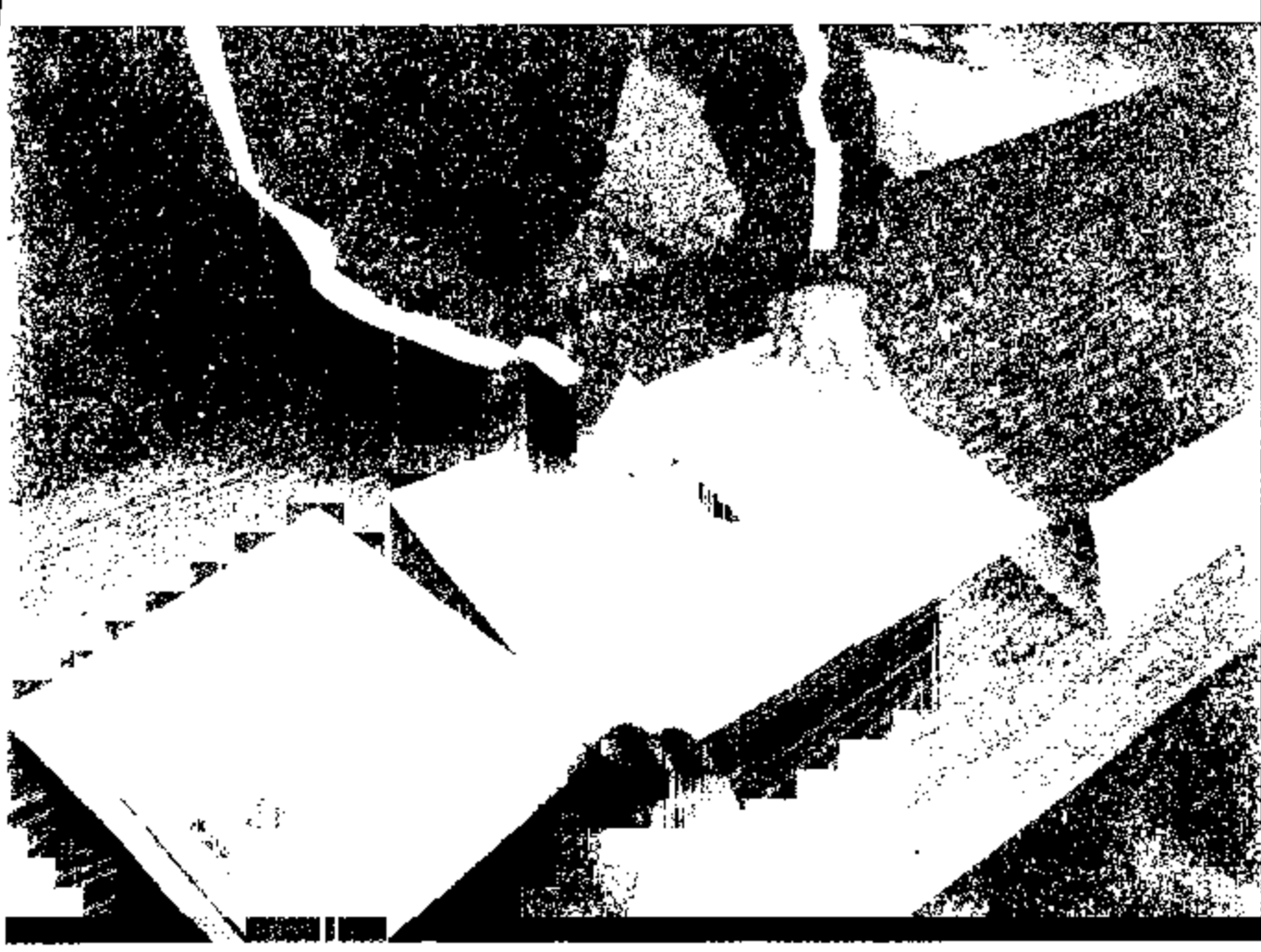
早上議會再度開議，議員輪番對市府砲轟，副董事長終於出面邀工會進行協商，初步同意開始排班讓員工回去工作，但工會堅持必須恢復今年五月份以前的薪水，同時要讓所有契約工調整成正職員工。王惠風無法陳諾，協

商於是破局。工會於是再度回到市議會，此時議場內正召開關於中客案的專案討論。市政府與資方取得聯繫，王惠風再度回來至議會，由副議長、勞工局局長賴淑惠、以及四位議員的陪同下與工會代表召開協調會。

賴淑惠說：「我們今天副董也來到這邊，剛才在議會裡面，絕大多數的議員也都希望公司能繼續營運，是希望保障勞工的工作。所以公司這邊儘量替勞工這邊考慮，那勞工這邊，如果還有談的空間，我們雙方都不要太堅持。如果太堅持，可能會有些難處理啦！那我們請副董說一下。」

王惠風站起來，頓了一頓說：「首先要感謝各位長官這些日子以來對臺中客運的關心，促成這次協商，非常的努力。不過，我是抱持著很大的希望，我希望工會能來體諒一下，共體時艱，因為這幾年來，非常的困難。現在董事長已經將公司的股份授權給我，往後都要由本人來承擔。最後我的意思是說，因為訴求差距很大，所以是希望大家先去上班，是不是星期一的時候再由勞工局，大家再來說一下。感謝各位。」

「其實我們的訴求很簡單，一直很簡單。第一點，恢復我們的工作權，因為我們在23號的時候被公司大量解雇。第二點，我們只是要恢復我們五月之前的薪水，不是要求加薪耶！並不是外界所說的，我們的要求很高，我們絕對沒有這樣子。第三，就是我們公司有定期非法聘請契約工，我們只是要求變成正職工。還有一點就是說，我們即將退休的員工，公司不應該強制排休假，來降低他們退休金的比例，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最後，我們當然也能體諒公司會有些虧損，但是公司明明知道行政團隊的經營的方向錯誤，股東還是繼續聘用他們，



認為在司法性上有問題。所有勞工應該可以回去繼續工作。

夜深了。工人們打包要回臺中，接續著明天的戰鬥。

有的人急急忙忙不停的翻報紙，有的人顯得滿臉焦荒。

2003/11/1 抗爭第十八天

工人們打算要每天前往鐵門深鎖的公司簽到和簽退，以免因為曠職而被二次解雇。台中市政府說11/5前若中客資方若再無回應，將考慮開放中客所有路權。

開會、等待、抽煙，可以想像所有的一切都在進行式中，而寫不出未來式。

2003/11/2 抗爭第十九天

工會唱了十九天的獨腳戲、胡志強說看不到資方。

中客資方今天於台北台中各以半版廣告，向全國人民道歉，聲稱無片面減薪。

2003/11/3 抗爭第二十天

多日的等待，會場中呈現一片死寂。台上工會幹部報告完，有人舉手便站發言：「這樣下去也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如果可以，要不要大家拿資遣費回去好了！」有人插嘴道：「你不要發言了！」「你想被打啊！」還有紙條往這個人飛去。

現場一片噓聲四起。

臺中市政府於今天的主管會報中作出了三

工人們打算每天前往鐵門深鎖的公司簽到和簽退，以免因曠職而被二次解雇。

點決議：

1. 於11/4中午12點前恢復僱用關係。
2. 市府以適當積極機制介入，輔導中客恢復營運。
3. 不排除建議勞委會成立處理重大勞資爭議協調會報。

交通局下達最後通牒：11/4下午五時若台中客運未申請暫停營業，市府將收回所有路權。

資方還是沒有人出面說話。

工人與學生

2003/11/4 抗爭第二十天

台中市議會開議，工人們前往議會夾道歡迎議員開會，希望他們在國家殿堂裡幫忙多說一些好話。

議員們分別向工人們示意辛苦了，便進入議會裡唇槍舌戰。

這時東海大學的學生們也來到市議會，他們近日為了市政府第二次道路通盤檢討東海大學連外道路案，採取了一連串抗議行動。（註十五）並質疑政府有意圖利財團，學生們說要保衛所有台中市民共同的校園。

人越來越多了。工人們站在議會的左邊，

註十五：10月9日，媒體批露出東海大學聯外道路案，引發東海多數學生關切。對於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的理事長「歐正明」提出「橫越東海路思義教堂的隧道方案」，引爆激烈爭論。開路的理由其一為紓解交通阻塞，工業區上下班時間道路阻塞嚴重，如能打通東海大學，將有助於交通順暢。其二，連接中科與新市政區，分散台中港路車流：市政路延伸路段將把新市政中心區（古根漢博物館）、台中工業區，通過中科聯外道路東大路和中部科學園區連結起來，同時分散中港路車流，提升城市競爭力。

把這些過錯架構在我們勞工身上，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所以第五點我們希望更換行政團隊。謝謝！」林鴻興代表發言。

賴淑惠起身回應：「這幾個訴求一開始就有提啦！那剛才副董也有提到，因為我們要解決的是明天是否能正常發車，以免交通局要對公司進行一些處分的工作。如果那些處分的工作做好了，我們再來談任何關於薪水、更換行政團隊，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她接著說，「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會希望公司很清楚的回應我們員工，既然這個解雇你可以接受行政機關的認定，那大家回來上班，先把這個部分確定好以後，就如同副董所說的，其他部分由星期一協調會議來處理。」

「事情為什麼還要到星期一來解決，我們都已經等22天了，對不對？這樣我們怎麼接受？」一名工會代表忿忿不滿地說著。

勞工局長轉身向王惠風問道：「是不是可以給他們較明確的……」

此時場中陷入一陣膠著，副議長起身向勞工說話，「這幾天我們議會也非常關心各位的事情，但我想，有魚就要有水，有水就要有魚，兩個是平等的。你們也要讓資方有生存的空間，我們大家才有生存的空間。我想在這種情況下，不要堅持，堅持就不好談，我想要讓雙方距離拉近，在這種大環境經濟蕭條的情況下，我們都退一步想好不好？我相信之後狀況比較好的時候，資方還是會慢慢恢復過來。」

他舉起手強調，「第二點，我想你們應該有考慮的空間，是否就回到八月所談判的結果，讓資方可以接受，這樣就兩全其美啦！如果你一直要恢復到五月份SARS以前，那資方就一直在虧損，我們議會補助仁友、台中客運，是看到他們經營確實有困難，所以我們議會同意每年給他們補助，喔！如果他們有賺錢，就不會來找我們補助了。所以我跟大家講，儘量退而求其次，兩全其美最好，那這樣

你們也有工作權，也許短暫的一段時間，你們收入比較少一點。」

副議長轉過頭跟王惠風說：「我記得幾個月前，我還陪你找過交通局長嘛！希望分段、車價調整，比照台北，不要一票坐到底，你們就虧損連連。對此我們也同意。」他感到非常榮耀地繼續說：「另外，就是兩段式，坐的遠就多付一點錢，我覺得這樣合理啊！我們常講，使用者付費啊！很合理。所以我是希望，我也知道勞工這邊受委屈，但我們今天就把它攤開，達到共識。」

「當時沒有錯，八月雙方確實有簽訂，但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寫在裡面，我一一的向大家報告，第一個，公司本來六月、七月無預警地用SARS來給我們扣薪資。扣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且公司當時的算法是，領基本工資1萬六不扣，以上的人才扣，但是那一次我們沒有跟他說清楚，他連基本工資、加班費都扣上去了，一下子有人被扣了三萬元，一個月啊！我們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子來接受。我是講出實在的。」林鴻興起身辯駁。

「我們是希望把大家距離拉近，希望勞工能忍一段時間。重點是資方能夠生存，那麼你們勞方也能夠生存。」副議長再次對林鴻興強調。「你如果現在就是要恢復至五月份，我想資方可能就無法答應了。」

副議長接起了手機說話。

賴淑惠說：「我在想現在公司一定要按照勞基法加班費、基本工資該給多少？這才是合理的。至於薪資減薪的幅度的部分，我們星期一看是依據我們14號所談的那個方向去走，好嗎？」

「就忍耐幾個月嘛！」副議長掛下手機後補充說道。

「我們請副董事長來表態一下，好不好？」林鴻興說。

「我同意副議長所提議的，星期一按照8月11號的協商做討論，加班費、基本工資照樣

算，我同意。」王惠風簡短地表示。

這時，有一次在總公司看到的副理站起來說話：「我也知道勞工真的很辛苦啦！他們說的也沒有錯，薪水真的扣太多啦！不過，現在副董也要來做、經營這個公司，我們大家就來給他幫忙一下。看這個公司是不是可以做的起來。大家幫副董來拼。我們一定挺你。之前有談10月、11月、12月15%，現在就10%。意思意思，我們吃頭路的人就一個底線就好了，不要給我們扣薪水就好了。我跟大家報告，大家討論一下。」

副議長又再次站起來說：「現在距離已經拉近了，就10%，算一算沒幾千塊錢嘛！應當要同意。」

黃河宗不滿地站起來說，他還是擔心日營收的計算方式，有些補貼路線，都沒有加進去。

「星期一的時分，細項大家看那些沒加進去我們大家來討論，但現在不是8月11那時候按營收比例減薪，就是只10、11、12三個月扣10%。」

林鴻興說，我們擔心秋後算帳。

「那麼成立人事評議會，並將有工會代表出席。」

台中客運工會趁勝追擊。

我們擔心資方承諾的說話不算話。

賴淑惠在媒體、議員的面前將決議一字一字念了出來。

協議的內容為：

公司方面同意

一、 11/6號起，台中客運全體員工回公司上班。10/15號起工會員工未上班行為，既往不咎。解雇通知同意撤銷。

二、 九十二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薪資減薪百分之十，九十三年一月以後之薪資恢復至九十二年五月未減薪之金額。另加班費及基本薪資額度內之薪資不得列入減薪幅度。

三、 資方違法勞基法雇用定期契約工的

部份，依照法律辦理（即以不定期契約簽訂，成為正式員工。）

四、 公司方面將來人事評議會將列增工會代表出席。

議會在每個人的面前，漸漸溶化了起來，都看不清楚彼此的臉。

「你以為你們能撐多久啊！」

歷經二十二天抗爭的台中客運，11月6號清晨四時，抗爭暫時告一段落了。

「我連結婚都是趕快結完就回來工作。別人都說：怎麼連結婚那天都要工作。我真得沒有騙你，如果我騙你，我出去被砍死！」

司機們表示今後要用和順的方式與旅客對話，給台中市民一個全新的印象。

「在中客15年，會當司機是因為喜歡開車，我爸是做生意的，小時候跟著他跑遍台灣南北走透透，每次坐車感覺就趣味，那時候和鄰居的小朋友玩，我都演司機，讓他們來當我的乘客……」

台中報導。

兩百多個人舉起手，熱烈地、激動地鼓掌，全身的毛髮因此肅然起敬。眼淚沾濕了每個人的眼眶。

後記：

近十年來客運業大大小小的抗爭，從1988年二月桃園客運罷駛事件作為開端、五月高雄客運、六月新營客運、八月苗客、1989豐原客運、1992基隆客運、1998統聯。2003年的台中客運抗爭，在堪稱工運沙漠的中部，竟然出乎意料有了如此豐碩的成果。

台中市交通局在中客抗爭結束後表示，已向中央政府爭取IC智慧卡票證及多媒體資訊系統建置，並爭取補助業者車輛汰舊換新等經費。

勞委會將展開客運業全面勞動檢查。

為什麼有辦法這麼堅持走完二十二天？很多人好奇地問著。



「衝啊！為我們的工作找回應有的自由與尊嚴。」蔡明德 / 攝影

常務理事黃河宗說：「因為我們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回顧這些日子，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總是在徬徨的日子裡奮鬥，或是在某種希望的日子裡得到永生。

天空，仍是烏雲遍佈，擁擠地、低沈地降落在生命的屋簷。猛然有一絲曙光，便成為繼續堅定的信念。而不斷不斷地勇敢進行鬥爭。而不斷不斷地腳踏實地的實踐。

壓迫仍在持續進行中，我們找回應有的自由與尊嚴。

中央社 2003年11月12日

縣府檢查客運業者 發現逾時工作嚴重

長途客運事故頻傳，台北縣政府針對縣內六家長途客運業者的司機勞動檢查，結果發現有

許多司機一日工作達到14個小時以上，皆逾時駕駛，除了對業者開出第一張的一萬八千元罰單外，還呼籲業者不要忽視長途客運司機逾時工作的問題，否則影響旅客安全將會得不償失。

台北 2004年2月17日 星期二

國道三號南下九十八點五公里處，即新竹縣寶山交流道附近，十六日下午一點半發生連環車禍，大客車、大貨車和自小客撞在一起，造成一死九傷。這起車禍是一部台中客運大客車追撞停在路肩一部滿載麵粉的「伸通」通運公司大貨車尾部，大客車司機林智賢夾死在駕駛座上，大客車上九名乘客，有六人輕傷，另有兩部小轎車被撞及尾部，三名乘客僅受輕傷，分送竹北東元與新竹市馬偕醫院急救後無大礙。◎

1989年的「六四」是椿舉世震驚、評價不一的歷史公案。三月初，北京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退休軍醫蔣彥永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為「六四」平反，近來前總理李鵬準備出版三十萬言的「六四」日記《關鍵時刻》，為自己辨誣，卻因書中披露了當時中共上層的分歧而為中南海所阻，於是沈寂一段時日的「六四」，重又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對這椿影響深遠、過程複雜的歷史事件，十多年來港、台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與評論甚夥，但多流於片面、浮淺，充斥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亦鮮見深層次的分析，本刊特轉載習東先生論述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成因、意義與影響的長文，為讀者提供另一視角。大陸作家周良沛先生在「六四」周年

有關一九八九 年事件 的一些 思考(上)

■習東

引言

德國十九世紀哲學家尼采說過：「記憶能把一個民族殺死。」然而，在九十年代即將走完最後兩年的此刻，一個更貼切的說法可能是：「被精英所攥寫的記憶，能殺死一個民族的精神活力。」毫無疑問，中國自從一九八九年以來至今，無論是在經濟社會領域，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變化，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一九八九年事件是如何影響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九十年代的發展進程，自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又取決於如何分析解說一九八九年事件。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對這些問題，在海內外都沒有能夠展開深入和有見地的探討。在海外，有關所謂「六四」的評論、研究不可謂不多，然而，絕大多數這些評論、研究，其意識形態取向，都仿佛是被定格在「柏林牆倒塌」、「歷史的終結」那一時刻，其認識框架、語言辭彙也被凝固在一種簡單粗陋的思維定式乃至膚淺庸俗的反共說教之中。這些評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將西方大資本控制的主流傳媒中所佈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資本主義的凱旋」的福音在局部微觀層次加以解說而已。這個福音最基本的資訊就是：全世界都在朝著一個目標運動，這就是以美國為榜樣的「自由市場」和「多黨民主」這一對美妙無比的制度搭配，特別是「共產極權」制度下的人民，從中國、蘇聯、東歐到尼加拉瓜，都

之際曾撰有一記述見聞與心境的未刊稿，作者自述說：「此文是十幾年前留給台灣故交所讀過的一篇舊文，屬於『出土文物』。它既非簡單、粗暴地將那場『風波』描述為『暴亂』，也沒跟著西方輿論嚷嚷『鎮壓民運』，或抖出什麼犯忌的『內幕』驚俗，亦無個人利害於其中，只是動情、客觀地以自己那幾日『事件』已波及全國時，在北京之外的幾個城市於光天化日之下同眾人同樣的親聞目睹而又個人化的體察和感悟，思及國家、民族的命運及國民性格所湧流的心潮，對紀念這一『事件』，它該是份受到尊重的，有意義的一家之言。」周良沛先生的記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六四」當時的情景，對瞭解「六四」有其參考價值，爰予全文刊出。【編者】

在苦苦地追求著這個人間天堂。當然，在對這個福音的頂禮膜拜的絕對一致之下，有關「六四」的解說也存在著一些爭論，比如：有關「錯誤在於沒有見好就收」，「學生領袖對流血負多大責任？」等等問題。這些爭論，並不對有關「民主化浪潮」福音提出任何疑問，相反，全部輿論的注意力集中於這些爭論這件事本身，更使得該福音成為不容質疑的絕對真理。真正有意義的爭論，真正能夠挑戰和質疑西方主流傳媒所主導的輿論的嘗試，被擠出了爭論場地。

在中國國內，這個問題牽涉到一些重大的政治決策，事關社會安定，展開討論非常困難。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有必要不受外國和海外勢力的干涉和壓力。然而，遺憾的是，中國國內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分析結論和輿論導向，沒有能夠充分抵制和反擊國外敵對勢力的宣傳、干涉和以此施加壓力的企圖。而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恐怕在於至今未能夠取得一個深入細緻和全局性的分析和總結，從而得出深刻的經驗教訓，相反，現有的分析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鏡像地映照了西方統治層和主流輿論的對此事件的論斷：社會騷動情緒的最主要激勵根源，被追溯到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的影響，即「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這也是西

方主流輿論中「民主化浪潮」、「自由的福音」的同義語。這從表面上看也許有幾分奇怪：觀點對立中的雙方，竟在一些最基本的範疇上保持一致：即將群眾、民主、自由這些富有活力的概念與西方制度和思想聯繫在一起，而與此相對立的那些保守和死氣沈沈的概念，如秩序、穩定、鎮壓，則與中國政府聯繫在一起。正因為在分析和結論上的被動、保守特點，在思想深層對西方統治層的說教的默許和實際上的屈服，才導致了西方敵對勢力能夠抓住這個問題窮追猛打，並不斷強化和擴散其神話，而中國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則始終處於道義和輿論上的劣勢。

無論哪一種官方說法，儘管表面上針鋒相對，卻具有幾乎完全相同的思考方式，那就是根本無視群眾，完全缺乏對群眾的分析。這種思考方式，首先就反映在對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各種稱呼上。「六四」很快就成為這次事件的代稱，並被普遍接受，它集中地反映出「只見精英、不見群眾」的偏見：它完全忽視在此前一個多月間、在全國各地都發生了的各種民眾請願、抗議，忽視這些請願、抗議中各種傾向、各種性質的混雜，而單單注目於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戲劇性場景，因為這一幕場景最不含糊地象徵著一個簡單易懂的解

說：以西方自由福音武裝起來的一些年輕的殉教徒，面對共產極權的鐵腕。（註一）這也是西方統治層要讓世人記住的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唯一一種解說。這一解說，在西方主流媒體的用語中更露骨地表現出來：從一開始，學生的抗議活動就被稱為「親民主運動」（pro-democracy movement），這的確是一個奇妙的辭彙，它強烈地暗示：這次運動是「親善」某一政治制度和思想的運動，這被「親善」的物件，當然是「民主」的西方。這是本文拒絕使用「六四」或「民主運動」之類辭彙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針對各種官方解說的缺陷，試圖提出一個超越西方「民主化浪潮」神話、關注群眾的角色和作用的解說，以此來作為一種真正地站在民主、人權、批判帝國主義的人民立場上來分析探討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嘗試。這個嘗試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文化帝國主義與後現代境況；以及一九八九年事件對中國九十年代發展進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

中國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大量引進西方的思想觀念，並將其作為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這期間，幾位美國學者著作，包括托夫勒的《未來的震蕩》、《第三次浪潮》、納斯比特的《大趨勢》、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等，被翻譯出版，並廣為傳播。容易看出，在「未來學」的花哨招牌下，這些著作的內容，實際上是已經相當陳舊的「現代化理論」，它們強調新技術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巨大轉變作用，並認為新技術和新產業革命將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於「意識形態終結」的「後工業社會」。儘管這和後來中國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還有很大距離，但無疑這是為九十

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成熟作準備的啟蒙運動。（註二）這次啟蒙運動的文化結晶就是電視片《河殤》，它把「現代化」意識形態推向了荒謬的極端。也就在《河殤》出現的同時，「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萌芽也開始出現，這就是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理論，和經濟領域中以價格闖關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出臺。

「新權威主義」既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邏輯結果（這在托夫勒、貝爾的舊版「現代化」理論中還較為模糊，在杭庭頓的新版「現代化」理論中就明確無誤了），也是為改革出謀劃策的一小部分知識份子精英的敏銳自覺。一方面當時的改革已經給社會「帶來驚人的社會禍患，包括社會腐敗、物價飛漲和一片混亂」，（註三）另一方面改革精英們發現，在拉美和東南亞國家，「政變產生的、長期執政的個人獨裁者，能有效地同不發達狀態作鬥爭，並且獲得了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新權威主義可以說是在創造『看不見的手』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看得見的手』」。（註四）這就

註一：以六月四日作為整個事件的高潮也是說不通的，大量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月三日晚，也不主要涉及學生。顯然，最明確地皈依和運用西方價值語言、也最受西方媒體注目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被定義為整個事件的主角。

註二：戰後「現代化」理論和西方凱因斯主義密切相關，然而，戰後西方在第三世界推銷的「新自由主義」又和「現代化」意識形態有著一致性和連貫性。見 Leys, Colin. *The rise &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三：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世界經濟導報》。

註四：吳稼祥，《再談新權威》，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世界經濟導報》；蕭功秦、朱偉，《痛苦的兩難選擇——關於「新權威主義」理論答問錄》，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七日《文匯報》。

點出了從「現代化」意識形態到「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關鍵聯接：「以強有力的鐵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市場化趨同」。(註五)

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一個從參照東歐模式到明確效仿「四小龍」模式，再到全面擁抱雷根—柴契爾的「自由市場神學」的漸進發展趨勢。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進的時刻。這些政策在中國的實施，也產生了「新自由主義」改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效應，引發了社會關係的顯著變化，這就是階級的兩極分化，社會衝突的激化。

一九八四年起國營企業實行承包制的改革，帶來暫時的、局部的效益提高，卻深刻地改變了國企內部的階級關係，導致工人和經理層之間的矛盾激化。多數職工感到主人翁地位下降，感到自己變為承包者的雇傭物件。據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八八年對17個城市400多個企業的21萬職工所作的勞動積極性調查顯示，「國營企業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萬職工中認為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的只占12%。」(註六)

一九八五年價格雙軌制改革開始實施，引發了所謂第一次「經商熱」。據學者研究，在這次「經商熱」中，產生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發程度最囂張的一代致富者。「這些人中不少是和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員。他們『下海』的時間雖晚於前兩代富翁，但由於他們能憑藉權力資本，瓜分價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僅1988年，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註七)黨政機關經商、「權力轉化為商品」的現象，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幾年裡愈演愈烈，各類「公司」以每年10萬以上的速度遞增。一九八五年，全國有各類公司大約三十二萬家，它們大多數是

無人員、無資金、無設備、買空賣空的皮包公司。經一年多整頓，到八六年還有十七萬家。到了八八年六月，又陡增至四十萬家。而且這一次「大量是官辦公司。僅國務院各部委開辦的公司就有700多家。這就是所謂的第二次『經商熱』的源頭。」(註八)一時間「官商、官倒」的腐敗成為民眾不滿的焦點。

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最具有「新自由主義」特色的「價格非管制化」(price deregulation)，亦即中國特色的「價格放開」出臺了。當時政府表示，物價關非闖不可，不能前怕狼後怕虎。這一措施也為社會的一般性無序混亂，與後來市民的有序的、有訴求的集體行動搭好了舞臺。首先，創價格關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從一九八四年的2.7%，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7.3%，再上升到一九八八年31%的飛漲高度。物價上漲導致城市居民擁擠到銀行去提款，並掀起大規模的搶購風潮。一九八八年五月，四種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價格放開後，在短期內猛增了60%。這些對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嚴重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據國家統計局的數位，受物價影響，八七年全國有21%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實際收入下降。一位元西方記者報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毛澤東時代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感。它們回憶在毛澤東治國的二十七年的懷舊感。它們回憶在毛澤東治國的二十七年的懷舊感。」

註五：同註四。

註六：《文摘報》1989年1月12日1版《全總調查表明：工人勞動熱情處於谷底》。

註七：何清漣，《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國與世界》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

註八：《四川日報》1988年9月7日4版《現代〈官場現形記〉》。

註九：《邁阿密先驅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十六版。

中，從未提高物價。」(註九)

應該指出，糧油等生活必須品的漲價通常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標準保留節目，它在世界各地實施後所引發的所謂「食品騷亂」也同樣是和「新自由主義」改革形影不離的保留節目。它之所以有如此穩定的因果效應，正是因為「價格非管制化」所波及到的人口是如此之廣，對人們每日生活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它又使「價格開放」——本來是階級之間的財富再分配所造成的社會不滿的矛頭全部指向推行該政策的政府，使矛盾集中和激化。

這裡，應對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學生略作分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大專院校學生受上述衝擊的影響比較來說是相對小的。然而，學生在中國近代歷史傳統中是社會政治事務的熱切關心者和積極參與者，他們富於「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同時熱情衝動，敢想敢幹。在對於「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引發的社會分化與社會矛盾的認識方面，學生具有二重性和不徹底性：一方面，它們深受精英知識份子的影響，「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思維定式在他們當中普遍流行，另一方面，中國革命傳統中特有的價值和語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比如：同情關心受壓迫者，關心國家大事，特別是那些屬於毛澤東的遺產，如受壓迫者造反有理，青年是國家的希望，行使大民主手段等，在學生的有意識與無意識中，在自覺與不自覺的語言和行為習慣中都廣泛潛在。

在一九八九年前夕，「自由主義」改革所造成的衝擊也間接地影響著學生的切身利益：由於社會治安的混亂，北京外經貿大學和北京大學都因學生被害而引發學潮。當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來到時，在「新自由主義」改革進退維谷、民眾情緒普遍騷動的情況下，學生成為首先發難者。即使如此，學生的集體行動在最

初的一個月，並未表現出在「新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等大的問題上的一致的或明確態度，其熱情衝動有餘，理性綱領不足，學潮的政治態度，還完全有賴於和其他政治勢力的互動，以及受其他政治勢力的引導。

相比之下，對學生表示同情、隨後參加到抗議行動中來的廣大的「群眾」，即市民、機關工作人員、一部分工人等，他們受「自由主義」改革的衝擊要大一些，對改革的怨言也多一些。這部分群眾除了痛恨腐敗，也反對改革帶來的通貨膨脹，反對「不三不四的人發財」，在一定程度上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有所不滿，在情緒上對改革前時代有所懷念。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部分群眾中，新中國的傳統價值更強烈一些：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友愛關係，社會公正，基本生活保障，等等。他們藉以渲泄不滿的符號手段，也沒有象學生那樣熱衷於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運用他們更為熟悉的毛澤東、周恩來，以及「人民」、「公僕」等傳統社會主義範疇。這部分群眾上街遊行的時間表也和學生、知識份子「精英」、西方記者或煽動者的活動時間表完全不同：在北京，他們的活動集中在五月十六日到五月十九日那幾天，也恰恰在那幾天，國家主要傳媒對群眾的活動是加以正面報道的。而在此後「動亂精英」最活躍地向西方表演獻媚的那個階段，早已經沒有這部分群眾參加了。(註十)當然，最重要的是，這部分群眾的不滿呼聲是根本合理的，將這部分群眾和學生或其他社會團體相混淆，將這部分群眾的訴求和那些公開攻擊社會主義、要求進行資產階級改革的訴求相提並

註十：除了在西安、長沙在四月份發生騷亂之外，全國大多數的抗議活動在一開始是和平的，而當事態演變成騷亂或暴亂後，公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人物和聲音才佔據主角，反腐敗、抗議「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群眾和聲音也就不再是事件的主要角色了。

論，就是喪失最起碼的階級分析，喪失最起碼的階級立場，也就喪失了正確分析和總結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視角。

最後，對於被稱為「動亂精英」的團體，這裡只需指出：這部分「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與「新自由主義」改革精英不僅在思想面貌、價值觀念和社會聯繫上完全相同，實際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群人。儘管他們有不同的派系，他們對「新權威主義」有貌似不同的觀點，對「全盤西化」的速度和步驟有不同想法，但他們是完全團結在向「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市場化趨同」的旗幟下的。一些熱衷於「新權威主義」的精英們，如趙紫陽、陳一咨之流，在於他們有利的情形下，會拾起「民主」的詞令，加入到普通人群中去，當然，當這些精英一朝得勢，就會毫不留情地開始實踐他們的「新權威主義」理論，俄國的「新沙皇」葉利欽就是一位最好的榜樣。

象趙紫陽、陳一咨和葉利欽這樣的權威主義精英對民主和群眾的機會主義態度，最明確無誤地暴露了「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場」這一對制度搭配的內在不可相容性。他們上臺，才真正需要以鐵腕乃至血腥手段推行他們的「自由市場」改革。在一九八九年的情況下，他們之所以能夠利用群眾，大多因為群眾尚沒有形成自我組織能力，沒有形成有覺悟、有遠見的領導，去真正明確自己的利益、分清自己陣營內部的訴求上的分歧，從而劃分出新的陣營；從另一方面講，也是由於和資產階級精英作鬥爭的進步力量嚴重地和群眾脫節所造成。這就是下一節所要討論的問題。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

自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中認真吸取教訓，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問題上，突破了史達林時期的蘇聯經驗，進行了獨立的、

艱辛的也富有成效的大膽創新，這也是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獨一無二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回憶道：「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們一些地區接連出現了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願事件，每起人數一般有十多人至數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約一萬多人；有幾十個城市發生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願事件，也共有一萬多人；……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指出：『發生人民鬧事的原因有這麼一些：有些是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犯了錯誤，犯錯誤的原因無非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這些東西。不要都講是反革命。』稍後，又指出：『這些鬧事不能夠說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我們不會領導。』少奇同志也說：『人民群眾起來鬧事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然而，當時許多黨員和幹部卻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沒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們對人民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即採取壓制和壓服的辦法，動輒批判鬥爭、開除，甚至動用武力。」（註十一）

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這一全新的、複雜的問題，主要是針對史達林在這個問題上的完全錯誤的、十分有害的簡單化認識和處理。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宣佈，在蘇聯已經消滅了階級，階級鬥爭也因此蘇聯土地上基本消失。當然，在國內還存在敵對階級的殘餘分

註十一：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57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子，在國外還存在著帝國主義的威脅，因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任何尚存在的矛盾，也都是由於這兩種因素，對付的辦法就是採用國家機器的鎮壓。（註十二）

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對發生在社會主義波蘭和匈牙利的暴亂事件非常關注，在一九五六年末的二十天內召開了十四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有關問題。（註十三）中共領導人也並沒有僅僅把對問題的認識停留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層次，而是上升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理論高度。毛澤東一再指出，史達林的嚴重錯誤之一，就是「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拿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人民」。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匈牙利黨的錯誤引起的：該黨在執政後沒有「充分地發動群眾去進行階級鬥爭，反對地主階級，反對資產階級」，事件發生後，匈牙利黨既沒有力量，又不能正確地對待群眾，當時黨的第一書記格羅大罵群眾是「法西斯」，把群眾當成敵人，再加上國內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和利用，使一部分人民群眾受了欺騙，於是人民群眾的遊行示威就演變成對付政府的騷亂。（註十四）

甚至連波蘭共產黨領導人自己在總結波茲南事件時，也做出了類似的檢討，一九六五年七月波共召開七中全會時指出：「尋找事件的原因時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動者和帝國主義走狗的陰謀上去，那時錯誤的」，「極大部分責任要歸中央和地方領導者的官僚主義和愚昧無知」；波茲南事件「證明在黨同人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方面存在著重大的錯誤」。（註十五）

這就是毛澤東的重大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準備過程和國際國內背景。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提出兩條重大突破。其一，就是指出，在

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其二，毛澤東指出，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還存在著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此外，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對於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採取粗暴強制的辦法，只能用細緻的講理的方法。（註十六）

歸納地說，毛澤東對蘇聯經驗的突破創新在於：既對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矛盾的長期性、複雜性和嚴重性給予了充分的估計，另一方面，又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易於混淆、有可能發生轉化等問題給予重視。相反，在史達

註十二：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宣佈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也已經被消滅。史達林直到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才吞吞吐吐地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著矛盾。註十三：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註十三：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註十四：同註十一，第578頁。

註十五：同註十一，第577頁。

註十六：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林和東歐領導人那裡，既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長期存在著自身所特有的種種矛盾，不去重視和處理，而矛盾一旦爆發，則將全部問題歸罪於外部勢力的干涉破壞，採取粗暴的鎮壓手段，將混雜在一起的兩類矛盾作同等處理，甚至將一部分人民群眾也推向敵對勢力。而矛盾衝突的表像一旦過去，又回到過去拒不承認矛盾存在的心態，使得問題和矛盾繼續發展和惡化。

基於這種創新認識，中國人民在探索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制度創新方面，作了艱辛曲折的嘗試。這包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四大」群眾大民主手段，直到「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註十七）眾所周知，這些前所未有的嘗試有令人痛心的失誤，但問題在於：是站在不斷創新的立場，還是因循守舊的立場看待問題。一九七四年在四屆人大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與工人罷工的權利被正式寫進憲法，這不能不說是以種種失誤的代價所換取的歷史性進步。它的意義，絕對不在美國的權利法案的歷史意義之下。

值得深思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在這方面的思考方式和制度運作發生了向蘇聯和東歐的回歸：思想方面的矛盾鬥爭不再被看作是不同階級利益之間的長期鬥爭較量，而是政府官僚從上至下管理社會的一個「緊」與「鬆」的尺度，社會矛盾的斡旋和解決，不再被視為應由群眾自始至終直接參與的領域，而是在兩種極端狀態下往復：或是在「穩定壓倒一切」之下任矛盾發展惡化，或是在矛盾發展暴露到不得不去處理的時候，急迫之下重新祭起傳統的「階級鬥爭」的語言符號（然而也僅僅是停留在它的語言符號的層面，而不是嚴肅當真地運用它的思想內核），依靠這種語言符號的法統權力，以簡單的行政強迫解決矛盾；在此之後，又要以新一輪的「寬鬆」來彌補上次鎮壓

所造成的傷害，如此「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惡性循環，反復不已。

以「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這樣一個認識框架來考察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處理的得失，應是有所幫助的。上節已經分析了採取集體抗議行動的人群中的各種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訴求和政治態度，本節將從時間發展順序上，以及政府和群眾之間的互動的角度進一步展開分析。

為了分析政府和群眾之間的互動，也有必要將政府一方的內部不同傾向稍加說明。在已有的很多材料中，都關注於所謂「常委中的兩種聲音」，即「支援動亂」的趙紫陽與反對動亂的其他領導同志之間的區別。然而，這裡將主要指出另一種更基本的分歧：江澤民在慶祝國慶四十周年上的講話中指出：在對改革開放問題上，存在著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民族獨立來換取別人的施捨」、「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這種主張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顯然，這種分歧也反映在一定時期內的政府領導人之中。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後期提出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沿海地區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主要是受早已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四小龍」模式的啟發。以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開放」、培養「親西方的力量」為目的的索羅斯基金會在一九八九年前夕主動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四所一會」聯繫合作，曾得到趙紫陽的同

註十七：毛澤東，《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3月。

註十八：見周文琪，《美國「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的亮相》，本期《中國與世界》。

意。（註十八）

自然，這種過分依賴西方、依賴西方模式的改革戰略，為黨內的一些領導，特別是那些有很深厚的革命經歷的老同志所反對，他們對改革以來所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黨內腐敗、西方思潮泛濫等問題憂心忡忡，對通貨膨脹、以權謀私等問題引發社會動亂的前景深感憂慮。

還應注意到，在政治精英層還存在有第三種主張，持有這種主張的大致是同一代人，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年齡特點和成長經歷，他們的思想面貌與政治立場在署名「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的《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一文有較完整的表露。在思想哲學上，他們推崇基於「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新保守主義」，反對「激進主義」和「民粹情緒」；在對改革的態度上，他們反對趙紫陽、陳一咨等人的激進戰略，主張漸進地走向「走向現代經濟的新集中」，而這又被設想為一種「黨管財產經濟」，即「培育已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並以「突出民族主義」來增強凝聚力。這派主張的最突出特點是對群眾反腐敗聲音的反感：「在建設時期不適當地強調階級鬥爭，不善於運用法制的手段；比如盲目地發動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比如對現代化建設主要力量之一的知識份子的猜忌與輕視；比如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勵政，不敢講嚴政，無形中縱容了懶漢和投機分子。……在平服社會不滿情緒方面，我們當然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自身缺點，以贏得人民的支援和信任。但這並不意味著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腐敗要反，但應向人民說明，必要的公務特權僅是完成國家職能的需要，必須保持，不可過份強調清教徒式的幹部作風，更不

可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貪污腐敗問題。」這一派言論與上一節所提及的「和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的「第三代富翁」有多大聯繫，尚需繼續研究；這派言論在一九八九年的政府決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很清楚；但將這種思維方式引入到本文的分析物件中來，是有所啟發的。

毛澤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是他矛盾普遍存在論斷的一個具體實例。這裡姑且把上面所描述的政治精英層的三種主張或言論派別分別簡稱為：「西化改革派」、「老革命家派」和「青年派」。

可以看出，在經濟改革問題上，「西化改革派」和自由化知識份子精英與「青年派」的分歧主要是步驟上和策略上的，而主要不在於最終的方向和目標。實際上在一九八九年事件前夕，他們已經能夠在「新權威主義」的共識下團結一致。然而，他們在動亂問題上，觀點截然相反。

另一方面，抗議群眾中「反腐敗」的呼聲與市民中不滿改革所帶來的那些負面效果的情緒，和「老革命家」們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他們都感到改革搞得太快太猛、「有些政策過頭了」，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之間缺少最起碼的信任和溝通，特別是在對學生請願和群眾遊行問題上，他們的看法是對立的。

這裡試圖說明，這些內部的區別和不同團體之間的觀點近似性，為政治陣營的重組以及事件的轉化提供了很大的餘地和潛力。假如一開始就採取宿命論的觀點，把群眾行動一開始就判斷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或「反對共產極權」，或是簡單機械地認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只存在於政府和群眾之間，而不存在於群眾內部和政府內部，那麼，對抗和鎮壓的結果才成為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

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註十九）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兩個多月期間，在很長的時期內都存在著這種矛盾轉化、陣營重組的可能。假如有毛澤東那樣有遠見、有魄力、敢走群眾路線的領袖，事情完全可以向有利於社會主義、有利於共產黨領導、有利於人民群眾利益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方向發展。不幸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在它誕生的故鄉被人們遺忘了，甚至很多曾經參加過和領導過轟轟烈烈的群眾性革命運動的人，在最需要聯繫群眾時刻，卻低估了群眾的因素。

群眾的集體行動的政治傾向和訴求綱領在一開始並不明確，而是在和其他政治力量的互動中發展出來的。僅以《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的影響為例。這篇社論的社會主義立場是明確的，但問題在於它只是通過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語言符號，從而利用其法統來獲取命令權威，而沒有論及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本質：那就是消滅剝削壓迫、追求人與人之間平等的關係，以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而這些正是可以和學生的訴求發生溝通的。其次，社論的真正本質內容（相對於其語言符號），則是強調穩定，反對動亂。問題在於：穩定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動亂也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僅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由反對動亂，是根據不足的。動亂的出現，不過是社會矛盾衝突的表面化，而社論對這種矛盾及其根源則基本沒有分析。相反，它所依賴的關鍵字是一些斯大林傳統的、毛澤東《正處》理論體系之前的一些符碼：如：「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有計劃的陰謀」、「蓄意造謠誣陷者」等等。這些反社會主義因素是怎麼產生的？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特別

是改革以來的各種矛盾是什麼關係？和黨內的腐敗現象又是什麼關係？社論沒有回答。拋棄了《正處》理論體系這個武器，就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客觀地說，「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發生了一些正面的影響，這也是事物的諷刺。「四·二六」社論發表之後，學生注意避免了那些激烈或有明顯錯誤傾向的口號，提出了「擁護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等口號。這一變化，使得市民群眾對學生的同情大大提高，使得進一步的簡單鎮壓變得更困難了。這一效應恰恰說明了：學生的政治傾向極易接受引導，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時間，正確的說理和分析，完全有可能將學生的政治熱情引導到有利的方面去。

然而，「四·二六」社論缺乏正確的說理和分析，特別是有關當時中國社會矛盾的正確分析，從而使學生和政府之間的對抗情緒紮下了根，學生對頗為空洞的說教愈發產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有關「破壞穩定」的說法在群眾中也很難有說服力：恰恰是一年前的搶購風潮、日益嚴重的貪污腐敗等社會動蕩才引發了學潮，而不是學潮破壞了穩定。

此後，矛盾上升到了一個更大規模的表面化狀態，然而即便此時，仍然有很大的引導與轉變的餘地。特別是在五月中旬，政府和學生之間的對抗程度已經有所降低，而廣大市民群眾的政治熱情空前的高漲，任何能夠因勢利導、促進事態轉化的作法，都能夠將全民關心政治的勢頭轉變為極大的政治資本。相反，再採取毛澤東所批評過的那種蘇聯、匈牙利共產黨所採取的對付群眾的簡單粗暴辦法，全民政

註十九：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治熱情的勢頭就會轉變敵視的力量，事件也就會演成極大的災難。

歷史上這樣的正反面經驗太多了。在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中，巴黎民眾攻陷巴士底獄之後，巴黎城洋溢在極度的政治熱情之中。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順應民意，召回了原內閣大臣內克，並宣佈從凡爾賽去巴黎，一度形成了國王與民眾的聯盟。當路易十六到達巴黎後戴上三色帽徽（革命的標誌）出現在市政廳的窗口時，人群爆發出一片歡呼聲。有人喊道：「他是第三等級的人！」歷史學家評論道，路易十六重新贏得了臣民的尊敬和信賴。（註二十）

另一個例子是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運動」。在五月中旬，群眾運動把法國資本主義推向了深刻的危機。全國有一千萬工人罷工，佔領和接管工廠。然而，法國共產黨和戴高樂政府的對策令人回味。深受蘇共影響的法共，從一開始就低估群眾的力量，厭惡群眾的熱情，和法國政府默契配合反對群眾運動。法共政治局委員馬歇在《人道報》上發表文章，指責這場運動是「假革命者」在大學生中進行「騷亂」。（註二十一）只是在後來群眾運動不可遏止地高漲後，法共才機會主義地支援運動，然而，此時法共已經在群眾中喪失威信，也根本無法駕馭運動了。相反，資產階級政治家戴高樂反而顯露出比法共更嫻熟的政治技巧。一方面戴高樂取得軍方支援，但始終未動用大規模暴力，另一方面在總罷工進行了一個多星期後，出現無政府狀態、群眾開始感到疲憊時，抓住法國民眾的心理，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宣佈解散國會，進行立法選舉，極大地渲染所謂「極權的共產主義」的威脅，同時號召支援他的人到街上顯示力量。演說發表的當晚，有一百萬人集會遊行支援戴高樂。此後，群眾運動被瓦解，在立法選舉中，法共更丟失了一半以上的席位，在群眾和議會兩方面雙雙失利。

在任何群眾運動中，無論是資產階級領導

的，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都存在著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現象。只有那些聯繫群眾、信任群眾、想辦法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政治家，才能夠促進陣營的分化重組，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中說：「處理這一事件的主要難點在於，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一小撮壞人混雜在那麼多青年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陣線一時分不清楚，使我們許多應該採取的行動難以出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接受。」這反映了當時很無能為力的一種心態。然而，中國共產黨應付類似局面也不是一天兩天、或一年兩年了，而是從建黨以來就一直在做比這要複雜得多的群眾工作、應付比這複雜得多、困難得多的局面，靠著正確的群眾工作方法，不斷總結經驗，才能從小到大，從失敗到勝利。毛澤東說：「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註二十二）其中特別提到匈牙利和蘇聯，值得深思。匈牙利和蘇聯怕群眾鬧事，大概怕就怕在「壞人好人混雜在一起」。然而毛澤東又指出，共產黨就是「鬧事」起家的，現在怕「鬧事」才怪！對於「壞人好人混雜在一起」的問題，可以設想，假如我們從「壞人」的角度看問題，同樣也是「壞人好人混雜在一起」，但為什麼「壞人」不怕，還要起勁地渾水摸魚呢？

註二十：米歇爾·維諾克，《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1789年風雲錄》，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後來路易十六被人民推翻是另外的問題，那時因為他不甘於舊等級秩序滅亡的階級本能；而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就不應存在這個問題。

註二十一：李青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資本主義理論》，重慶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註二十二：同註十九。

假如仍把自己看成是和人民群眾有著魚水關係、並是血肉相連的，而不是放到當官作老爺、時刻提防被群眾「鬧事」的地位，還會怕嗎？假如說「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那是因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不難想象，聯繫群眾的作風被破壞的時間已久，積累下來的前所未有的群眾不滿一旦爆發，就很難馬上找到正確的處理辦法。

由於上述原因，在一九八九年，沒有發生應有的陣營分化與重組：抗議人群內部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與支援「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派別沒有發生分裂，另一方面，政治精英層內「老革命家」派別與「青年派」在堅決鎮壓動亂這一點上，達到了共識，儘管他們對改革的態度相差千里。最令人諷刺的是，趙紫陽，這位造成一九八八年全國搶購風潮的政策肇始者，從而也應是這次民眾風潮中反「新自

由主義」改革抗議聲音的矛頭所指，反而搖身一變，成為學生和群眾的同情者。

幾方面的互動，把學生和群眾的政治取向迅速推向與政府對抗的方向。此外，學生群體也在和另一個正在覬覦中和角逐中的政治勢力發生互動，受著它的影響，這就是期待從事件中渾水摸魚的西方敵對勢力。這也是毫不奇怪的。中國共產黨人絕大多數都熟悉帝國主義的本性。然而，在中國社會主義國家裡、共產黨執政、中國革命的影響仍然深入人心的情況下，這一類帝國主義滲透干預的影響一般總是第二位的，它能夠發揮作用，乃至重要的作用，總是因為中國內部能夠起主導作用的力量徹底失去了政治上的遠見，完全放棄自己手中的主動性。這將在下節中討論。◎

轉載自：《中國與世界》一九九八年，六月號

本刊第六期有若干錯誤，茲訂正如下，並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勘誤

一、《民主大幅倒退，政局動盪難安》一文，P14.右欄倒數第12行第6字「識」應為「是」。P15.左欄倒數第4行第13字「他」應改為「它」，右欄第10行第3字「們」應改為「民」。P16.左欄第2段倒數第4行倒數第6字「行」之後，漏植「險」字，右欄第1段倒數第1行第8個字起「選舉」為

「民主」之誤。P17.參考書目第1條、第4條其出版年份應由（1993）改為（2001），第4條徵引文章應為〈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二、《霜降》一文，P43.右欄倒數第4行第9字「是」為「這」之誤。P46.右欄第3段第3行倒數第4字「舞」為「無」之誤。P52.倒數第3段第4行倒數第6字「割」應為「剖」。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中深摯的謝忱。

感受你熾熱的心

梁先生 16000元 / 陳映真先生 5000元 / 陳克華醫師 5000元 / 勞動黨 5000元

孫衛先生 5000元 / 林守一先生 3000元 / 鍾先生 3000元

音樂有時未必不是無聲的

■周良沛

拆開一封海外朋友的來信，不禁啞然失笑，然而又默默的，甚至是痛苦地沈思了。

他說：「看到你的來信寄自——北京『木樨地』，一怔，我怎麼這樣熟悉它呢，這可是個怵目驚心的地名！」他所以熟悉「木樨地」，所以為它為之驚心，不用問，我也明白，自然是為頭年天安門的那場風波。

這事，既然稱之為「天安門廣場的風波」，自然就有風也有波。

誰都說，那是說不清的事；

一閉眼，又是歷歷在目；

哦，說不清，還是永遠永遠都忘不了的事啊！

當時，我不在北京，在昆明。那是邊沿地區，信息不靈，行動遲緩。只見大專院校的，已是成人的學生，秩序井然，不是緘口默聲，而是毫無任何激進狀態地揮動小三角旗呼口號，呼喚共和國政治清明的傳統回歸，對那些口口聲聲自稱「公僕」，不僅反僕為主，當官作老爺，還貪污受賄的敗類予以嚴懲的吶喊，是很震撼、振奮人心的。希望總在人間。有的看當前的腐敗已病入膏肓，除非有「第二次革命」，對此已不抱任何希望，冷冷地哼笑著學生的天真外，對更多的人，包括對腐敗已見怪不怪的人，這還真是民主的啟蒙，以此求得更多人的共識。五十年代毛澤東主席早已告誡，平日聽不進群眾意見的，群眾遲早要鬧「大民主」的。學生上街，自然屬此。這當然不是什

麼好事，起碼是政治生活中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百姓有氣要出才會這樣。然而，人們能以這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總是社會的進步。經過十年動亂，人心思定，這樣的和平遊行，是否為「示威」，人上一百，各式各樣，若說多是那樣，我看未必，不過一攤上這樣的事，在位的，有權的，即便也憂心問題的嚴重，可是一見群眾上街，不當你是「造反」，也是給他不好看，難向上司交代，處於情緒抵觸的煩躁。這樣，氣氛必然緊張。

北京，不同。正如國外來的電話，說他們從電視所見，怵目驚心。記得，那幾天電視的長安街上，原來那些漆得如同斑馬線一般的過道欄杆，橫拉過來成了路障，一條路上，好多輛軍車被燒，汽車冒著濃煙，滿天都似瘋婆披散的亂髮。

遊行的隊伍，是沈默的沈重，是無聲的爆炸，但也有款爺們的摩托長陣，車後都坐著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娘兒們招搖過市，完全是另一番風光。這都是柴，這都是火。是涅槃的火，是災害的火，火啊火啊，你要怎麼燒，想燒焚什麼啊！由此，我老想到舊日北平石板路上搖著鈴鐺攬客的馬車，瘦高的駱駝，在荒涼的古都，望著早已毀於大火的圓明園廢墟，似在荒漠緩步於悲涼的失落……想著，總感到十里長街有遭受火的威脅之恐懼。旅途中，從電視見這陣狀，心急如焚，打電話回家，沒人接，家

裡人上巴黎休假了，同時，謠言四起，誣傳我門同蹲貓兒洞的戰友在「血洗天安門」。路堵，搭不上車，往北京趕，也是一次長征的拼搏。心裡也是烈火燒啊！

那時，說明白也很明白，說不明白也真不明白。這種突如其來，情況又在不斷變化的事態，誰也摸不準情況。不要說這局面動盪的大勢，就是別的團，別的連在幹什麼也鬧不清楚。走散了，衝散了，祇有靠自己應變。

那時，這個世界，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不論持何種觀點、態度，抱什麼目的的，都在電視機前，關切地看著這條平日車水馬龍，摩肩接踵的大街竟成了一條死路，如同死水死港。然而，它不是死寂的死路，而是比平日還要喧鬧的，億萬雙眼睛所盯住的一條路。燒著軍車的火是沒有聲音的，很遠看來，夜空都燒紅了，這是不祥的火，燒的人心都焦了，誰都不安。這時，任何一點動靜或是自己疑慮、好奇，甚至為生事之心的驅使，都會為一點聲音，為看到哪裡一堆人而想前去看個究竟，於是，你看著我跑而跑，我看著他在跑也跑，人潮，就像旋風似地旋轉，一時在這裡聚成一堆，互相問你看你，我看你，看到看不出什麼名堂，又各走各的走散了。等一陣，可能還是這些人，又在另一邊聚成了一堆。這不是天安門，有人站出來登高演講，大多數是把他們想說的話都拋在別處說了。

西安

那時，我在西安剛開完會，住在城外的招待所，與當時城裡的情況，是很不諧調的清靜。近在不遠的陝西機關住地被衝擊，燒了裡面的汽車之事，電視一曝光，全國嘩然，然而，城外還像世外桃源。通往華清池的道上，農民將新出的大蒜編成長辮似的，和大棗攤在板車上叫賣，有的，就不一定是農民了，仿製

兵馬俑的小泥人，跟核桃一樣，裝在一個個小尼龍網兜裡漫天叫價。拉菜進城的，有的走到半道，聽說城裡亂了，就折了回來，也有賣了菜回來喜孜孜的，說上市的菜太少，他賣了好價錢，準備再去趕一趟。從他們的話裡，才多少聽到一些世事。守在招待所的人，一個望著一個，憂心忡忡：這要亂起來了，怎麼辦呢？

到市裡的多路公共汽車都不通了。有的車，走到鼓樓，到了鬧區，到了有人遊行的地方，也就趕你下車。只有個個體戶的小麵包車，票價是見風漲，一天之內翻好幾倍，坐滿了，還在叫生意，站票不僅不少一分錢，有時還問你多要一點，因為只此一家。而且，他還嚷著，「跑了這一趟，下一趟能不能走我還不知道吶！」於是，人們就像擠末班車那樣，開價由他，能上就行。而那多這樣的小麵包，擦著街沿，走走停停，隨喊隨停，下了一個，車主就得補上兩個，或更多一些人才行。平日坐來還舒服的小麵包，卻像沙丁魚似地塞在裡面，在那揮汗如雨的烈日下，擠得比什麼都難受。

可是，廣播車卻像在無人之境，如同木樨地前，那些為來去釣魚台國賓館之車隊鳴笛開道的警車，一路綠燈。不過，人們儘管在人行道上擠的跟太陽曬的冒泡的柏油路面一樣，中間的車行道還真是絕無行人，或者說，是兩邊密擠的人群不知為什麼在閃開一條通道。儘管少不了人們的嘖嘖喳喳，廣播車上的高音喇叭又幾乎成了唯一的聲音，宣讀各式各樣支持學生絕食的宣言，也聲嘶力竭地高呼要打倒的人名，名字重重複複，一聲一聲在這熱得像要爆炸的天氣裡爆炸，這倒像是這些名字的廣播廣告，音波迴旋、轟鳴而擴散開去。人們，有喜形於色的，有陰沈的臉如受難的使徒，更多的，是困惑不解地張望。左右幾個人，幾乎不約而同地說著：「我看是『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要說這是人心惶惶的話，我也為之惶惶

然。那年月是打「走資派」，今天喊要打倒的，不少名字還是當年被打倒的那些人。這些是一鬧起來，總會有一批既得利益者，還有挨整的人。雖然各說各的理，可是，一亂起來，倒霉的還是老百姓。突然又買不到米，轉眼又買不到煤，夜裡停電，煮飯時斷水，多少天給買一盒火柴，還是先領票，又得早早的去排隊。那樣過日子，真難吶。想到這些，心亂得看到什麼都是恍恍惚惚的，怎麼也靜不下來。

還好，不知各方是怎麼達成這樣協定的，因為天太熱，遊行的，絕食的，演講的，圍觀的，中午統通休息，日頭偏西了又重新開始。趁機，我在鼓樓附近找到買冷飲的，不想，樓前原來幾位絕食的，也請進到樓裡歇涼喝冷飲去了。可以想到，做這樣的英雄是不容易的，絕了食，總還要喝汽水、冰淇淋消暑才行，不然，就得絕命。

然而，偏西將落的太陽，就像舊戲的開場鑼鼓一樣，一響鑼，散開的人都敲到一起來了。鼓樓門前，真是裡幾十層，外幾十層，人山人海。幾位絕食者，消暑之後又從樓門內出來，垂著頭坐在原處，要是不知道他們剛才已經歇涼休息，補充營養，準要擔心他們會不久於人世。人道主義，什麼時候都要講。我站在後面，除了偶而扒在人家肩頭踮起腳尖往裡面看一兩眼，只能聽到麥克風裡，有一個男子的聲音，敘說在天安門看到學生絕食的情況。突然，只聽到幾聲爭執、吆喝聲，就看到裡圈的人擠著，拱著往外跑；於是，你跟著我，我跟著他，他又看著你，人圍就像決提的水一樣，不可收拾地「嘩」地一聲都跑開來了。誰都不知道為什麼，又都是如此這般地瞎跑了起來。一時亂哄哄的，真是草木皆兵。第二天從報紙上知道，那個演講的，根本不是什麼「交大」的學生，被當場的「交大」學生識破，警察查詢出他是盲目流入城市無業者，要收容遣

返原籍。當時，我的職業習慣叫自己在一家舖子門前站在一旁，看到有不少人走了又跑回來，或是想看個究竟又不見究竟，或是想看看熱鬧又沒熱鬧好看。於是一個人山人海的鼓樓，竟空空蕩蕩的了。在那悶熱的夏夜，暗淡的路燈，照得竟有幾分冷清。

由此，可以想到北京是個什麼樣子啊。這時，街上沒有車了，小麵包也沒有了，我硬是一步一步找到郵電局，掛長途，直撥北京。

「銷號嗎？同志！」大概這位郵務員很久都沒有這麼清閒過，顯然比平日忙得煩躁的樣子要安靜，有股為人服務的誠意。「沒人接！」

「電話號碼是5002255，沒有錯吧！」

「不會錯，——」他又撥了一次，我都聽到話筒連續傳出「笛、笛、笛笛」的，無人接話的聲音。大廳裡沒有人，聲音清晰，大廳裡沒有人，他的業務也很寂寞。「這是直撥，好在現在也沒別的人，你可以自己撥撥試試——」

「不用了，麻煩你了——」這顯然是非常時期，誰知道北京是個什麼情況？家裡怎麼一個人都沒有，連阿姨都不在家呢？是不是在二十六層太高，目標太顯，不安全，搬下樓了？我心裡充滿問號，充滿不安。

在國內，家裡的人，只有這個小時候跟我媽生活在一起的表妹和她夫婿。他們是在北京的華裔外國公民，由他們所在國派駐北京。他們有了車，住得比較習慣之後，又多租了一套房子，準備五月在歐洲度假之後，轉到台北，接這時在那裡的媽媽來北京住些日子。按照原訂的計畫，他們早該回北京了，可是，家裡沒人接電話，連阿姨都不在守門。為此，我焦躁不安，不安得茫然。回到那世外似的招待所，我已無法相信人世哪裡還有世外桃源。這天，實在是走得疲憊不堪，可是倒在床上就是睡不著，迷迷糊糊地老像在作惡夢，電視《晚間新聞》我熟悉的木樨地燒軍車的火，無端地燒在

身上，把我驚醒。這裡，會後到延安參觀訪問的計畫宣布撤銷，因為主人無法負責大家的安全，就是路上沒遇問題，只要前面有車遭搶，同樣也只能在途中拋錨等著。那樣，大家的食宿就成問題。本來，我早就沒繼續前行的興致，這麼一來，要亂的兆頭，壓在心上是沈重的陰影。這時，為制止學生北上支援絕食，車已不正常了，機票也買不到，一說是坐火車的都改為飛了，機票自然緊張，一說是北京港關閉了，無票可賣。總之，一亂百亂，一處不通，處處不通。心緒越來越亂，真是斬不斷，理還亂。

幸好，部隊的人給弄到一張到成都的票。送站的朋友一再告我，路上要小心，注意安全。一亂，什麼鬼事都會出來，路上要是扒上來「飛虎隊」，會搶了幾節車廂就跳下去，逃之夭夭。要是倒霉，碰上了，人要緊，東西讓他拿去好了，「失財免災」。這一叮嚀，不安全的威脅，真成了沈重的負擔。天，本來就奇熱，電扇的風都是熱的，而且天一黑就停了，臥廂裡的四個人還是同意把門關上。我們都知道手上這張票的來之不易，知道比起硬臥車廂多少人像插筷子一樣擠在裡頭站著，說「不是人過的」也還是人在過的滋味，就真是天上地下了。悶在一個蒸籠裡，沒吐怨言，也不好過。車過秦嶺，有場暴雨，天算涼快下來。可是，大家還是沒有合眼，也沒看電視，也不知道木樨地燒軍車燒成什麼樣了。天涼快了，心反更燥；這夜沒遇「飛虎隊」，也算「平安」，可是，社會一亂起來，人怎麼「平安」，也解除不了不安全的威脅。

成都

車上一夜，總算熬到成都，接站的不能進月台，出版社的總編閔未儒同志還是帶了車接到我。雖是一肚子的煩憂，還幸慶一路順利而

嬉笑起來。我在車裡，看到街上和平日並沒有什麼兩樣，還將西安廣播車在街上的情形，作為一種對比和老閔談了起來。不想，洗個澡午睡起來，街上已擠滿了人，上午車過的檢閱台和毛主席的塑像下，已經打起來了。我住的錦江賓館和檢閱台，在這成都，是最漂亮、寬闊的人民路的兩端。那頭在打，丟石頭，這頭就成了圍觀的熱點。這不像十年動亂，分了兩派或多派，在打派仗，而是誰打誰都鬧不清楚。我不敢說當中沒有蓄意搗亂的，更多的年輕人，倒像平日太「規矩」後的自我「解放」，或是為合理或不合理的不滿，伺機發洩。在這圍觀的熱點，不時有人從前面跑到後面來發佈各種各樣的消息，也有冒險擠到前面去看看「真格的」，只要有任何一點動靜，就驚得這些人突然莫名地亂跑起來，一會兒又很自然地聚合在一起，跟西安看到的情況差不多。不願再看這種熱鬧，倒想好好睡一覺了。客房裡，幾乎沒有別的客人，又有空調，雖然也聽到一些鬧聲，我也強制自己不去管它。一亂起來，不管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要找清靜，真是浪漫的幻想。這夜，也跟在西安一樣，盡作夢，可不是夢到火燒著我，而是夢到那個如在世外的招待所，人在桃源的詩境。這兩夜的夢，偏偏是現實的反差，來個顛倒。尤其作了好夢起來後，服務台不見人，電梯也不動了。我走下樓來，看見大理石地面的大廳，全是門窗摔碎下來的玻璃，以及連花連土花砗碎在一起的傷痕。平日配上那高高的水晶雕花的吊燈而顯得特別氣派的大廳，好像剛剛有過火災，地上淌著滅火的水。廳外的亭台、花園，竟然遍地都是脫鞋和易拉罐飲料的空筒。本來可以隨便出入的賓館，門外又擠滿了人，攀著柵杆探著頭往裡頭看稀奇。原來昨晚我在床上聽到的鬧聲，正是一夥歹徒衝打進來，許多想趁機來「撿便宜」的三教九流的城鎮閒雜人員成百

上千的，確實是壯了聲威的，浩浩蕩蕩地衝了進來。好在賓館自己有保衛人員，通訊聯絡設備齊全。他們對天放了幾槍，武警部隊的警車便在夜裡刺耳地「笛笛笛笛」地呼嘯而來時，這些烏合之眾也就作鳥獸散了。對空鳴槍，是對衝往廳內商品部珠寶櫃者發出的警告，在廳外的小賣部裡，他們只好撈些不要錢的菸酒飲料就當場大吃大喝。悵惶逃竄時，人擠人，人踩人，就給地下拋遍了無以數計的脫鞋。門衛告訴我，這伙人，原先是衝著對面更豪華的「岷山飯店」的，裡面有外賓，男男女女，包括泰國、日本的眾多僧尼，僧袍袈裟的，也是浩浩蕩蕩的下樓出門，說要出來保衛飯店。個個高頭大馬，往那裡一站，竟把這伙人弄得不知如何動手了。不知飯店裡的一個什麼傢伙，轉嫁危機，以鄰為壑，還拿了一瓶油給他們說：「你們到別處去嘛！」就把這伙人引向這裡來了。他們一進來就倒油燒車，幸好是煤油不是汽油，否則，一燒起來，那幾排車都無法救了，後果，不堪設想。這個故事引人深思的東西太多了，應該做為報紙的頭條，卻不知為了什麼，喜歡花邊新聞的晚報，對此竟隻字不提。而這夜的夢與現實的對比，給我是難以抑止的衝動，我也不知它是哲學，還是人生。

總之，高枕無憂的夢不能有了，總之，再亂下去，人們開初反腐、反「官倒」所高漲的義憤而萬眾一心的鐵拳，本是可以推動反腐、威懾貪官的力量，這樣一來，則完全可能和這場動亂扯在一起而難說是非，成為民主進程受阻的隘口。這股潮，始於北京，北京會怎樣呢，我每天都掛電話，我的那些朋友也不出門，只是從臨街的窗口，望望他們自己所在的，很熟悉的，又陌生了的木樨地。這些人，是在昨天的戰爭之中摔打過的，不能說在這窗口看得不驚心，但也不會大驚小怪，驚惶失措。而妹妹那裡的電話，還是沒人接。站在賓

館的樓頂，看到檢閱台側燒電車的濃煙翻滾，全國十大商場之一的「人民商場」是幾天幾夜的在燒。成都六月的晴天不晴，太陽不亮，天空全罩在煙霧裡。那火場，自然比這火沒燒起來的賓館要慘多了。可是，夠了，夠了，困在這動亂之中是又苦沒處訴，有火無處發而要發瘋的情緒，別的，還有什麼好看呢？還有什麼事需要自己去關心，過問呢？

機票沒有，車票沒有，就是有，檢閱台、鹽市口在燒，在鬧，一個外地人還沒本事提著行李穿過那裡上車呢。隨著形勢，全市旅館一概不準接待旅客，以控制流動人口。賓館雖然掛出「停業整頓」的牌子，也催走為數很少的旅客結帳，畢竟還念我是可以相信的常來之客，沒有硬性轟我。而我自己也呆不下去，整天坐不是，站不是，出也出不去，從那天接站的車送我到賓館後，以後大小機關的車全鎖起來不準外出了。無獨有偶，個體戶的小麵包可來勁了，人越多，價叫得越高，一日數漲，這，在這社會，真不知象徵什麼，意味什麼。

靠在床頭，只好不停地給熟人撥電話。朋友間除了只能有些焦慮不安的怨言，說得人心越說越焦外，這個時候，真沒什麼好說。我也圍聽到那些街談巷議，大家對物價上漲感到難以承受，對「官倒」、受賄，對社會治安不力，從文學的「性大潮」到出現暗娼、賭場等等敗壞醜惡現象不滿，對分配不公有意見。有的，感到這是「報應」而痛快，有的，為鬧得這樣而不滿。沈渣泛起，腐敗成風，誰能對此無動於衷，麻木不仁？天之怨，人之怨，早已是把火，要能使它付之一炬，當然痛快，若像眼前「人民商場」的火一道燒，裡面燒的可全是每日生活需要的百貨啊，會把咱們這個本來就不富裕的國家折騰完了。唉，老百姓不是要推翻政府，是擔心這樣下去社會主義會少了，沒了。我不知怎麼說是論非，只從自

身的行程感到一切都運轉不靈了，只想要一張票，卻不知去哪裡弄。當事情還沒轟到這裡，四五月只是在天安門廣場鬧的時候，旅客銳減，賓館的服務員沒有獎金了，有的給病號工資叫他們回家休息。唉，誰都怕這一鬧給自己帶來的威脅。代購票的項目都取消了。我不信弄得一切都運轉不靈，處於半癱瘓狀態，就可以解決民主和反腐的問題。然而，「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已成了某種逃不出的怪圈？千年封建遺傳基因只能是民主的死結？小農生產散漫而「自我」的惡習只能是瓦解集中的殺手？如若真是需要「二次革命」，那麼，為此呼喚「革命」者，以及眼前各種對立、衝突的勢力，首先都得「革革」自己的「命」，接受真正的民主洗禮，才有資格談「革命」。否則，中國人，中國人廣大農民和城市居民，只要飯能吃饱，是不會跟誰去鬧事或「革命」的。他們太善良了，若說是對民主的要求太少，那也是世代的飢寒，知道今日的溫飽來之不易。他們並非白癡，對現存秩序腐敗的潰傷，同樣咬牙切齒，可是，他們同樣怕亂，這麼大的一個中國，一亂起來，後果不堪設想，遭殃的可是下層平民百姓。比之「先富起來的人」之所有，他們所得到的，是太可憐的一點，要是這可憐的一點也給亂掉了，又去哪裡討吃討穿呢？只能亂得有的越有，窮的更窮。尤其是產業工人，儘管他們主人翁的地位，在富人掌握了太多社會財富時必然削弱，但他們的階級自信還沒有理由絕望，否則，必然大亂。那時，怕亂，談「穩定」，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如今，不是個例，而是不少人總在那麼觀世：非神即鬼，不是天才就是白痴，若不保皇，就是亂黨，爪田李下，必然遭疑，以及「抓死」、「放亂」等等類似的思維定向，也像阿Q精神同屬國民的劣根性，依然頑固。那麼，儒家的中庸之道，也是國民生存狀態中的

精神平衡因子。為此，你的「革命」，即便十分有理，若不能既速解決實際問題，並以破壞它中庸之平和開始，那麼，這個開始必然是它的終結，是為自己掘墓。反之，貪官、庸官若以此作耍弄權術的平台，欺騙、損害、戳傷了百姓，那麼，他們恐怕又該走到另一個極端而狂熱、激進起來。世事的無常，看似無規則的遊戲，卻是以血和淚做出的選擇，包括他們所看的「民主」、「自由」和「革命」，這就不知是他「命」死胎腹，還是對他「革命」的諷刺了。後來得知，其中一些有組織的對抗團體，如「高自聯」，已有武器、電台等設備配備，在我們對此嚴加管束的社會，有此後援的背景，非同一般，肯定背後有藉此以輸出他們的「自由」、「民主」者。若接受這種輸出，怕只能有亂得更加無政府狀態的「自由」、「民主」，那倒是「自由」、「民主」的悲劇。

北京

想著這些，更愁弄不到票。很巧，一位外賓也為此取消到昆明的旅遊，要直飛香港轉機回國，把他要退的票轉給了我。我想，邊沿地區的情況一定會比成都好一些，果真如此。等我再轉到北京時，見到妹妹家的阿姨，說妹妹三號自巴黎回來，從機場到家，就折騰了幾個小時。在樓上看到大北窯立交橋上進駐部隊受阻，坦克的砲口高昂著，她就搬到建國飯店主樓外的低矮偏房住了一夜，早上又趕到機場。那裡，樓上樓下，連地上都坐滿了等飛機回國的外國人。妹妹沒有等來接僑民的專機，買了張上東京的票從東京就轉台北了。給阿姨還來過一個報平安的電話。

這一來，我算放下一件心事。晚上雖然偶而還有打黑槍的槍聲，街上，畢竟看不到頭些天電視上的樣子，混亂平息了。同時很醒目的多了許多帶槍的戰士頂著烈日，一動不動的在

站崗。有群眾送茶水、西瓜、大遮陽傘的，也有罵街的。南邊的，北邊的都知道，沒有北京人不敢說的話，小青年們，一個個的嘴能著呢。一開口就得痛快，罵得開花了，才解氣。進來戒嚴的，有的是我生活過的部隊。小戰士在人前，任怎麼都自己忍著，見我，講到「罵不還嘴打不還手」的那股受屈受辱之委屈，眼淚是怎麼樣也憋不住。光講大道理是不中聽的，可是，又需要講什麼大道理？恢復到正常的秩序，總是說明了它可以說明的問題。那一久，我也折騰得夠嗆了，只要能安安靜靜睡一覺就滿足了，不要有夢，不論它是惡夢還是美夢。聯繫到前兩次的經驗，下意識地想到，夢是不祥的。

果然，這夜沒有夢，睡得很香，在該起床時也起不來，卻被電話鈴鬧起來了。

「乖乖，你回北京了！」這是父親的聲音，雖然我快六十了，就是八十了，在他面前也還是他兒子，而且總是一個長不大的兒子，順口就叫「乖乖」。留在國內，是我自己很堅決的選擇，老人為此總感到對不起我似的，雜亂之年，且不說它，但十年前，我還是這樣。我不信一個作家離了根還能有什麼作為，不亂物質條件有多好。本來，他也為我如此感到不可理解，只為父母就是父母，反而自責、內疚。為此，我更難受。我注意到，比我小得多的妹妹跟我在一起時，也總是跟爸爸一樣改不過口來，「北京」老是喊「北平」。這就為，我們畢竟在不同的天地生長，又畢竟有著血緣關係。本來父親是十點鐘要趕到桃園機場登機從台北回洛杉磯的，早上還想在電話裡找到我說兩句話。很巧，我在。開頭這一句話，就引起我諸多聯想，是辛酸的溫馨，溫馨的辛酸。

「你好不好哇！」

「剛從西安來，很好！北京很平靜，秩序在恢復——」

「我們不要談政治！我只要知道人好就行了！你好好保重，我走了！」

他要講非政治的平安，這裡又只能是平安的政治。

那口氣，一聽就知道，他那「知道你好就行了」的話，實際上是不放心的話。這時候，他就是沒有掛上電話，我也不知道跟他說什麼好。過了三天，父親大概是適應了時差，睡了兩天之後又來電話，又是那句話「知道你好就行了」。父母掛著兒女是必然的，然而，他總難相信我確實很好的疑慮，可能就是他說「不要談政治」時的 political 了。這天，香港有人在電話裡就說得直率得多，他也是在電視裡看見這看見那的，而且相信有的人的政治「預言」，怕這個政權維持不了多久而替我擔心……。我也只有請他相信我此時平安無事的實情。雖然社會問題確實不少，可卻不是政權還能維持多久的問題。我受過侵華日軍、發動內戰的反動派之害，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然而看到現在的戰士，烈日當頂，一動不動，有的中暑就倒在原地，當今世界，出兵入侵別國者有，國際販毒和反販毒者，同樣需要武裝。多少人眼裡像安琪兒一樣的「國際和平部隊」的「和平」，還不是放在刺刀上？喜歡亂的人，自然另當別論。我這從亂世中來而再怕亂的人，看到亂過去了，不論此事還有多少可議論的，我也幸慶八九十的父母能對我說聲「知道你好就行了！」

二十天後，妹妹回來搬家。事先來電話說，只準備在北京呆三天，因為他們所在國要他們撤走。要我事先幫她做好點準備工作，讓她能按時啟程。那天，司機從機場接了她，沒有回家就四處跑。天黑了，吃了阿姨精心作的一頓晚餐，妹妹也就在外國人怨北京寂寞於沒有夜生活的燈下，拿出一把小件小件的首飾，以它在柔和低調的燈下閃著燦爛之光的價值而要給我。

「媽媽要你帶在身上，若是亂起來要逃難，沒有辦法時，拿一樣出來給人換頓飯吃，有設關卡的地方買個路，一次只能放一樣在外頭，可不能露財——」

我聽得傻了，有這麼嚴重嗎？但是，童年的記憶是磨滅不了的：在亂世，米價一日數漲，就跟西安、成都那些麵包車的票價一樣。鈔票會到沒人要的地步，一摺嶄新的票子，還買不到一包手紙。在都會還換「綠的（美鈔）」、「白的（銀元）」，小地方就認這種小首飾了。這裡一鬧，那裡一亂的，交通中斷，沒糧沒菜的，搶糧劫庫的就是英雄。不知多少提籃拎包的蹭在一邊想檢點便宜，或是用小掃帚把人家撒潑在地的連泥帶土的掃起來去淘洗。要是城圍，成了死城，也得吃觀音土，也得吃樹葉，還真的會人吃人……。只有個人流離在山村荒野的時候，遇上好心的人，連討帶買的，一個戒指才換碗飯。那時，一碗飯可能就得換回一條命，過了卡，可能就走出一條生路。而眼前，可能重演那種歷史嗎？既使還要亂下去，也不是過去在一塊塊小地方小槍小刀的小悲小痛，而是席捲大河上下之龍捲風。對於那以其所謂的「民主」作為無敵的武器之對立勢力來說，這龍捲風真能捲來他們安排的「民主政權」麼？不是另有心計的人，誰要信這，也只能是書讀得多了而太天真的人。可誰要對別人的「武器」為其對立者在耍弄，不屑一顧，無視民主，自然也是非常危險的，只能幫助對立者打倒自己。按照中國的「特色」和目前的現狀，這龍捲風更可能捲來內亂、內戰、共和國解體，地方割據、「列強」重新來劃分勢力範圍的悲劇。那時，個人既使能在奇蹟中倖免，也未必有必要再偷生。談到這些，心情黯然。

為了告別，表妹請在家幫了一年忙的阿姨上王府飯店吃飯。這家平日要訂位、排隊的五星級飯店，由於外國人大量的走了，電梯邊寂

寞地飛流著人工瀑布。餐廳裡，服務員遠遠比客人多。幾位著中國長衫、古典衣裙的樂師在專心於他們的絲弦，個個頭已斑白，可能都是藝術院校的教授，為了增加點收入，在賣藝。他們出手的，畢竟是藝術，比那狂吼乾叫的歌星不知好多少。但，此時此景，那悠雅的《春江花月夜》，聽來，人泫然。這一頓，除了將阿姨當客人在勸菜之外，只聽到表妹說過一句話：「不消買碗飯買命，只愁你在這裡捨不得吃！」

我知道，這是她還想著我們頭夜談的往事，有感而發。六月四號，她在二十六層樓上，是望了又望那立交橋上坦克高昂的砲管而去的。在國外是日日夜夜看著北京浸在血海與火海的電視。所以這次還沒下飛機，腦子裡就不斷地響著砲聲槍聲。本來，難盡人意的事也多，由於她是那麼不安，甚至有幾分恐懼冒險而歸，但現實之所見，反倒使她出乎意外而平靜了。三天到了，她也沒走成。公寓的經理，要請這些由於同樣的原因要離開的朋友開個座談會，請他們對工作提意見，開歡送酒會，更歡迎他們再來。加上這一年她認識的朋友不少，這個也請吃飯，那個也請吃飯。太太們也放心地結伴買絲綢，買古玩，為離別。於是，原定的三天，竟拖了二十天才把行李送到機場。走的前一天，屋裡已是空空蕩蕩的，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了。司機辭了，他還是要堅持送她上了飛機才回家。平日，大家都是過的緊緊張張的，不辨生活的顏色，司機要來，也是辦完事掉頭就走。這天，大家倒閑得有點雅興了，也不想坐車而想走一走了。從建國門到木樨地出地鐵站，車行道兩邊，竟然全是大片大片的月季和玫瑰盛開，就是木樨地河岸的斜坡上，也是如此。有紅、有白，有紫紅、有粉紅，相間相映，色彩的層次，起伏著花的波浪。微微的風，飄著淡淡的清香。飄動的雨絲，入泥無聲，風吹的花瓣，落地無聲。

「真漂亮，比花園還花園！」

「可惜你要走了！」我嘆了口氣說，「還會再來吧？」

「怎麼來？外國是要搞經濟制裁啊！大哥，你才是把自己關在大陸，不知道在外頭的人看見什麼？」

「看什麼？你們就是那些東西看多了才有那么多怪想法！我也聽了不少老外所說的中國，我更相信自己眼前的現實。中國的問題真不少，我也有牢騷，可不是像你們所說的那樣！這些日子，你自己也看到了，不就是這麼回事嘛！」

「咦，你又發什麼牢騷了？爸爸說了，不要談政治！給我拉拉手，我要走了，看到合適的房子給我買一套，老了，要回國住的！」

「好哇——」我對這嬌氣的小妹，也沒辦法，只有跟她嘻嘻哈哈的拉拉手。「你什麼時候回來都好！」

.....

不想，又是一年了。往年我沒注意到的玫瑰，今年注意到它又怒放了。今年春夏多雨，晚上被雨聲驚醒，推窗望著都市的塵囂反被雨聲壓靜了。路燈的光，照著大片的月季、玫瑰，起伏花的波浪，雨入泥無聲，風落花無聲。亂世過來的人，不論還有多少牢騷，太平年月的清靜總是清靜的太平年月。這靜穆，是神聖。這樣一來，那場風波，似乎又在心頭翻騰。不論從正面還是負面看它，都有太多不該忘記，值得汲取的慘痛教訓。東單天橋上曝光於電視的屍體，不論被何人所害，是怎樣死的，我看它燒焦得還滲著紫黑的血。那些風波過後，依然故我，照「倒」照貪的壞蛋，將人心思定之安定，看做他的強力、神機妙算之功，那麼，什麼希望也沒有了，這花前的太平，本似警示著危機，倒成了他等禍國殃民的粉飾。然而，風波畢竟過去了，它的過去，也不是誰的賜予，是要亂者，有違人心，亂不起

來；是怕亂者，眾志成城，使前者失去它的基礎，是不用槍砲的槍砲。人心思定的太平也在人心太平。就像妹妹沒下飛機，腦子裡已是槍生炮聲一樣，我也恍惚聽到有種聲音，正是這安靜自身的聲音，這時我才悟得詩人綠原「音樂有時未必不是無聲的」詩情，在這曾經使人為之「怵目驚心」的木樨地。

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木樨地

※※※※

「天安門風波」一年後，三十年代的老詩人甘永柏之兒媳，在「華僑出版社」的小楊也住木樨地，她過了幾道門來為國外一華文刊物《海內外》約稿。我將這篇自己於「風波」中之記實的散文給了她。那時，家庭還沒傳真等設備，稿子寄到，聽說是由於經濟的原因，刊物也停了。小楊也赴大洋彼岸定居。同年，我在台北，寫了這麼一則手記：

錨定台中，公開售票參觀的所謂「自由女神號」上，不停地播映所謂中共「鎮壓民運」的錄像。不少觀眾，到過大陸，很有些自己的看法，但他們知道我是大陸來的，還是問：「錄像不能假吧！」「群眾怒斥腐敗、『官倒』的影像，包括動亂中燒軍車，十里長街，濃煙滾滾的鏡頭，大陸的電視新聞中，同樣播過，自然是真的。但一經剪輯『加工』成其所謂『血腥鎮壓』下群眾呼反共口號，要推翻人民政權的宣傳，叫我也想，若在有『血腥鎮壓』時，還有容許他們呼那些口號的可能麼？」於是，我講述了當時一則雜記中講到的情形，朋友說：「講的是事實，就假不了！」為此，我想，這一札記還是可以公開。……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台北◎

霜降

顏世鴻的回憶錄

(七)

著■顏世鴻／編註■藍博洲

十四、秋之歌

葉盛吉寫的「中日」不會是楊廷椅，因為那位「中日」是到滿州的台灣人，故鄉是台北的淡水。楊廷椅卻是新竹香山人。單獨與他接觸的還有江源茂兄，情況與我略同。因為受成功中學案的影響，法學院支部的差不多逃散了。

人生禍福是難知。如前面所說的，除非「自新」，否則只有兩條路：一條如周慎源；一條如其他多數人，如葉城松（註五十六）、石玉峰、吳東烈、張壁坤（註五十七）。四十一年以後，案發更無倖免，如翁文灝、梁培英。反正，都是死路一條了。而我也不知道自己落到什麼地步。

我不是偉大的人物，不敢對自己下什麼肯定的東西，所以才先留在台北至六月底，賭一賭。韓戰，那時候還沒有預料到，而六月中旬的十七、十八又過了，我不敢對中共渡海大軍的登陸太樂觀。這些因素前面也已經說過了。如韓戰發生後，我還在外面，又當如何呢？當一個中國人是不易的，有許多不易，好的、壞的。南韓，如李承晚，也是毫不容情。做一個韓國人也不是容易的，所以才有那麼多韓國人送去美國。一旦國家不愛你，當你心碎，也不想以愛、以生死相許，只好流浪了。

十月下旬的台北，早晚已經相當涼了。當時，新店的看守所落成了，有些不夠格早點名的人，已經移送到那邊。人不擠了，不再拉風了。那些早上被叫出門的人，也會在身上多加

一件外衣，雖然用到它的時間不會太長。

人類的歷史有過更悲慘的遭遇——如迦太基的族滅、特洛伊的陷落、耶路撒冷的落城、長平與新陽的坑卒、揚州、嘉定的屠城、希特勒的死亡營、史大林的數次大整肅、以後中共文革的暴風烈雨、高棉及西貝的族滅……我們又算什麼？

政治是一隻怪獸，你把它看成美的就是美麗，是藝術就是藝術——看透了，政治就是政治。即使無政府主義者極力想撇開它，但是已經分工這麼細的社會，要退回原始打獵時代的人際關係是不可能的，他們只好杜撰一些委員會來搪塞，這些使人無法填上去的環節。政治最無情的一面就是；當你在尷尬的時代，尷尬的地點，做了愚蠢的禁忌的遊戲。戰爭與政治是雙胞胎，一八一三年，拿破崙要從莫斯科撤退時，連那斯文的N·托爾斯泰，都會描寫那平常和氣的法國軍官彼埃兒豹變的眼神。就是那種冷漠，使不可能的變成絕對的。

我不過是這大時代亂局的一個小泡沫。

秋天來了，人少了。我有時候靜下來，傾聽以輕而低的聲音，吟唱魏爾倫的〈秋之歌〉：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lans de l'automne
Blessent mon coeur D'une
langueur monotone.....
Et je'en vais au vent
manvaris,

註五十六 ◆ 嘉義人，就讀台大法學院時，投入學運，一九五五年四月廿九日處死。

註五十七 ◆ 嘉義人，繼葉之後領導台大法學院學運，與葉同時犧牲。

Qui M'emporte deca, delà
pareil à la Feuille morte.

「秋日的小提琴的，長長的嗚咽，以單調的弱音，一切窒息而蒼白，我回憶往日，我啜泣，我行走於疾風裡，我被風吹去，忽南，忽北，儼然一片死葉。」（胡品清先生譯）

確實，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將似這些落葉，在此殘秋或冬天中散去。

如此，在那沉鬱的時刻，在寂靜的秋天，我默默傾聽這法國小調。

又十三年多，我才有機會看到那「最長的一日」的電影。才又聽到在英國的廣播中，在諾曼第登陸之前，用這頭兩句，做反攻開始的暗號。那低沈的聲調，使我心中又重新顫抖。

事實上，十月底，我們出去洗臉，已經感到冷意。而且倒馬桶時，偶而看到，由街路那邊飛過那道牆的幾片落葉。有時候，一陣北風吹來，它又輕輕飄起，真的，向南向北，偶而向東向西，好似起舞，又好似預告一些生命，如此飄落。

那幾天我有些反常，有些焦燥感。或許正在看H. G. Wells的《生命的科學》，我本來就看了兩次，看起來沒有勁，而一再在紙上塗寫：

“Rappelle toi lorsque des destinées,
M'auront de toi pour jamais Séparé.”

（後面再說明）

一次又一次，那分明不光是有份不安，還有份不吉祥的預感。

就這樣，我渡過了漫長的十月。未曾失眠的我，有時候在破曉時分愕然從夢中醒過來，再也沒有辦法睡著。想看書，時間還太早，只有看守在悄悄地走動。而對面的房間，差不多那時候，吳思漢兄就已經做他的早上的課程。

心想十一月了，差不多是時候了。那就是十一月一日的天亮的時候。再一個星期就入冬了，睡在我對面的小劉，還未滿十八歲，仍是沒有穿衣服，睡得很甜。哥哥劉嘉憲，屬於施部生下面的武裝工委，在別案也將死亡。（註五十八）

「秋決」之後不久，真的秋天就來了。如前面說的，偶而幾片枯葉，也會飄進我們住的這禁域，尤其風強的日子。洗臉、倒馬桶的時候，偶而會和它們相遇。而且不似九月，到外面有時候也要加上一件夾克什麼的。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由上海回台灣，身邊還剩下五十多萬法幣，就託表姐買一件皮夾克（當時那個價錢可以買到），想不到表姐註冊、選課、開學一忙忘了，兩星期後摸到錢想起來的時候，卻只能買一件布做的夾克和一本英文版的《戰地鐘聲》。

光復前後，我讀過不少日文的小說和翻譯小說。我愛夏目漱石燙人的幽默、阿部次郎的輕煙般的愁傷、里見淳的痴情、島木健作的真摯，卻最好永井荷風、橫光利一的銳利和中堪助的輕盈。翻譯的則為幾個俄國作家，卻偏愛奧國的卡魯沙、德國的赫塞及兩位曼，英國只限於狄更斯。我抄的那一兩句法文詩，是由永井荷風的《美國物語》而來的。

事實上，這時候命運差不多是定下來了。如同當年凱撒叫了：「Alca Jucta Est」，揮軍渡河進軍羅馬那一瞬間，羅馬已經要走上以後的帝國的路線。我一再說過，只因為沒有見過起訴文，發過起訴書，心中存有份無知中的不安、焦躁及苦悶而已。這也是我們這些邊緣地帶或亞邊緣地帶者無知的苦惱，自己、心中有數的已早不存僥倖了。

如那〈秋之歌〉，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將似這些飛入禁域的落葉，在此殘秋或冬天中散去。如此，在這沉鬱的時刻，我默然地，

註五十八 ◆ 劉嘉憲與施部生等共九人，已在十月廿七日被決。

想起葉盛吉，想起許強先生，想起對面的吳思漢、楊廷椅、陳水木。還想到，萬一運氣不好，可能也會落到自己身上那驚浪擊岸的一瞬間。但十一月一日那天倒是沒有早庭，吃罷早餐不久，大概是過了中午不久，看守開始叫名了。那時候已經慣了，知道是要到新店看守所的。由台北案的人開始，然後接著是叫我們的案子。陳子元、江源茂、葉雪淳都叫了出去。他們把東西放在A區前面，那許多人走過，許多個早晨洗臉時他們也每天走過的水泥地的廣場上。

時間好似忽然被凍結了，很久很久沒有聲音。我心想，可能落到殘留班了。從B區仍有人出來，我感到自己心內有些諦觀，也有份心悸的跳動。到了最後，看守又轉回來，走到我們房前，叫了我的名字。所以，我算是從A區最後出去的一個。

那時候的心情，實在又矛盾又可笑。我實在斷然不是文天祥、或是譚嗣同那一類料子，頂多是如法國一七九三年的那位拉波西的角色。我也不是沒有動靜，只是沒有把那無可奈何的對命運的一份期待，表現在外表而已。而且在這裡，每一時刻、每一剎那的言行，都必得守份。對留下來的同案及台北案的熟人，有些是到這裡才認識的，不但是我，要離開這裡的心中都有多少相似的，不能書寫在文字，或以語言來表達的回味，久久在心中。有許多人，向我擺手示意，即使不同案的人，也不敢公開表示什麼賀詞，我也向他們頻頻搖手。去的人，大概是無事的；留下來的，可能都在十五年以上，那就看辦案的法官怎麼裁決的。原則上，上面的批示會有變更，所以上面兩級的判決，就慣例來說，都是殘留的。

就結果來說，台北案留下來二十位，去了十四位。我們留下來十三位，黃采薇小姐是女性；一位周姓農民，楠梓人，無罪交保了。（無罪不是釋放，而是交保）其他十一位，連

一個也沒有留下來。李水井、楊廷椅、陳水木、黃師廉、陳全目、賴裕傳、吳瑞爐、王超倫、鄭文峰、葉盛吉、鄭澤雄。黃師廉名列第四是意外的，他屬嘉義支部，支書是當時尚在逃亡的葉城松。

拿著行李，到了外面，遍尋不著葉盛吉和許強先生，我已經覺得熱淚盈眶了。趕緊拭掉淚水，因為心悸過去了，有份安篤感；那是最老實的反應。不過，心上卻沾上了太多的類似犧牲了朋友的那種罪惡感。

由亮的外面看不到裡面的押房，雖然那天是雲層很厚的晚秋。剛過了中午不久，（沒有人帶錶）內外的亮差太大，而且還隔著那相當寬的走廊。

開始點名，而後兩個人銬成一對，偏門外有一部交通車，上面有座位。兩個人銬著，互相合作，把行李放妥當了，有的人有座位就坐下，有的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台北案是二十多位，我們學委案是三十一個，雖然相當擠，不過，對我們來說並不太難。我是最後幾個，所以坐在行李上。車內只有幾個憲兵而已，不像早庭那樣的大場面。反正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剛剛逃過了一劫，似乎拾到了老命似的，就算是不銬，也不致有人會想逃跑了。

車就如此駛離，我們住了六十個晚上，六十一個白天的青島東路三號。不走中山南路而走杭州南路，所以，我來不及向台大醫院投下一瞥。而後車拐南昌路，再入羅斯福路。

我的臉向東，所以經過台大時，看得清楚。相別四個多月，並沒有多大變化，似乎增加了幾個攤位。車速大約四十公里吧。（我跟葉盛吉一樣，受過滑翔機訓練。看流動速度，就有一種相對的速度感。）

一路上，沒有路人停下來看這一部平凡的交通車，而我們只能默默地以匆匆而迅速的眼光，帶絲依戀，掃過這一個我們都熟悉的都市。住了五年半，自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早

晨，而今已經失去任何關係的台大。傅斯年校長，那時候還活著，有高血壓，而且聽說，隨時都可能有意外。事實上是他只活了五十個日子。

那時候已是下午了，雲厚，有點冷意，不過沒有下雨。我內心又默默地唸著那一首謬塞的詩。

Rappelle-toi, lorsque les destinées
M'auront de toi pour jamais séparé,

.....

Songe à mon triste amour,
songe à L'adieu suprême!

.....

That que mon coeur battra,
Toujours il te dira;
Rappelle-toi,

Rappelle-toi, quand sous
la froide terre

Mon coeur brisé pour
tuojours dorwira,

Rappelle-toi, quand la

fleur solitaire,

Sur mon tombeau doucement,
S'ouvrira.

Tu ne me verras plus mais

mon âme immortelle

Reviendra près de toi

comme une sour fidèle,

Ecoute dans la nuit,

Une voix qui gémit;

Rappelle-toi.

請惦記！

如是命運將永遠地把我
由你身邊撕離，

你當記住我們悲切的愛情。

想起別離當時，

如果我心內的響聲未盡，

我將永遠在心中向你傾訴，

記住吧，請你記住！

記住吧？當我破碎的心

永眠於這冰冷的地上。

寂寞的花蕾，會徐漸開放在

我的墳土之上，

你雖將永遠，不再見到我，

不朽的我的靈魂，

如那相愛的人們，

將回到你的身畔。

澄清你的心神，

在這深夜中，請你傾聽，

將有如獨語般，那輕輕的囁訴，

請你惦記。」（作者譯）

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訴說心內那永訣的感受。也替代他們，向我內心一次又一次的叮嚀。

車子後來走向仍是一片田園景色的公館，而後又是景美，而後是新店街。

我們三十一個人剛好住在向西的一個押房，沒有青島東路的長，可是約寬一公尺，而且電燈也很亮。這裡可能只有十到十二個房間，剛完成不久，地板、馬桶都是新的，木板還可以聞到它的香味。

在未判決以前，我們仍然不准和家人見面，只准寄東西。妹妹來此地，大都是坐新店線的小火車。

我們只知道，傳說這裡以前是新店一家戲院，規模不大。向街面有個很似半樓似的二樓，那就是這裡的看守的住所。還有衛兵。外面他們洗臉、倒馬桶的地方仍是老式的瓦磚，不過很大而且厚，街面也是瓦磚。那時候的新店、大坪林，如中和、永和，都是田莊色彩很濃的小地方。 >> 待續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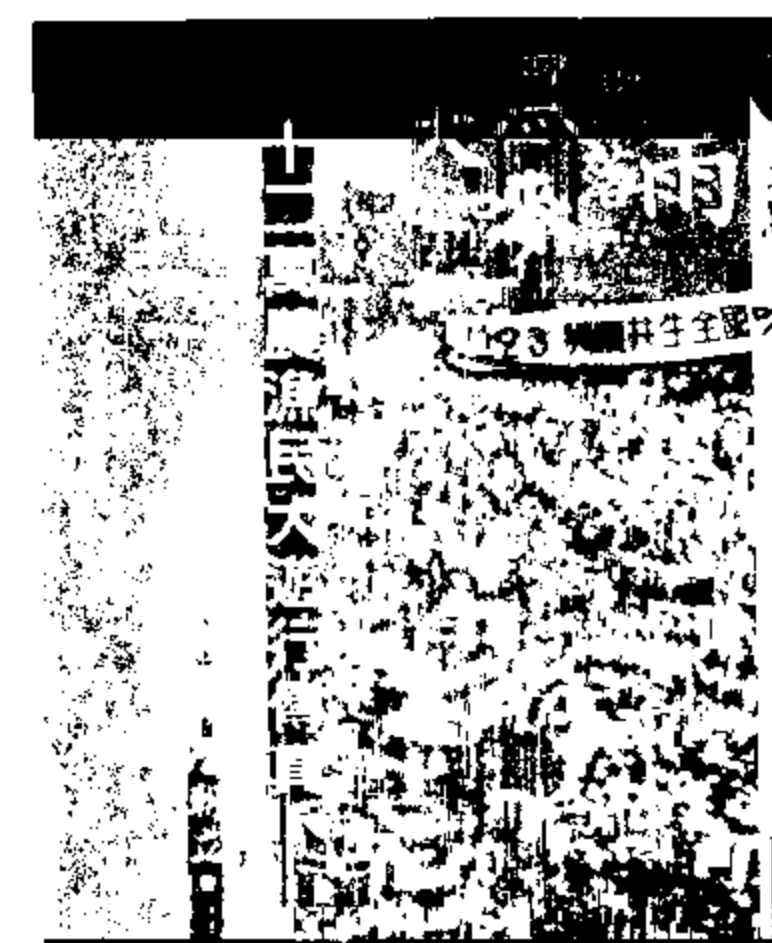
《天黑黑嘍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走進台灣》◎周良沛 / 定價NT300

——光和影的心靈紀實

作者周良沛是一位大陸資深的進步作家，且在台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本書超越了兩岸的歷史糾葛和現實迷障，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情，用獨特的紀實散文風格，描寫了台灣生活底層中許多不知名的或知名的人和事。藝術地概括了九〇年代前後台灣複雜的社會變動中的光和影，有鮮明的時代感。



直接訂購八折優待

台北社會科學出版社 郵政劃撥 / 19747069

■ 電話 / (02)87714051

■ 傳真 / (02)87713801

■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論 / 台灣社會性質論名著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璞

《台灣戰後經濟》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三八〇元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凡 可享有以上書籍 優惠，郵撥時
請填上訂戶編號。若須 則加收。

出版社
郵撥帳號：一一七四六四七三 / 電話（〇二）二三二二二三五七